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源刊
科学引文数据库 (SCD) 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收录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CHSSCD) 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 (CAJ-N) 优先出版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年 第40卷 第4期

Vol.40, No.4 Aug. 2018

中国·杭州 HANGZHOU, CHINA



ISSN 1673-3851
CN 33-1338/TS

目次

经济与管理

国内心理幸福感研究综述

——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倪旭东,王勤勤(319)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述评

——基于系统学理论视角 杨隽萍,于青青,肖苏卿(329)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 詹舒琴,杨君(338)

具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外卖供应链决策与博弈 韩曙光,丁根基(345)

语言与传播

论表人词语模“X 族” 赵艳梅(353)

仪式观视角下传统民俗的传播与民族认同塑造

——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俗为研究个案

..... 吴依靠,沈霓含,黄家茵,闻娱(361)

艺术与文化

杭州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研究

..... 程飞彪,朱琳,黄均华,江俊浩,胡绍庆,胡广(370)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论中国现代画家诗人的宗教身份认同 叶澜涛(380)

政治与法律

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盛赞,周飞(388)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 朱光琪(395)

高教研究

论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策略调整

——以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为例 陈雷(403)

结合数码控制技术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课程改革与实践

..... 徐英莲(409)

红色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法兰西内战》研究述评 莫岳云,王晓真(416)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吴苗(424)

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40, No. 4 2018

Content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overview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NKI database

..... NI Xudong, WANG Qinqin(319)

Research review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theory

..... YANG Junping, YU Qingqing, XIAO Suqing(329)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on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embedding link ZHAN Shuqin, YANG Jun(338)

Research on decision and game of risk-averse take-out food supply chain HAN Shuguang, DING Genji(345)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 study on the person-denoting word formation model X-zu ZHAO Yanmei(353)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and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view:

A case study on marriage custom of She nationality village in Mount E, Zhejiang Province

..... WU Yifei, SHEN Nihan, HUANG Jiayin, WEN Yu(361)

Art and Culture

Study on shape combination of ornamental trees in Quyuanyang Park, Hangzhou

..... CHENG Feibiao, ZHU Lin, HUANG Junhua, JIANG Junhao, HU Shaoqing, HU Guang(370)

Discussion about religious identity of Chinese modern painter poets YE Lantao(380)

Politics and Law

The role and inspiration of samurai class i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modern Japan SHENG Yun, ZHOU Fei(388)

Antitrust laws of injunction relief for SEPs ZHU Guangqi(395)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aking Qixin Honors Schoo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CHEN Lei(403)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AD Design Experiment of Woolen Sweater* based on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 XU Yinglian(409)

Red Culture

Research review o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 Yueyun, WANG Xiaozhen(416)

"West-centered"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WU Miao(424)

国内心理幸福感研究综述

——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倪旭东,王勤勤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 幸福感是当今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心理幸福感属于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其内涵、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在国内外还未形成共识。文章基于CNKI数据库,对国内的心理幸福感文献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个角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左右国内开始出现相关研究,近年来年度发文量整体呈增长趋势;相关研究热点有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知名学者是苗元江;学科分布聚焦于心理学与教育学。最后,结合国内外研究差距,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关键词: 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文献计量分析法;差距;展望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19-10

早期的传统心理学主要研究人们的消极心理,比如抑郁、焦虑、自卑和嫉妒等。直到20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塞里格曼发起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号召,学术界才开始探索人类的积极品质,从心理学方面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1]。此后,幸福感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并逐渐形成两个主要学派^[2]:基于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和基于实现论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亚里斯提卜提出的享乐论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体验。主观幸福感的代表学者Diener^[3-4]提出主观幸福感由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组成,也即拥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以及对生活的满意感。国内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以Diener为代表的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内涵、维度和测量方法基本达成共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短暂的愉悦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幸福感的全部方面,认为幸福不仅仅是一种快乐体验,更是人的

潜能的实现,并根据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实现论提出了心理幸福感^[5]。目前,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国内外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维度和测量方法,但国外已经形成了三个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并且学者们基于自己的观点,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首先,Waterman^[6]认为心理幸福感是人们从事与自己深层价值观匹配的活动并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产生的一种自我潜能实现状态。其次,Ryff等^[7]认为心理幸福感应该是“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并提炼了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分别是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和独立自主;并且该模型得到了广泛认可,Ryff^[8]发现有超过25种刊物和一些跨文化研究支持了心理幸福感六维度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最后,Ryan等^[9]和Deci^[10]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的内部资源对于获得持久的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归纳出获得心理幸福感的三种基本需要,即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虽然三个观点有差异,但是都从自

我实现的新视角阐述了幸福感的内涵,相较于只关注短暂愉悦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幸福感来说,心理幸福感将幸福感往更高层次拓展。近年来,对两种幸福感内涵的研究也呈现整合趋势。比如,Ryff等^[7]探讨了PWB与SWB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幸福感的自我接受和环境控制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呈中等程度相关关系。Keyes等^[11]运用实证研究分析得出SWB和PWB是相关但不同的两种幸福感,整合两种幸福感可以全面、准确地诠释幸福的含义,因此提出最佳的潜在幸福感模型是两者的组合。而积极心理学之父塞里格曼所著的两本书,对幸福感的理解从主观幸福感拓展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有机结合,并总结出实现人生丰盈蓬勃的五个元素,分别是积极情绪、完全投入、良好的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12-13]。

除了探索心理幸福感的内涵和测量外,研究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因素。总体上,对影响因素的探索从最初的人口学变量发展为人格特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还探讨了情感认知、心理资本和生活事件等变量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Ryff等^[7]系统地总结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否以及健康等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但是,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幸福感的解释度较低,从而说明人口学变量不是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后,Schmutte等^[14]研究了大五人格因素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神经质、外向性和尽责性能显著预测心理幸福感,Keyes等^[11]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然而,Wood等^[15]通过实证分析,却得出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超过五大人格。说明人格特征虽然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但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不一定是最大的。因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开始重视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其作用机制的探索。另外,近几年国外学者从探究心理幸福感的前因变量热潮,开始转为关注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国外已经在临床医学、神经科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跨学科领域中取得了研究成果,在实践应用中也获得了较好的成效。

国外有关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从探索心理幸福感的内涵、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到近几年的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且研究结论较为零散。那么,国内是何时开始研究心理幸福感的,近年来研究趋势发

生了哪些变化,当前的研究焦点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国内学者还未详细分析过。因此,本文以CNKI中文数据库的文献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个角度分析国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情况,并结合国内外研究差距,为本领域的后续研究提出一些研究展望。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情况,笔者在选择数据库前分别检索了万方、中国知网(CNKI)、维普这三大常用的中文数据库,设置同样的检索条件,发现三个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献数量虽略有差异,但经仔细对比可知三个数据库的整体情况类似,而且都涵盖了重要文献。由于CNKI数据库可以追溯到国内最早的心理幸福感文献,因此,本文最终选择了该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来源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条件设置为:篇名为“心理幸福感”或关键词为“心理幸福感”的精确匹配,检索发表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的所有相关文献。共检索到441篇文献,其中期刊288篇,硕博论文102篇,会议类25篇,报纸25篇,学术辑刊1篇。

(二)研究方法

使用CNKI数据库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选择符合要求的所有文献,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个角度进行可视化分析。根据计量可视化分析得出的数据进行整理,形成最终的数据资料。对整理后的数据使用origin绘图软件分别制作了年度发文量分布图、排列前十的关键词分布图和文献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献树分布图,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从计量可视化工具得出,学科分布数据经整理后以表格形式呈现。对所得到的图表从研究趋势走向、相互关系、相关重要文献的阐述等角度分析国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情况。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分布

图1为年度发文量分布图,从图1可知,2000年左右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初见端倪。许淑莲等^[16]在1997年发表的《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

差异研究》一文是国内最早的心理幸福感文章,探索了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是从基础的人口学变量视角研究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随后,2003年苗元江^[17]的博士论文《心理视野中的幸福》奠定了国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基础,文章详细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区别,整合了不同模型概念,并编制了《综合幸福问卷》,该论文是目前国内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心理幸福感相关文章,截至2018年5月底达362次。2006年之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到2006年之后文献数量呈较快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12年增加较多。这种趋势的背后表明国内学者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释。第一、经济发展层面,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追求内在的幸福感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二、国家政策层面,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和央视所做的“你幸福

吗”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国内幸福学研究的热潮。第三、从个人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意识到物质满足带来的愉悦感是短暂的,不断满足的物质欲望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于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幸福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对于心理幸福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另外,2015年至2017年,知网和万方收录的相关文献数量都略有下降趋势,但是经查询外文数据库(如Web of Science、Science Direct等)发现相关外文文献数量并没有出现下降且呈现逐年增加态势,这表明学术界整体上对心理幸福感研究的热潮并未减弱,只是国内发表的相关文章略有回落。但是,随着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体现了现阶段人民追求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因此,预测国内将再次迎来幸福感的研究热潮,涌现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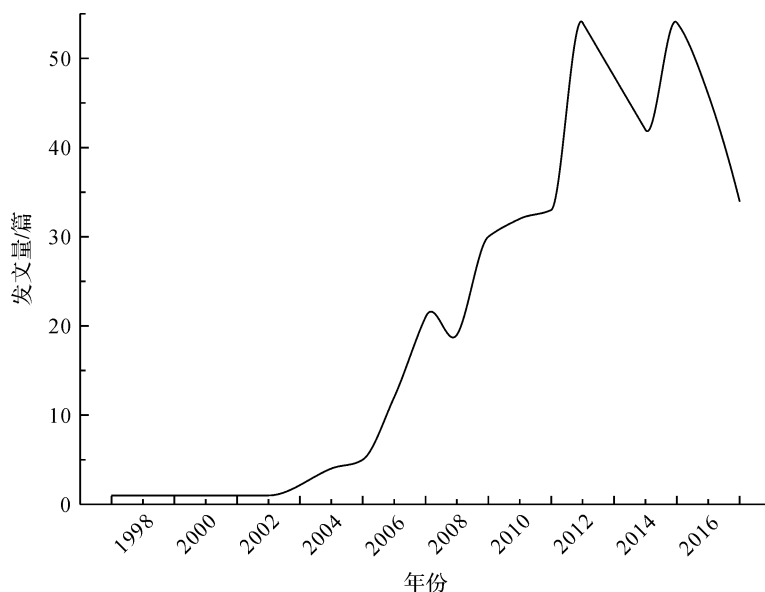


图1 年度发文章量分布

(二)关键词分布

所检索文献中排列前十位的关键词分布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知,文献量从多到少关的关键词依次为: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大学生、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社会支持、积极心理学、自尊、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下面分别简要介绍各关键词及代表性文章,以期发现未来的研究空间。

1. 心理幸福感

国内研究在使用心理幸福感这一概念时主要采用的是国外学者 Ryff 的六维度模型,使用 Ryff 的心理幸福度量表测量,将心理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

研究其前因变量。比如,较多学者研究了人格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均表明人格是预测心理幸福感的强有力的预测指标^[18-21],这与西方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除了研究直接影响外,近年来还有学者探索了更为微观的作用机制。比如,连灵^[22]的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是宜人性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变量;而罗雪峰等^[23]根据 Deci 和 Ryan 的基本需要理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是感恩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变量。前者表明感恩是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幸福感的部分中介变量,而后者的研究表明领悟社

会支持是感恩和心理幸福感的部分中介变量,两位学者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启发我们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对心理幸福感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这从

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学者们的不同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更深入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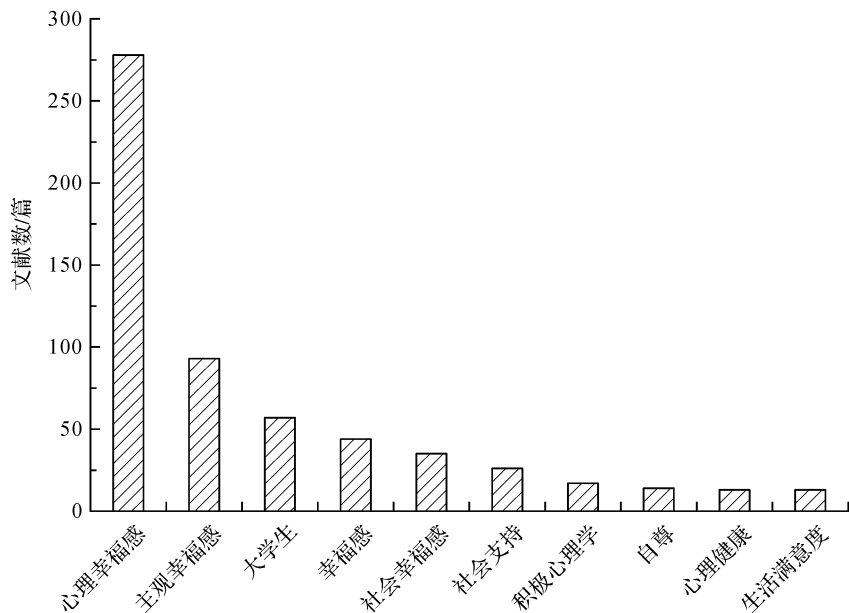


图2 排列前十位的关键词分布

2. 主观幸福感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借鉴国外相关测量量表并加以修订,探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的干预措施,并且开展了一些本土化实证研究,总体上国内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此外,国内也有学者研究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但大部分文章是根据西方研究从理论角度分析两者的异同,直接相关的实证研究不多。比如,金玲玲^[24]调查收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数据,分析发现自我接纳和环境掌控虽然是心理幸福感的维度,但是他们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维度相关性也较高,这验证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是两个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支持了 Ryff 等^[7]的研究结论。

3. 大学生

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样本大部分来自大学生群体,据统计有 57 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笔者分析研究者多用大学生做样本的可能原因是大学生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不会对研究的稳定性产生干扰。另外,大学生数量多且集中,便于研究数据的收集。但是,国内学者们应该反思基于大学生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即研究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群体。

4. 幸福感

国内的幸福感研究主要从整体视角总结了幸福感的发展过程与整合趋势。其中,程浩彬^[25]总结了国内外的幸福感研究变革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认知幸福感与情绪幸福感的整合,形成了现代成熟的主观幸福感;第二阶段是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整合,实现了个人情绪体验与人生意义的统一;第三阶段是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基础上融入了社会幸福感,实现了人与社会的统一。国内学者彭怡等^[26]、宛燕等^[27]、高良等^[28]、陈志霞等^[29]也基于整合视角探讨了幸福感的整合模型。

5. 社会幸福感

1998 年 Keyes^[30]首次提出了社会幸福感的概念,把社会幸福感分为社会整合、社会贡献、社会和谐、社会认同和社会实现五个维度。国内学者苗元江等^[31]结合国外研究详细综述了社会幸福感的概念、维度以及影响因素。随后他又与陈浩彬^[32]一起探索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三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并指出未来的幸福感研究方向必然是整合各种幸福感,形成从主观到客观、从个人到社会的现代幸福感理论模型。

6. 社会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Cassel 和 Cobb 提出了社会支

持这一专业概念,当前广泛认为个体获得来自他人和社会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就是获得了社会支持。国内学者在探讨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时,发现了部分中介变量,比如希望、自我控制、自尊、感恩等,大多数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心理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33-35]

7. 积极心理学

自从塞里格曼教授呼吁人们应该研究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与之相关的主题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心理幸福感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CNKI数据库的检索发现,中国学者苗元江等^[36]2003年发表的《积极心理学:理念与行动》一文是国内最早明确涉及积极心理学话题的文章,文中指出积极心理学发展的三个趋势:一是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二是发展积极心理学研究技术,三是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三大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幸福感的研究进展。第一、幸福感的内涵不断丰富,从主观幸福感拓展为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等;第二、相关的实证研究方法越来越合理、准确;第三、一些幸福干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践的应用对于促进人们健康、幸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8. 自尊

国内学者主要将自尊作为社会支持等与心理幸福感的中介变量^[37]。由于自尊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它能够对个体的认知、动机、情感及行为等许多方面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幸福感。

9. 心理健康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心理健康的广义概念是指一种满意的、持续高效的心理状态。狭义的概念是指知、情、意、行为四个方面的相互统一,人格的协调,适应社会的能力等。心理健康与心理幸福感关系密切,庞颖^[38]和余阳^[39]研究了两者的关系,结果都表明了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感具有正相关关系。

10.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整体质量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在研究中常常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比如国内学者曹斌等^[40]探讨了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正相关,从而推测通过心理幸福感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进而促进主观幸福感的提高。

(三)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图3是心理幸福感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从图3中可知,中心节点为主观幸福感,表明国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与主观幸福感联系密切。这与幸福

感的研究发展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先于心理幸福感,所以学者们在研究心理幸福感时多谈及主观幸福感。并且有学者详细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是既不同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41]。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幸福感的整合研究,但是研究者们提出的幸福感整合模型有差异。比如,彭怡等^[26]从行为感知视角,把幸福感分为体验型幸福感和积淀型幸福感。高良等^[28]认为当前的幸福感结构不够完整,加入价值实现成分,建构了一个包括生活满意感、需要满足感和价值实现感的幸福感三因素模型。陈志霞等^[29]认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虽然有区别,却是个体幸福感的三个不同侧面,共同构成个体整体的幸福感,并验证了不同年龄群体的拟合情况,证实了幸福感整合模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阐述幸福感模型,丰富了幸福感的研究。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其次,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连接线最粗,表明这两个关键词的共现频次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浩彬和苗元江^[32]在2012年发表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一文,这篇文章运用实证分析详细地证明了三种幸福感在理论结构上的相关性,并提出幸福感是由这三种幸福感构成的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

另外,发现大学生这一节点的大小仅次于主观幸福感,而且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幸福感、感恩、心理健康、自尊、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和积极心理学等多个关键词相关,这表明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多以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比如高淑燕等^[18]以大学生为样本,探讨大五人格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宋勃东等^[42]利用成就动机量表和心理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成就动机可以较好的正向预测心理幸福感,且避免失败的预测作用更强;还有学者专门总结了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43]。

除了研究大学生外,也有少量针对老年人、高中生和中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研究^[22,44-45]。

总之,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便于学者们从整体上了解某一领域的主要研究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变量,也有助于发现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四)文献作者分布

图4为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文献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献数分布,分别为苗元江、郑雪、陈志霞、李艳玲、李颖、孙颖、王秀希、于福洋、王欣和袁莉敏。其中,南昌大学的苗元江一共发表了13篇直接关于心理幸福感的文章,发文数量显著高于国内其他学者,是幸福感研究方面的国内知名专家。苗元江从1991年对幸福教育阐述开始到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多个视角(如:幸福感、感恩、希望、热情和心理资本等),以及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研究^[46],他紧跟国外的前沿研究方向,对中国的幸福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华南师范大学的高良^[47]

研究当代西方两种传统的幸福感,指出当前国内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即心理幸福感没有体现出幸福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心理幸福感没有真正体现出幸福感的意义。另外,华中科技大学的陈志霞^[48]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研究了幸福指数的理论、测量指标以及影响因素。李艳玲^[49-51]主要针对老年人,研究其心理幸福感的现状以及老年人的身体活动、睡眠等因素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曲阜师范大学的李颖等^[52]、于福洋等^[53]主要针对研究生,研究了自我和谐、自我效能感等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邯郸学院的高玉红等^[54]、王秀希等^[55]主要研究了中学教师这一群体的心理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检验 Ryff 的心理幸福感量表试用情况。国内不同学者在具体研究上存在各自的侧重点,通过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是不断完善的,但是与国外的研究还是存在不小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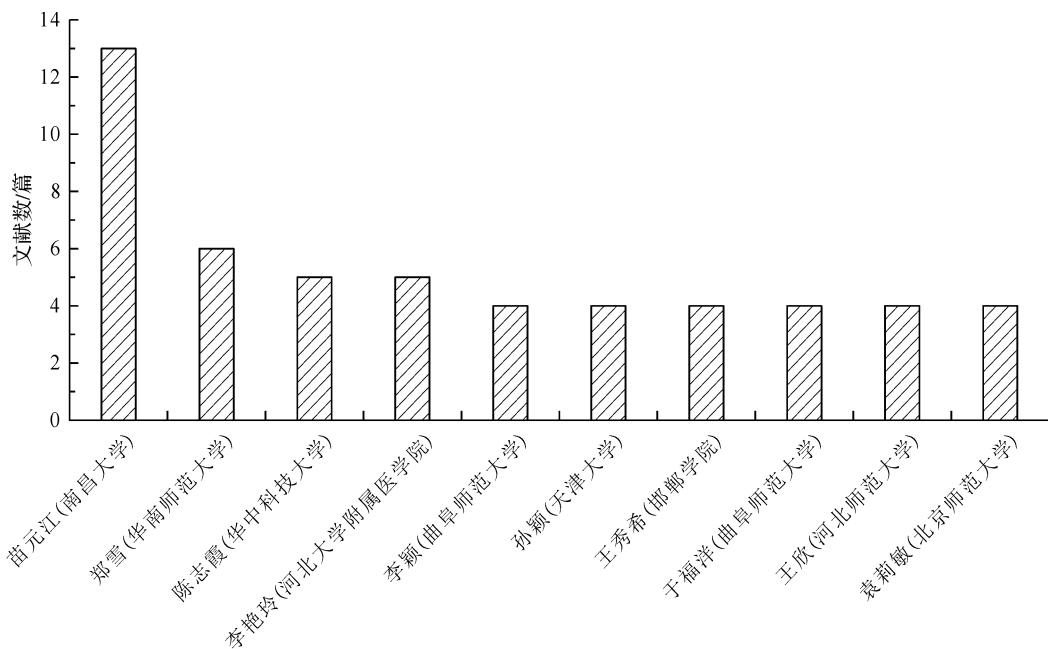


图4 文献量排名前十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献数

(五)学科分布

按照 CNKI 数据库学科分类发现,相关文献分布在40多个细分学科中。为了更加清楚分析心理幸福感研究的学科分布,本文重新整理了部分学科分布数据,以表格形式呈现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国内的心理幸福感文献主要分布在教育学和心理学,各占比43.46%和34.24%,这表明相关研究集中在教育学

和心理学学科领域。其实不难解释,因为人是体验或认知幸福感的主体,必然较多涉及到心理学。其次,国内学者在研究心理幸福感时,研究样本主要是学生群体,这一现象与关键词排名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出现的大学生、青少年、高中生等关键词相符合。除了学生群体,也有针对提升教师心理幸福感的研究^[56-57]。因此,国内的幸福感研究在教育上分布较多。

表1 文献量排名前十的学科分布^①

序号	学科名称	频次	占比/%
1	教育学	269	43.46
2	心理学	212	34.24
3	社会学	38	6.14
4	经济学	35	5.65
5	医学	26	4.20
6	体育学	14	2.26
7	政治学	11	1.78
8	哲学	6	0.97
9	旅游	4	0.65
10	文学	4	0.65

但是只有少量的文章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医学、体育、政治和宗教等学科。国内将心理幸福感与医学结合起来研究相对较多的学者是李艳玲^[49-51],她主要研究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与身体健康的关系,但研究程度还不够深入。较多国外的研究已经把心理幸福感与生理健康、神经科学、精神病治疗等医学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结果都表明较高的心理幸福感可以减少患疾病的风险,并能提高疾病复原力^[58],不同的幸福感水平可以预测不同的大脑反应^[59],并且在临床上幸福干预治疗也取得了一些成效^[60]。大量国外研究已经把神经内分泌调节、炎症标志物、血糖控制和心血管风险等作为衡量指标,开始探索心理幸福感与生物学的潜在机制。比如,在神经科学方面,有研究表明高水平幸福感的人大脑反应不同而且岛叶皮层体积更大^[58]。国内将心理幸福感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伊斯特林提出的幸福悖论,相关研究学者有赵奉军^[61]、晏小华等^[62]。还有研究将心理幸福感与宗教相结合,主要探讨了宗教信仰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63],总体上得出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容易获得心理幸福感,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一致^[64]。总之,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主要分布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研究较少而且不够深入。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文章首先简单回顾了国外心理幸福感在内涵、测量、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干预研究的情况,发现国外的心理幸福感研究虽然还未统一,但相关研究已经较多并且形成了以 Ryff 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整体上,国内在心理幸福感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的文献数量不多,而且多数实证文章是在西方研究基础上进行的验证性分析,创新

性研究不多。

为了相对全面地了解国内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情况,文章以 CNKI 数据库的中文文献为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年度发文量分布、关键词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作者分布以及学科分布五个方面总结了国内的研究情况。国内的心理幸福感文献数量虽然不断增加,但相比于主观幸福感文献,总量仍相对较少。另外,国内学者在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基本上直接使用 Ryff 的六维度模型和心理幸福感量表;有少量学者认识到中西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文化修订了心理幸福感量表^[65],但是量表总体效度不高。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这可能与大学生样本数据容易获取有关,但今后研究应该认识到样本多元化的重要性。国内相关研究最多的学者是南昌大学的苗元江,其他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点。另外,发表的文章多分布在心理学和教育学,而与医学、社会学、宗教等学科结合的研究较少,这表明国内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心理幸福感在其他学科方面的应用研究较为匮乏。

(二)展望

以实现论为哲学基础发展起来的心理幸福感,国内相关研究虽已有 20 多年,但是距离形成系统的、可应用的心理幸福感体系尚远。结合国外相关情况,对国内未来的心理幸福感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1. 开展更加本土化的心理幸福感研究

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同一行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下具有不同的意义。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谐,而个人主义文化比较关注个人感受。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感受可能会不同于西方,国内学者直接使用西方的相关概念和量表,或许不能反映出中国人心理幸福感的全部内容,西方的相关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人的特征还有待检验。国外学者 Briana 等^[66]注意到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实证研究

① 本文对 CNKI 检索出来的学科做了如下归类:a)教育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b)社会学(社会学及统计学、人才学与劳动科学);c)经济学(企业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金融、财政与税收、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d)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医药卫生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精神病学、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e)政治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党政及群众组织);f)哲学(宗教、哲学);g)文学(中国文学、文化)。

发现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上是存在差别的。国内学者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但主要是理论阐述,缺乏相关的实证探索。比如高良等^[67]从自我构建视角详细阐述了中西方的幸福感差异,发现和谐性、价值性、社会性和未来性是中国人幸福感的独有特征。张玮等^[68]阐述了中国文化价值观对中国人幸福感的影响,中国的“和文化”表明中国人不仅追求与大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和谐,还追求与自我身心的和谐,以获得内心的安宁,而这一维度未体现在目前的西方心理幸福感研究中。因此,未来国内学者有必要分析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构建出适用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幸福感内涵和结构,开发更加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在实践中,应用中国人对心理幸福感的独特理解,可以更加准确地指导中国人追求持久的幸福。

2. 选取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样本

从关键词分布和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可知,国内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样本主要是大学生群体,研究样本比较单一。一方面,尽可能排除由于研究样本的特殊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使研究结论具有更好的外部效度;另一方面,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较大,针对具体群体研究的结果,更有实用价值。因此,国内学者可以从性别、年龄、工作种类、生活区域、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等视角区分群体,开展相关实证研究。

3. 开展跨多学科的深入研究

Ryff^[8]回顾心理幸福感研究时,就曾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需要在不同学科中架起桥梁,其中最有价值的进展来自于将心理幸福感与生理健康、生物调节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幸福感与个体的生理机能、神经科学方面还存在着很多未知问题,而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国内学者应该紧跟国外研究前沿。研究心理幸福感与其他学科的深层次关系,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心理幸福感,还有助于结合幸福感干预治疗的原理应用于医学实践。因此,国内需要多开展跨学科的实证研究,以在不同领域发挥心理幸福感的积极功能,促使人类在各方面的繁荣发展。

4. 积极开展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幸福干预是目前国外幸福感研究的前沿方向,研究视角从最初的心理学扩展到了临床医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生物科学等学科,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比如 Ryff^[8]总结了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的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成果;而且国外对非

临床样本的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已经推广到学校和家庭中。此外,感恩干预也成为国外的研究热点,并且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感恩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幸福感干预措施。所以,感恩也可以作为国内心理幸福感干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在使用感恩这一概念时,应该注意与中国的“人情”概念进行区分。因为“人情”带有一种负疚感、亏欠感,不利于个体达到真实的幸福。总之,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研究也应该成为今后国内研究的热点方向之一。特别地,应该关注心理幸福感与医学结合的研究,开发出更多的幸福干预疗法,减轻患者的身心痛苦,这对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和持续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Seligman M E, Csikszentmihalyi M.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5-14.
- [2] Ryan R M,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J]. Annual Reviews Psychology, 2001, 52(1):141-66.
- [3]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3):542-575.
- [4]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276-302.
- [5] Ryff C D.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7(6):1069-1081.
- [6] Waterman A S.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Contrasts of personal expressiveness (eudaimonia) and hedonic enjoymen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4(4):678-691.
- [7] Ryff C D, Keyes C L M.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4):719-727.
- [8] Ryff C 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practice[J]. Psychother Psychosom, 2014, 83(1):10-28.
- [9]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 [10] Deci E L.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1):227-268.

- [11] Keyes C L M, Shmotkin D, Ryff C D. Optimizing well-being: The empirical encounter of two tradi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1007-1022.
- [12] 马丁·塞利格曼. 真实的幸福[M]. 洪兰,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13] 马丁·塞利格曼. 持续的幸福[M]. 赵昱鲲,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Schmutte P S, Ryff C D. Personality and well-being: Reexamining methods and meaning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3): 549-559.
- [15] Wood A M, Joseph S, Maltby J. Gratitude predic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bove the big five facets [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9, 46(4): 443-447.
- [16] 许淑莲, 吴志平, 吴振云, 等. 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C]//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集. 苏州: 中国心理学会, 1997: 167-171.
- [17] 苗元江. 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 [18] 高淑燕, 孙继民.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s1): 63-67.
- [19] 唐慧敏, 苗元江, 杜夏华. 大学生“大七”人格与幸福感的结构模型研究[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0(5): 135-136.
- [20] 陈咏媛, 许燕, 张姝玥. 初中生“大七”人格与幸福感的结构模型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8): 86-91.
- [21] 王芳芳. 大学生的人格特质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 南京: 南京邮电大学, 2015.
- [22] 连灵.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在尽责性和心理幸福感间的序列中介作用[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7, 5(3): 154-159.
- [23] 罗雪峰, 沐守宽. 高中生感恩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7, 40(4): 878-884.
- [24] 金玲玲.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 [25] 陈浩彬. 幸福感理论模型探索[D]. 南昌: 南昌大学, 2008.
- [26] 彭怡, 陈红. 基于整合视角的幸福感内涵研析与重构[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7): 1052-1061.
- [27] 宛燕, 郑雪, 余欣欣. SWB和PWB: 两种幸福感取向的整合研究[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0, 8(3): 190-194.
- [28] 高良, 郑雪, 严标宾. 当代幸福感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幸福感三因素模型的初步建构[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129-136.
- [29] 陈志霞, 李启明. 幸福感整合模型在不同年龄及性别群体的验证[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1): 78-83.
- [30] Keyes C L M. Social well-being[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8, 61(2): 121-140.
- [31] 苗元江, 陈浩彬, 白苏妤. 幸福感研究新视角: 社会幸福感概述[J]. 社会心理科学, 2008, 23(2): 17-21.
- [32] 陈浩彬, 苗元江.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心理研究, 2012, 5(4): 46-52.
- [33] 周蜀溪. 社会支持与真实幸福感的关系: 希望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3): 515-517.
- [34] 李妍君, 朱小爽, 陈英和.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幸福感: 社交自尊的中介作用[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3): 351-356.
- [35] 刘海英, 李颖, 于福洋. 研究生社会支持、自我和谐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7): 861-862.
- [36] 苗元江, 余嘉元. 积极心理学: 理念与行动[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81-87.
- [37] 张雯, 谢威士. 提供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自尊的中介作用[J]. 社会心理科学, 2007, (1): 63-68.
- [38] 庞颖.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3.
- [39] 余阳. 试论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J]. 教育文化, 2015(31): 230-231.
- [40] 曹斌, 吕春晓, 吴爽. 心理幸福感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J]. 重庆与世界, 2011, 28(3): 93-96.
- [41] 严标宾, 郑雪, 邱林. SWB和PWB: 两种幸福感研究取向的分野与整合[J]. 心理科学, 2004, 27(4): 836-838.
- [42] 宋勃东, 李永娟, 董好叶, 等. 无惧失败预测幸福: 成就动机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5, 38(1): 203-208.
- [43] 何玉梅, 姚本先. 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研究概述[J]. 中国电力教育, 2008, 2008(1): 138-139.
- [44] 李艳玲, 张瑞丽. 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研究现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3, 33(5): 1218-1221.
- [45] 杨莹, 寇戣. 亲社会自主动机对青少年幸福感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2, 33(2): 163-171.
- [46] 苗元江, 朱晓红, 陈浩彬. 从理论到测量: 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5(2): 128-133.
- [47] 高良, 郑雪. 当代西方幸福感研究的问题与方向[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9, 31(1): 84-120.
- [48] 陈志霞, 于洋航. 城市居民社会管理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17(11): 78-86.
- [49] 李艳玲, 张瑞丽, 李慧娟, 等. 社区老年人身体活动和身体功能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J]. 广东医学, 2012, 33(19): 2977-2980.

- [50] 李艳玲,张瑞丽,杜小静. 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研究现状[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5):1218-1221.
- [51] 李艳玲,张海松,石丽娜,等.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应对与心理调适的关系[J]. 重庆医学,2015,44(1):138-140.
- [52] 李颖,于福洋,姜璐璐,等. 师范研究生自我和谐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J]. 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2009,11(1):16-18.
- [53] 于福洋,李颖,刘佳,等. 研究生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1):21-23.
- [54] 高玉红,王秀希,李健,等. 中学教师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8):56-57.
- [55] 王秀希,张丽娟,王冰,等. Ryff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在中学教师中的试用研究[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23(12):26-31.
- [56] 胡姗姗,吴明霞,张大均,等. 中学教师工作绩效、社会支持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1(10):57-60.
- [57] 张可,杨萌. 高校青年教师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J]. 继续教育研究,2012(5):76-78.
- [58] Ryff C D, Singer B H, Dienberg L G. Positive health: Connecting well-being with biology[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2004,359(1449):1383-1394.
- [59] Lewis G J, Kanai R, Rees G,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good life': Eudaimonic well-being is associated with insular cortex volume[J].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2014,9(5):615.
- [60] Fava G A, Ruini C.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 well-being enhancing psychotherapeutic strategy: Well-being therapy[J]. Journal of Behavior Therapy & Experimental Psychiatry,2003,34(1):45-63.
- [61] 赵奉军.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J]. 财经研究,2004,30(5):75-84.
- [62] 晏小华,刘振亮,王祥坤,等. 幸福悖论及其最新解释[J]. 心理科学进展,2018(1):180-189.
- [63] 张萍春. 宗教信仰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
- [64] Fredrickson B L. How does religion benefit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positive emotions active ingredients? [J]. Psychological Inquiry,2002,13(3):209-213.
- [65] 邢占军,黄立清. 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试用研究[J]. 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12(3):231-233.
- [66] Robustelli B L, Whisman M A. Gratitud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6,19(1):1-15.
- [67] 高良,郑雪,严标宾. 幸福感的中西差异:自我建构的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2010,18(7):1041-1045.
- [68] 张玮,何贵兵,成龙. 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国人幸福感的研究综述[J]. 心理研究,2011,4(3):48-52.

Research overview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CNKI database

NI Xudong, WANG Qinq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ell-being is one of research hotspot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s a relatively new research field, whose conception, measuring tool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have not formed a consensus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CNKI databas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by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from fiv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annu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s, keyword distribution,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author distribution and disciplinary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levant studies started to appear at the beginning of 2000 and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shows a trend of growth in recent years. Relevant research hotspots are subjective well-being, college students, well-being, social well-being and so on. The famous domestic scholar with the most research results is Miao Yuanjia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isciplines focuses on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In the end, the future research outlook is proposed by combining the gap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bibliometric analysis; gap; outlook

(责任编辑:陈丽琼)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述评

——基于系统学理论视角

杨隽萍,于青青,肖苏卿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创业生态系统是揭示区域中创业活动持续高增长的核心概念,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新框架,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系统学理论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明确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和六大特征,并根据研究对象对现有的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国内外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进展及在不同层面上的研究缺陷,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创业生态系统;系统学理论;创业企业;区域创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8) 08-0329-09

创业领域的研究不应仅仅探讨创业企业行为,更应关注特定区域中创业活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即对区域创业活动进行整体性研究^[1]。国内外有关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均起源于Dunn^[2]在2005年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中心构建的创业生态系统及对其进行的简单描述,刘林青等^[3]则专门介绍了以MIT为例的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从系统学视角出发的创业研究由此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与特征^[2,4-13]、功能与评价^[14-15]、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16-20]以及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规律^[21]等方面。其中,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与特征描述是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和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基础;从整体层面认知了解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性、整体功能和发展规律,对于从外部控制创业生态系统的持续运行和功能演化具有重大意义^[9]。基于组织生态学、共演理论、创业理论等基础理论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创业研究整体方法已成为创业研究的新方向^[22-27]。

然而,当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多从单一要素出发逐步探讨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及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以点窥面;或简单引入“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进行拓展,而忽略了从系统整体角度展开研究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作为创业生态系统的基础理论,在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创新系统、商业系统等领域被广泛应用^[28-29]。本文基于系统学理论对相关前沿文献进行分析梳理,明晰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特性以及类型划分,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研究进展做出述评,对未来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一、创业生态系统概念、特征及类型

从系统的构成来看,系统可被简单描述为系统边界和系统结构二者的组合。其中,系统边界是指研究要素的范围,要素是在系统内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单元;系统结构则是系统内各要素及要素间构成关系的结合。在明确系统界定的基础上,从系统功能、系统结构和系统发展的视角来看,系统应当具有

整体性、多维度和动态性的特征^[28,30]。因此,也应基于这三个特性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运行机制、功能和控制等进行深入研究。

(一)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辨析

系统核心指系统内最主要的组成要素,对系统的聚合、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联结作用。在创业生态系统研究中,对系统核心的认定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创业活动^[5,12,31]、创业企业^[11]、创业者及其特质^[7-8]。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系统核心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且关于系统要素构成也有不同的观点。首先,在以“创业活动”为创业生态系统核心的相关研究中,研究重点在于明确创业环境、创业活动支持子系统与创业活动之间的交互机制^[12]。但仍有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要素的内涵存有异议,主要争论点在于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是否包含创业企业^[9,11-12]。其次,以“创业企业”为创业生态系统核心的有关研究,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多种创业参与主体(包括创业企业、创业相关的企业和服务机构)、创业活动支持子系统及内部创业环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要素彼此间进行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致力于提高整体创业活动水平(创业数量和创业成功率)^[11]。最后,以“创业者及其特质”为创业生态系统核心的有关研究认同以上的三类要素构成的观点,且强调创业生态系统是由特定区域内潜在或现有的创业者,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与创业环境进行交互,来达成系统功能的。^[7-8]

根据系统学理论,从系统的部分要素研究其对系统的作用违背了系统的整体性原理,该类研究局限在微观分析思维的层面。而系统核心作为能够将整个系统有力联结在一起的要素,决定了功能(或目标)系统的价值导向,即系统在各要素的统一价值观下形成,系统价值观隐含在系统的文化之中。有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创业活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发达程度确实与当地的创业文化高度相关,区域创业文化在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和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也是区域内所有创业活动联结的关键要素之一。^[19,31-32]从系统要素的完整性来看,创业生态系统应当是由创业主体(包括拥有创业意图的主体如创业者和创业团队、新创企业、已创立一段时间但仍不稳定的企业、创业成功企业)、创业支持活动子系统(包括政府高校等公共部门、金融机构等资源供给机构、创业平台等其他支持性结构)和创业活动范围内的创业基础要素(包括创业文化、政府政策等)共同构成的。由前所述,本文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以创

业文化为系统核心,以其联结广度为系统边界,由创业主体、创业活动支持子系统、创业环境共同构成并相互作用的系统,其系统功能在于促进区域的创业水平增长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运用系统学理论对创业生态系统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是从基本概念层面上明晰了创业生态系统的界定。明确创业生态系统的系统核心与系统边界,也有利于从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类型角度,进一步明晰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研究范畴与研究内容。

(二)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系统学理论认为系统具有三个核心特性:a)整体性。系统是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包含独立要素所不具备的性质和功能。^[28,30,33]亚里士多德提出有关系统组合和分解的两个基本定律来描述系统的整体性,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部分大于整体的局部。b)多维度。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域的分析应当从完全互斥的角度出发,即一个域内不同的分析视角应当是完全互斥的。但是从系统的层面来看,添加一个更高的维度,将使互斥达到统一。系统内各要素就是通过其多维度特性来达成统一。^[28]c)动态性。系统通过内部运行机制(以反馈机制为主)与系统外部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长期持续发展演化的特性。^[28,30]

目前在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分析并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诸多特性,如从要素的关系和结构层面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网络性、共生性、竞争性、自我维持性和区域性六大特征^[11],从系统的功能和发展层面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共生性、自洽性、进化性和溢出效应四大特征^[12]等。但是研究大多从单一层面出发,忽略了系统的多个层面特性。基于系统学理论提出的系统三大特征(整体性、多维度、动态性),本文结合已有的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结构和发展进程三个层面的研究,进一步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六个衍生特征进行梳理,见表1。

开放性/边界是描述创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处于外部环境中,与系统外环境进行交流,获取资源信息并对外发挥功能、输出系统产物的特性。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创业生态系统的知识溢出效应^[17,34-37]。从系统学的角度看,该特征强调了创业生态系统的边界,说明创业生态系统是完整的个体,其内部各要素共同作用发挥功能,与系统学中的整体性密切相关。

表 1 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核心特征	研究视角	衍生特征	学者(年份)
整体性	创业生态系统功能视角	开放性/边界	Audretsc&Belitski(2016); Isenberg(2010); Estrin(2013); Stenholm et al(2013); Fritsch&Storey(2014)
多维度	创业生态系统结构视角	多样性	Thomas&Autio(2014); Zahra&Nambisan(2011)
		竞合性/共生性	Kapoor&Lee(2013); Zahra&Nambisan(2011); Spigel(2017)
		网络性	Galateanu&Avasilcai(2014)
动态性	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视角	自我维持性	Mason&Brown(2014)
		不确定性	Cohen(2006); Kapoor&Lee(2013); Mack&Mayer(2016)

多样性、竞合性/共生性、网络性是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对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描述。多样性从创业生态系统内的点——即系统要素出发,具体指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的类型和数量具有多样性,这些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25],具有不同的功能。竞合性/共生性从系统内的联结线出发,描述要素之间联系的性质,即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共同成长等的关系^[13,38-39]。网络性则从系统整体结构出发,描述了创业生态系统要素之间联系的复杂和紧密程度。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要素嵌入在系统的网状结构当中,体现出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轮廓^[40]。这三个特性从不同的维度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进行描述,同时说明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是多维的,各系统特征在不同维度形成统一,这与系统学中的多维度特性密切相关。

自我维持性与不确定性是从时间演化的视角,分别对创业生态系统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进程与演化规律进行描述。其中,自我维持性体现了短期内创业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强化能力^[7];不确定性则描述了创业生态系统随时间长期演化,在应对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外界环境变化时,表现出来的不确定的发展情况^[4,21,38]。二者概括了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特点,与系统学中的动态性密切相关。

(三)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

从系统的边界出发,将目前研究按研究对象范畴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进行梳理分类,分为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以及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四种类型。

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起源最早,2005 年国外学者 Dunn^[2]的研究以高校创业为基础、以大学生创业为核心,对构建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进行探讨。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是指以高校为基础,高校周边环境和学生家族为辅助支持系统,高校学生为创业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创业机制。该领域的研究内

容一方面与创业教育结合,探究如何构建以高校为中心的创业生态系统,从而促进学术创业和创业教育;另一方面探讨如何通过优化高校型创业生态系统,进而提高高校所在区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水平。但也有学者认为高校的创业教育不一定带来更多或更成功的创业,它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是无关紧要的。^[9]

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基于商业平台构建的创业生态系统,并探讨其运行机制和演化规律。^[41]该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是指,以政府或者企业等第三方部门构建的创业平台及平台上与创业活动高度相关的各类组织与具体环境的集合。显然,平台型创业生态系统的边界仅局限于创业平台及其相关资源的范畴。张玉利等^[42]提出众创空间等创业平台只是与创业生态系统具有相似的物理空间,目前还不是完全的创业生态系统。

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的国内相关研究集中在 2011—2014 年,围绕科技型创业展开,主要是基于高新技术产业构建以科技创业活动为核心的创业生态系统,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4,6,21,43]该类研究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科技创业各要素(层面)的内在关联性、系统结构的有机性及其相关调整与转变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集中表达。考虑到高新科技行业的特殊性,虽然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的有关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但该领域的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

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是当下较为主流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之一^[5,7-9,11-13],其概念界定以地理边界作为系统的研究边界,从一般性角度出发且具有较强的适用性。由于系统结构模式、要素构成的不同,高校型、平台型和区域科技型创业生态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从系统内在的统一性来看,上述三种类型的创业生态系统,实质上均为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子系统,是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内某

一具体情形的深入研究。因此,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围相对宽泛,研究内容也相对复杂,学者们对其概念界定、系统核心及系统要素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对目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类型研究进行回顾与关系梳理,对于进一步明晰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内涵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从理论的系统性和概括性出发,注重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对整个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而言更具指导意义。未来应当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尤其要切实地将系统学理论框架引入研究主体,这对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发展和创业生态系统核心理论的构建将大有裨益。

二、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脉络及现有研究缺口

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内部结构分析、内部运行机制梳理、系统发展演化机制观察以及系统功能与评价等四个方面是目前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内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在理论上,当前研究中创业生态系统概念的不全面与模糊性,使得更深入的研究变得复杂,整体研究进展缓慢。实证方面,相关测量指标的构建尚不完善,经验证据和实证结果较少或不具有普适性,也给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障碍。

本文参考系统学的研究脉络,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系统层面)、微观层面(创业企业层面)三个角度出发,梳理已有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脉络,为后续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一)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脉络

宏观层面的研究应当主要关注系统功能、系统演化发展规律及系统的维护(系统治理与评价)。创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于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及有效运行将显著提高区域创业绩效,即提高当地的创业活跃度、提高产业与技术创新能力、增加就业等,并借以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44]因此,研究者首先应当关注创业生态系统是否切实发挥了其宏观功能及功能发挥的效果。其次,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规律主要体现为动态演化特征,关注创业生态系统整体与系统外部环境是如何进行交互,交互过程中创业生态系统整体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最后,是有关创业生态系统的控制问题,即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的统一评价体系与探索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路径研究。

中观层面即系统层面的研究,应当关注系统结

构、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及其短期发展三个方面。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研究主要涉及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关联方式与结构特征。进一步,在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基础上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动态运行机制,即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的交互变化如何影响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的运转又是如何实现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基于对创业内部运行机制的观察与分析,再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在短期内如何发展并保持稳定的。

微观层面即系统要素层面的研究,应当关注该要素与系统整体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的机理及效果。创业生态系统的微观重点研究要素是围绕创业企业/创业团队/创业者,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环境(除创业企业以外,对创业企业的行为与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系统内环境)与创业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该层面的研究应主要从创业企业出发,明确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企业与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竞争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和学习机制等),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该相互作用机制将对创业企业的行为(如战略制定、企业风险管理、资源配置、企业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什么程度的影响以及影响路径;由此,进一步研究该相互作用机制对创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业绩效的最终影响。

(二)创业生态系统已有研究进展

创业生态系统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宏观层面与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缺乏,尚未取得较大的进展。

目前,创业生态系统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针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开展研究,Acs等^[44]学者通过实证来探究区域内制度、创业活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以明晰创业生态系统在区域中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衡量方法。衡量方法在后续被不断完善,如学者在已有衡量基础上加入企业家作为影响变量,直接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对譬如就业增长等区域经济指标的影响^[45]。第二类则主要关注外部环境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通过全球创业研究的观察、寻找和识别创业生态系统,探究社会经济环境和创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如何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行^[46]。第三类致力于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控制研究,即对创业生态系统的评价和治理。其中创业生态系统的评价研究主要通过评估当地区域的创业绩效,并从不同的视角引援不同区域的案例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

评价^[15]。Bellmasterson等^[47]提出并检验了一系列创业生态系统活力指标,对发展和完善评价指标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具体应用过程中需特别考虑行业的特殊性。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研究目前集中在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48],如Cunningham等^[49]提出以系统主要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为中心的治理框架,探讨PI的能力、治理成本与治理机制,旨在用该框架对大规模公共资助的项目进行管理。

而中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主是要从整体性、多维度与动态性三个角度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并且不同视角之间又有一定的交叉。a)从整体性出发,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功能的具体表现进行研究^[10,41,50],如知识溢出效应等,具体的功能实现机制与多维度的研究相互交叉。b)从多维度出发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系统结构视角分析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特性、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路径和具体机制。c)在动态性特征方面,短期研究主要关注创业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和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推动系统稳定发展,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实证检验^[20-21]。其中,Mack等^[21]开发的一个创业生态系统演化框架,集成了基于Isenberg等^[9,11]对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描述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和演变,并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创业生态系统为例进行了分析。

(三)现有研究缺口

系统学脉络为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与研究思路,但经对比发现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缺口:

一是宏观层面对于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的演化规律的探索尚不明晰,系统的评价指标构建和治理框架尚不完善。尽管对创业生态系统在外部环境中的演化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时间的观察案例,但是由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较晚、研究时间较短等原因,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数据缺乏,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机制理论也尚未得以构建完善。由此,对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机制探究依然是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一个难点。此外,虽然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的构建发展较为迅速,但大多从单一层面出发而忽略了从多层面构建评价指标的必要性,导致研究对创业生态系统的认知和评价不全面、不完整,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创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二是中观层面的研究中,创业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尽管有关研究运用了多种方法,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进行了分析与模拟,但是系统要素之间关联关系、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的变化机理尚不明晰,尚未挖掘出其对创业生态系统系统功能发挥的影响路径。此外,由于当前创业生态系统核心理论尚不完善且系统的运行机制依然是一个“黑箱”,创业生态系统短期内如何发展并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机制研究尚不明确。

此外,创业生态系统的微观层面研究相对缺乏。现有研究集中在宏观与中观层面,忽略了对创业生态系统与创业企业/创业者间相互作用及作用效果的研究。微观层面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创业企业和创业家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参考,探讨如何通过具体企业的活动促进创业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及给予具体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与风险决策提供建议。该层面的研究少有涉及,主要是因为先前创业环境的相关研究已经对创业生态系统与创业企业/创业者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部分内容的解释,而且中观层面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研究进展缓慢,阻碍了更深入的微观研究开展。

三、创业生态系统未来研究展望

创业生态系统已经成为创业研究的新框架。然而,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构建依然停留在分析层面,其具体结构、整体运行机制及与创业企业的交互作用尚不明晰。本文根据系统学框架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以系统学中的核心要素和系统边界为概念的界定要点,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以创业文化为核心、文化联结广度为系统边界,致力于提高区域创业绩效和经济增长的系统,该系统具有开放性/边界、多样性、竞合性/共生性、网络性、自我维持性和不确定性六大特征。在梳理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发现创业生态系统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整体功能的研究相对完善,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凤毛麟角,中观层面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对创业生态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认识相对片面,对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构建的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未来创业研究应当在继续深化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

第一、宏观层面。在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研究中,由短期研究进一步深化至长期研究,深入探讨并构建相关理论以解释创业生态系统长期的动态演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和治理理论,以加强对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控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国家/城市的实际案例,且由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发展较晚,相关研究仅停留在短期的实践分析阶段,尚未得出内在统一的创业生态系统动态发展理论。并且,不同研究对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运用尚未统一,各案例数据很难进行集中地比较分析。因此,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a)对世界各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进行追踪观察,建立创业生态系统案例观察数据库。由此,通过经验观察、数据处理进一步深入分析总结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发展规律。b)依据系统学理论的研究脉络,借鉴其中系统发展的相关研究如“反馈机制”等,构建创业生态系统与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机制,从而指导现实中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发展方向。c)运用计算机仿真系统结合现有实证数据对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进行模拟,根据模拟结果分析长期创业生态系统演化方向和演化条件。通过对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深入了解创业生态系统的长期演化规律,完善创业生态系统评价体系和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框架,从而推动创业生态系统进化及整体功能的发挥,以提高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成功率,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

第二、中观层面。从创业生态系统三大特征出发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内部运行机制与短期稳定状态的维持。当前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要素、要素关系和整体结构三个领域,其核心内容的认知观点基本趋于统一,即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和一般系统高度相似的特征,可以从要素结构视角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单一要素视角研究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与创业生态系统整体性原则相悖,故该方面的研究目前也尚未取得较大进展。要深入了解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揭开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作的“黑箱”,未来可以从创业生态系

统的三大特征出发(整体性、多维度、动态性)并结合运用系统学理论指导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探讨与分析,具体如图1所示。三大特征及其衍生特征分别从创业生态系统整体的功能、结构与短期发展三个方面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形成、运作与演化产生影响,如风险传导机制^[51]、竞合机制^[52]、资源共享机制和平衡调节机制^[5]等。首先,创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交互,是会随着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持续地发生变化的,即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作产生影响。其次,从多维度特征出发,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例如,创业生态系统内组成要素的数量和类型越多即多样性越明显,创业参与主体为获取稀缺资源会有怎样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在要素主体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创业生态系统内,相关风险又是如何进行传导并发生变化。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多种参与主体,在长期的创业活动过程中相互往来,形成复杂的网络关系,该网络关系中的资源是如何调配。最后,从动态性特征来看,创业主体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是如何通过系统内部网络联系进行资源的获取与共享,以实现创业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正常运转状态的自我维持等,这些都是创业生态系统中观层面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数字生态系统的模拟运作可以精确地体现系统信息的传递与反馈效应,有助于了解与借鉴分析现实中创业生态系统与外部的交互作用,以及系统内各要素主体间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系统要素-系统特征-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揭开创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面纱。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系统学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继续通过信息技术或数字技术模拟现实创业生态系统,根据该模拟系统提供的信息和内部结构,为现实创业生态系统结构、特征及运行机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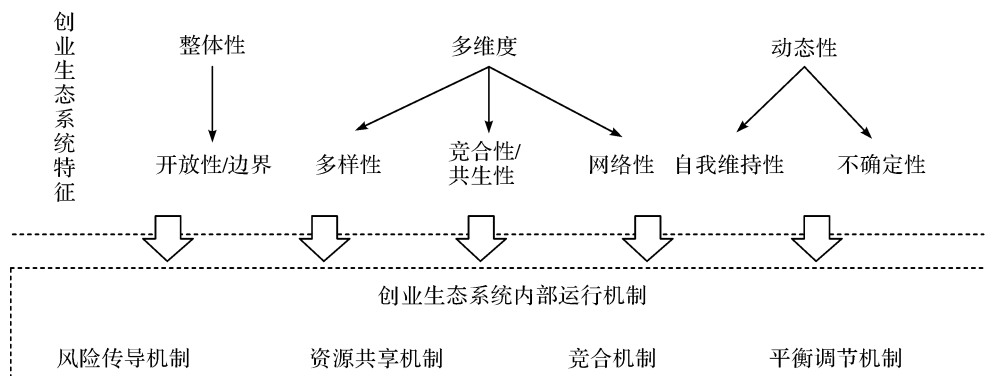


图1 创业生态系统特征与内部运行机制

第三、微观层面。厘清创业企业外部环境与创业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创业企业、创业团队、创业者面对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环境时的决策方式,及创业生态系统内部环境对创业企业、创业团队、创业者决策的影响路径。目前国内外依据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对微观层面(企业及个人层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创业领域其他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大多只关注创业企业、创业团队或创业者中的某一方面,环境与微观组织或个体交互作用的研究中仅考虑环境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特点,缺乏系统性。创业生态系统作为系统内企业的外部环境,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结合系统学框架深化原有的创业环境分析,探讨创业生态系统影响创业企业的传导机制,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其对创业企业的具体影响以及影响过程中的特征与特点;另一方面,依据创业理论切实从创业企业和创业者的行为出发,结合创业企业成长的核心即创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研究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各创业主体间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企业在创业生态系统中的行动策略和发展轨迹等。在此基础上,分析创业企业行为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从而推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演化研究。

参考文献:

- [1] Autio E, Kenney M, Mustar P, et al.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7):1097-1108.
- [2] Dunn K.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J].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05(9):23-35.
- [3] 刘林青,施冠群,陈晓霞.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生态系统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9,31(7):20-24.
- [4] Cohen B. Sustainable valley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 Business Strategy & the Environment, 2006, 15(1):1-14.
- [5] 林嵩.创业生态系统:概念发展与运行机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4):58-62.
- [6] 赵涛,刘文光,边伟军.区域科技创业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式与功能机制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31(24):78-82.
- [7] Mason C, Brown R.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nd growth 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C]//Workshop Organised by the OECD LEED Programmer and the Dutch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Hague, Netherlands, 2014:3-29.
- [8] Ács Z J, Autio E, Szerb L. Nat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43(3):476-494.
- [9] Isenberg D J. What an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actually i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4, 88(6):40-50.
- [10] Stam 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nd regional policy: A sympathetic critiqu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9):1795-1796.
- [11] 蔡莉,彭秀青, Satish N, 等.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回顾与展望[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1):5-16.
- [12] 孙金云,李涛. 创业生态圈研究:基于共演理论和组织生态理论的视角[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12):32-45.
- [13] Spigel B. The relational organiz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1):49-72.
- [14] Subrahmanya M B. How did Bangalore emerge as a global hub of tech start-ups in India?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evolution, structure and rol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2017, 22(1):1-22.
- [15] Auerswald P E, Dani L. The adaptive life cycle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The biotechnology cluster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9(1):97-117.
- [16] 张秀娥. 创业信息生态平衡机制构建[J]. 社会科学家, 2016(1):79-84.
- [17] Audretsch D B, Belitsk I M.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in cities: Establishing the framework conditions[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7, 42(5):1040-1051.
- [18] Erina I, Shatreovich V, Galesarkane E. Impact of stakeholder groups on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7, 25(5):755-771.
- [19] Roundy P T.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the logic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13(4):1221-1237.
- [20] Jung K, Eun J H, Lee S H. Exploring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government-drive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Lessons from centres for Creativ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CCEI) of South Korea[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7, 25:1-21.
- [21] Mack E, Mayer H. The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J]. Urban Studies, 2016, 53(10):2118-2133.
- [22] Stam E, Nooteboom B.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s[J].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1(1):421-435.
- [23] Foster G, Shimizu C, Ciesinski S, et 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round the globe and company growth

- dynamics[EB/OL]. (2013-09-03)[2018-03-13]. <http://www.weforum.org/docs/WEFEntrepreneurialEcosystems.pdf>.
- [24] Autio E, Levie J. Hard facts or soft insights? Fact-based and participative approaches to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policy and management [C]//ZEW Conference on Nat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 United States: Mannheim, 2014:20-21.
- [25] Thomas L D W, Autio E. The fifth facet: The ecosystem as an organizational field[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 2014(1): 10306.
- [26] Ghio N, Guerini M, Lehmann E E, et al. The emergence of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44(1):1-18.
- [27] Audretsch D B, Lehmann E E. 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2-122.
- [28] Jamshid G. 系统思维:复杂商业系统的设计之道[M]. 王彪,姚瑶,刘宇峰,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31-39.
- [29]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 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 71(3):75-83.
- [30] Bertalanffy L V. 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 林康义,魏宏森,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45-52.
- [31] Bruton G D, Ahlstrom D, Li H L.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move in the fut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0, 34(3):421-440.
- [32] Isenberg D J. The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strategy as a new paradigm for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for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hip [J]. Presentation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Affairs, 2011(5):1-13.
- [33] Gerald M W. 系统学思维导论[M]. 王海鹏,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2-50.
- [34] Isenberg D J. How to start an entrepreneurial revolu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0, 88(60):40-50.
- [35] Estrin S. Which institutions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4):564-580.
- [36] Stenholm P, Acs Z J, Wuebker R. Exploring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the rate and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28(1):176-193.
- [37] Fritsch M, Storey D J. Entrepreneurship in a regional context: Historical root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J]. Regional Studies, 2014, 48(6): 939-954.
- [38] Kapor R, Lee J M. Coordinating and competing in ecosystems: How organizational forms shape new technology investmen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3):274-296.
- [39] Zahra S A, Nambisan S. Entrepreneurship in glob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J].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Review, 2011, 1(1):4-17.
- [40] Galateanu A E, Avasilcai S. Symbiosis process in business ecosystem[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4(1036):1066-1071.
- [41] Yun J H J, Won D K, Park K B, et al. Growth of a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s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its effec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6, 24(12):2132-2133.
- [42] 张玉利,白峰. 基于耗散理论的众创空间演进与优化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1):22-29.
- [43] 周方涛. 区域科技创业人才生态系统构建及 SEM 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12(12):86-90.
- [44] Acs Z J, Estrin S, Mickiewicz T, et al. Institutions,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 role of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EB/OL]. (2017-02-03)[2018-03-13]. <https://ssrn.com/abstract=291245>.
- [45] Szerb L, Lafuente E, Horvath K, et al. The relevanc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entrepreneurship for regional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EB/OL]. (2017-10-08)[2018-03-13]. <https://ssrn.com/abstract=3036312>.
- [46] Dubina I N, Campbell D F J, Carayannis E G, et al.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spat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based on principles of the systems compromis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16, 8(2):1-18.
- [47] Bellmesterson J, Stangler D. Measuring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3):1-16.
- [48] Stenholm P, Acs Z J, Wuebker R. Exploring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the rate and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28(1):176-193.
- [49] Cunningham J A, Menter M, Wirsching K.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governance: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centered governance framework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3):1-18.
- [50] Riddle L, Hrivnak G A, Nielsen T M. Transnational diaspora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markets:

- Bridging institutional divid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10, 16(4): 398-411.
- [51] 万幼情, 胡强.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风险传导路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9): 178-179.
- [52] 陈璐, 吴洁, 盛永祥, 等. 专利创新生态系统中多主体竞合关系研究[J]. 情报杂志, 2017, 36(12): 82-89.

Research review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theory

YANG Junping, YU Qingqing, XIAO Su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s a core concept in explaining the sustained high growth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s become a new framework for entrepreneurial research.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theory, this paper reviewed and analyzed the frontier literature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defined the concept and six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and classified the current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typ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bject.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fect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were generalized, and then the future research in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 about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was proposed.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systematic theory;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责任编辑: 钱一鹤)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行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

詹舒琴,杨 君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基于价值链嵌入环节异质性的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相比前向参与率,制造业后向参与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提升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前向参与率有利于促进劳动收入的提升;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已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向高端演进的必要性突显。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后向参与率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38-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各国的贸易方式和规模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产业外向发展能力。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对一些行业原有的收入分配机制产生冲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发现,中国在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2008年以来虽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但每年仍低于50%的水平。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广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是否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原因及趋势,进而为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来优化收入分配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文献综述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产生及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对较

长的阶段,其测度方法也经历了较大变化。Hummels等^[1]首先提出垂直专业化衡量指标,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进出口统计数据来计算出口中包含了多少进口投入品。Koopman等^[2]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指标的测度方法,Wang等^[3]则进一步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问题。刘琳^[4]基于中国数据研究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向参与率相对后向参与率较低,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上游的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劣势^[5]。因此,未来应寻求中国产业发展的新型增长点,实现从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创新链上的转变^[6]。

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面,付文林等^[7]认为,中国嵌入低端价值链的发展模式极易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而开展的激烈竞争又加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劳动收入份额也因此下降,张少军^[8]也得到类似结论。出现这一结果的可

能原因是,中国出口结构正在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转移^[9],肖文等^[10]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因素方面,李稻葵^[11]认为国企改革使得劳动者在收入分配问题上的谈判权下降,因此国有企业比重下降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白重恩等^[12]的研究结论也与之相似。而罗长远^[13]则从国有企业改革后,支付的劳动力价格与“市场出清”的关系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还有外资的快速进入,Decreuse等^[14]认为随着中国的外资企业数量增多,外资企业对本国劳动力的竞争不断加剧,将会促进本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但邵敏等^[15]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中国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了不利影响。除此之外,李稻葵等^[16]还提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U型关系,白重恩等^[17]则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是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18]。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逐渐加深,虽然许多文献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可拓展之处。首先,参与全球价值链可分为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两种参与类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相关文献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视角的研究相对偏少;其次,多数文献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基于一国国内分行业的研究有待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便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完善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借鉴。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而不同要素密度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可能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差异化影响。对于劳动要素比较丰裕的国家,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因而能够提高国内劳动者的就业水平,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而对于资本要素较为丰裕的国家,则可能会出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过快发展,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前,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仍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因此可能会出现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现象,但同时资本密集型行业增长速度较快,劳动收入份额也可能因此出现下降。另外,由于不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环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制造业大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如加工和组装等环节,这些环节贸易附加值较低,工人工资也相对低廉,且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只能不断压低原本廉价的工人工资,因此过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

为了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建立的实证模型为:

$$ls_{it} = \alpha_0 ls_{it-1} + \alpha_1 GVC_{it} + \beta X_{it} + \epsilon_{it} + \mu_i,$$

其中:被解释变量 ls_{it} 为劳动收入份额;主要解释变量 GVC_{it} 为全球价值链嵌入指数,又分为前向参与率指数 iv_{it} 和后向参与率指数 fv_{it} ,指数的取值范围从0到1,数值越大表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该两项指标可借鉴 Koopman 等^[2]和刘琳^[4]的研究方法并利用 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发布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度。 X_{it}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比重 $State_{it}$ 、人均产出 py_{it} 、外商直接投资比重 fdi_{it} 、出口比重 exp_{it} 等。 i 表示行业, t 表示年份, ϵ 为残差项, μ 为行业效应,使用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消除该行业效应。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
ls	劳动收入份额指劳动报酬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	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
iv	外国产品使用本国中间品的程度	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fv	本国产品使用外国中间品的程度	2000—2014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
$State$	国有行业的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年鉴》
py	工业生产总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	《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年鉴》
fdi	外商直接投资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各省份《统计公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exp	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中国统计年鉴》

WIOD 于 2016 年发布的投入产出表采用 ISIC Rev4.0 行业划分标准,而中国行业划分依据在 2000—2014 年先后制定了 GB/T 4754—1994、GB/T 4754—2002 和 GB/T 4754—2011 三个标准,其中制造业均包含 13—43 大类。本文按照各个划分标准及其子目录对两者进行了匹配,共匹配出 17 个制造业的细分行业^[19-20],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匹配结果

产品名称	ISIC Rev4.0 行业	中国行业分类 (2011 年版)
食品饮料与烟草	C05	13、14、15、16
纺织服装与皮革	C06	17、18、19
木材软木草编制品(除家具)	C07	20
纸和纸制品	C08	22
记录媒介物	C09	23
焦炭与精炼石油产品	C010	25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	C011	26、28
药品、药用化学品及植物药材	C012	27
橡胶与塑料制品业	C013	2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C014	30
基本金属	C015	31、32
金属制品	C016	33
计算机电子与光学产品	C017	39
电力设备制造业	C018	38
机械与设备制造	C019	34、35、40
家具与其他制造	C022	21、24、41
交通运输设备	C020、C021	36、37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基于上文建立的实证模型,本文使用 2000—

2014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宏观数据(见表 1)进行分析。由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变量的滞后项 $L.ls$ 作为工具变量,然后根据 AR(2) 值与 Hansen 值判断工具变量的滞后项设定。为了消除行业效应,可以使用差分 GMM 方法进行回归;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依次交替加入解释变量的方法,将 GVC 分为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分别对整体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三类进行逐步回归,并同时报告了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的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中国制造业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制造业的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原因。虽然现阶段中国仍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21],但随着中国制造业资本投入的快速提升,中国参与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22],而参与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则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不利影响。相比较而言,制造业后向参与率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仍严重依赖国外先进中间品的进口,即仍以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为主^[23]。而中国出口的中间品仍与国外先进产品有着较大差距,全球竞争力较弱^[24],前向参与率较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表 3 制造业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L.ls$	0.836*** (0.006)	1.036*** (0.010)	0.835*** (0.009)	0.886*** (0.008)	0.975*** (0.009)	1.060*** (0.006)	0.886*** (0.009)	0.857*** (0.005)
iv	-0.032*** (0.002)	-0.085** (0.002)	-0.007*** (0.001)	-0.076** (0.028)	—	—	—	—
fv	—	—	—	—	-0.013 (0.011)	-0.018** (0.009)	-0.089*** (0.001)	-0.112*** (0.008)
$State$	—	—	0.095*** (0.006)	0.056*** (0.015)	—	—	—	0.038*** (0.008)
py	—	0.001*** (0.0001)	—	-0.001 (0.0001)	—	0.001*** (0.0001)	—	—
fdi	-0.014*** (0.001)	-0.030*** (0.004)	-0.151*** (0.006)	-0.103*** (0.004)	-0.052*** (0.004)	-0.033*** (0.005)	-0.069*** (0.003)	-0.097*** (0.003)
exp	-0.063*** (0.003)	—	—	-0.058*** (0.004)	-0.022*** (0.004)	—	-0.042*** (0.005)	-0.023*** (0.004)
C	0.038*** (0.001)	0.010* (0.003)	—	—	0.024*** (0.003)	-0.003 (0.004)	—	—
$Obs.$	392	392	364	364	392	392	364	364
$AR(2)$	0.10	0.12	0.64	0.29	0.16	0.11	0.19	0.27
$Hansen$	0.99	0.81	0.81	0.98	0.99	0.99	0.99	0.99

注: *、** 和 ***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出口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负向影响^[25]。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多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外包订单,出口产品价格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极易产生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纵向压榨”和“俘获”效应^[26],而在中国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的背景下,出口企业则会把上述不利效应传递给劳动者^[27],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向资本密集的产品转移也是出现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

国有企业比重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保障一定的就业水平,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28-30]。另外,国有企业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多高于非国有企业^[12],因此其比重的提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

人均产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均产出的提升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进入到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处于U型曲线的上行区间^[9, 16],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人均产出的增长而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时存在着激烈竞争,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进而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30]。另外,外资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水平也有助于其掌握较大的劳动定价权,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会尽可能地压低劳动

者的收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面效应。

(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为了区分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行业异质性,本文还将表2的行业进行分类,将C05、C06、C07、C08、C09和C022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余的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①,并分别进行回归。

表4报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与整体数据的回归结果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向参与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后向参与率的作用不显著。后向参与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中国通过进口国外中间品参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已无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31]。国内制造业企业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多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即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此时绝大部分的产品利润都被国外上游企业获取,国内企业仅能获取微薄的代工费用,利润空间不足也极大地限制了劳动的收入水平。且低端环节所需劳动力的技术水平相对不高,劳动收入多低于其他类型企业,因此该类企业增多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前向参与率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促进作用,则印证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嵌入的必要性。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多以先进中间品的生产、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等环节为主,需要大量高端劳动力参与其中,此类劳动者的收入也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前向参与率提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长^[32-33]。

表4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i>L, ls</i>	0.880*** (0.134)	1.168** (0.280)	0.700*** (0.055)	0.880*** (0.081)	1.211** (0.286)	0.773** (0.317)	0.873*** (0.089)	0.874** (0.172)
<i>iv</i>	0.164 (0.104)	0.338** (0.158)	0.334** (0.1725)	0.307** (0.137)	—	—	—	—
<i>fv</i>	—	—	—	—	0.745 (0.939)	-0.083 (0.158)	-0.012 (0.071)	0.126* (0.027)
<i>State</i>	0.124* (0.064)	0.116 (0.076)	0.159* (0.111)	—	—	0.074* (0.061)	0.091** (0.044)	0.109* (0.096)
<i>py</i>	0.001 (0.001)	—	0.0002 (0.000)	—	—	0.002** (0.001)	0.001* (0.001)	—
<i>fdi</i>	—	-0.096 (0.105)	—	0.083*** (0.013)	0.108* (0.145)	0.028* (0.102)	—	—
<i>exp</i>	—	—	—	-0.120** (0.042)	-0.420 (0.415)	—	—	-0.161** (0.042)
<i>C</i>	-0.045** (0.012)	-0.049 (0.026)	—	—	-0.065 (0.100)	-0.008 (0.030)	—	—
<i>Obs.</i>	112	112	104	104	112	112	104	104
<i>AR(2)</i>	0.15	0.17	0.16	0.10	0.18	0.13	0.13	0.18
<i>Hansen</i>	0.95	0.97	0.99	0.98	0.99	0.92	0.99	0.98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①该处所指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包含了中低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

(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表5报告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与劳动密集型数据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参与率和后向参与率的提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仍相对较低,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的低端生产环节,即多基于后向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极易导致产业陷入“低端锁定”陷阱^[33],不利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积累与提升,进而导致行业利润水平与劳动收入长期处于低位,因此技术密集型产业后向参与率的提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另外,技术

密集型产业前向参与率提升也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前向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仅对产业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还极易遭遇到发达国家的围追阻截,而现阶段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仍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因此短期内仍较难实现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34]。当前,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原创性技术的缺失,还导致了产业发展对国外先进技术,特别是先进资本设备的依赖,即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现出十分明显的资本引进和积累特征,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的提升而下降。

表5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后向参与率回归结果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系统1	系统2	差分1	差分2
<i>L, ls</i>	0.969*** (0.008)	0.844*** (0.032)	0.701*** (0.011)	0.719*** (0.013)	0.990*** (0.007)	0.971*** (0.011)	0.731*** (0.013)	0.770*** (0.004)
<i>iv</i>	-0.047** (0.017)	-0.064** (0.030)	-0.012*** (0.002)	-0.023*** (0.003)	—	—	—	—
<i>fv</i>	—	—	—	—	-0.066*** (0.0105)	-0.058** (0.017)	-0.107*** (0.014)	-0.067** (0.022)
<i>State</i>	—	-0.009 (0.011)	0.171*** (0.012)	0.082*** (0.011)	—	-0.012 (0.039)	0.135*** (0.018)	0.106*** (0.013)
<i>py</i>	0.001*** (0.000)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0)	0.001*** (0.002)	—
<i>fdi</i>	-0.025*** (0.002)	-0.039*** (0.005)	-0.071*** (0.004)	-0.045*** (0.005)	-0.021*** (0.004)	-0.013** (0.004)	-0.130*** (0.009)	-0.111*** (0.005)
<i>exp</i>	-0.015** (0.004)	0.001 (0.013)	—	-0.214*** (0.017)	—	0.008 (0.012)	—	-0.066*** (0.012)
<i>C</i>	0.012*** (0.002)	0.036*** (0.007)	—	—	0.006 (0.004)	0.001 (0.003)	—	—
<i>Obs.</i>	280	280	260	260	280	280	260	260
<i>AR(2)</i>	0.13	0.16	0.28	0.15	0.12	0.10	0.60	0.52
<i>Hansen</i>	0.99	0.95	0.98	0.95	0.98	0.96	0.97	0.99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上文使用两种GMM方法进行分析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另外,笔者使用工具面板法(2SLS方法)再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与上文结果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嵌入环节异质性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a)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嵌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率均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一个可能原因便是制造业嵌入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大于嵌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增长速度。相对而言,由于中国制造业对后向参与的依赖较强,后向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

b)劳动密集型行业前向参与率的提升是促进

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制造业深度嵌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后向参与率提升已无法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现阶段,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加快技术创新,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通过前向参与率提升推进劳动收入份额增长。

c)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有着不利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仍较低,主要依赖进口先进的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中多嵌入低端环节,极易因被发达国家“锁定”而陷入“低端生产”陷阱,因此国内产业环节获取的收益明显低于国外上游企业。另外,低端生产环节劳动力以低技术劳动者为主,抑制了对高收入的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进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d)在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国有企业比重和人均产出对劳动收入份额均有着促进作用,出口有着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则存在着行业异质性。

过多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是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未来制造业发展应积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进而在加快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同时,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鉴于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未来我国制造行业的发展除了应发挥传统劳动禀赋优势之外,更应着手加速技术禀赋优势打造,加快实现技术要素禀赋对制造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35],不断促进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参考文献:

- [1] Hummels D L, Rapoport D, Yi K M.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7, 4(Jun): 79-99.
- [2]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et al. Giv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R].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No. 16426.
- [3] Wang Z, Wei S J,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R].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No. 19677.
- [4] 刘琳.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 基于附加贸易的考察[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6): 71-83.
- [5] 刘敏.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的参与度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7: 16-17.
- [6] 刘志彪. 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 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J]. 学术月刊, 2015, 47(2): 5-14.
- [7] 付文林, 赵永辉. 价值链分工、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J]. 财经研究, 2014, 40(1): 50-60.
- [8] 张少军. 全球价值链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来自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15(10): 39-48.
- [9] 罗长远, 张军.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09(5): 25-35.
- [10] 肖文, 周明海. 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40(6): 154-163.
- [11] 李稻葵. 重视中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J]. 新财富, 2007(9): 40-41.
- [12] 白重恩, 钱震杰.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经济研究, 2009, 44(3): 27-41.
- [13] 罗长远. 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 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J]. 世界经济, 2008(11): 86-96.
- [14] Deceuse B, Maarek P.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R]. Cergy: THEMA Working Papers, 2008.
- [15] 邵敏, 黄玖立.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0, 9(4): 1189-1210.
- [16]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 2009, 44(1): 70-82.
- [17] 白重恩, 钱震杰.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10, 33(12): 3-27.
- [18] 肖文, 周明海.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 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 32(3): 69-76.
- [19] 刘胜, 顾乃华, 陈秀英. 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 2016(3): 96-104.
- [20] 蒋庚华, 吴云霞. 全球价值链位置对中国行业内生产要素报酬差距的影响: 基于WIOD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 财贸研究, 2017, 28(8): 44-52.
- [21] 陆菁, 刘毅群. 要素替代弹性、资本扩张与中国工业行业要素报酬份额变动[J]. 世界经济, 2016, 39(3): 118-143.
- [22] 张相伟, 陆云航.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31(1): 59-76.
- [23] 李晓露.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影响因素研究[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12-13.
- [24] 唐东波. 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11(8): 23-33.
- [25] 余森杰, 梁中华.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基

- 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4V32(7):22-31.
- [26] Kaplinsky R. Spreading the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 [J].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2004, 47(2): 74-115.
- [27] 张杰, 陈志远, 周晓艳. 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 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29(7): 44-60.
- [28] 戴小勇, 成力为. 出口与 FDI 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14(8): 74-80.
- [29] 盛丹, 陆毅. 国有企业改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吗? [J]. 金融研究, 2017(1): 69-82.
- [30] 张中元. 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影响[J]. 国际经济合作, 2017(10): 31-39.
- [31] 黄先海, 徐圣.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 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09, 44(7): 34-44.
- [32] 罗知, 周丽云, 李浩然. 劳动收入占比与偏向型技术进步[J]. 世界经济文汇, 2017(2): 1-15.
- [33] 王岚.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 统计研究, 2014, 31(5): 17-23.
- [34] 王永进, 盛丹. 要素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4): 33-50.
- [35] 蒋为, 黄玖立. 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与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4, 37(5): 28-50. 65-68.

The impact of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on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embedding link

ZHAN Shuqin, YANG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 of value chain embedding link,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lev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d its impa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and the industry differenc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is the important cause for the decline i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pared with the forward participation rate, the backward participation rat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mor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enhancing forward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labor income; the participation of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 in the low-end production link of global value chain ha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abor income share, which shows the necessity of turning to the high-end.

Key words: labor income share; global value chain; forward participation rate; backward participation rate

(责任编辑: 陈丽琼)

具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外卖供应链决策与博弈

韩曙光^a, 丁根基^b

(浙江理工大学, a. 理学院; b. 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为了更好地规范外卖市场,使该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让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获利最大化且消费者获得更高质量的餐饮,文章探讨了外卖供应链协调问题。根据市场调研数据,结合餐饮外卖的价格、口感与质量水平,建立餐饮外卖的市场需求函数;探讨具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根据 CVaR 风险度量准则,利用斯坦伯格博弈理论,针对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各自的风险容忍度,制定出合理的餐饮外卖价格和口感与质量水平策略,并与风险中性的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组成的二级供应链进行对比。研究表明,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取某区间值时,集中式决策下餐饮外卖具有更低的价格和较高的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这对于餐饮商家、外卖平台和消费者都是共赢的。

关键词: 餐饮外卖; 价格; 口感与质量水平; 风险规避供应链; 斯坦伯格博弈; 条件风险价值

中图分类号: F2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45-08

进入“互联网+”时代,国内涌现了大量餐饮外卖 O2O 平台,“饿了么”、“美团外卖”、到家美食会等外卖平台相继成立。“饿了么”外卖平台成立于 2009 年,目前覆盖全国 2000 个城市,加盟餐厅数量 130 万家,用户数量约 2.6 亿人。“美团外卖”成立于 2013 年,目前覆盖全国 1300 个城市,加盟餐厅数量超过 100 万家,用户数量约 2 亿人。据易观数据网显示^[1],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交易份额 2014 年为 152 亿元,到 2017 年达到 2078 亿元,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3595 亿元,可见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很多白领上班族、大学生都选择外卖用餐,省时方便是餐饮外卖行业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之一。

郑海宇等^[2]从餐饮外卖的食品安全隐患和交通安全隐患着手进行分析,最终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王妍捷^[3]和刘文昌等^[4]分析了目前外卖行业的特点,并对团购模式和外卖 O2O 模式各个环节加以对比,指出当前我国外卖行业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最后给出发展对策。于赫等^[5]和常俏^[6]介绍各大 O2O 外卖平台的物流配送特点,指出了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相应解决措施。冉文江等^[7]针对餐

饮外卖时效性问题的研究表明,定点定时的集中物流配送模式可以大大节约配送时间,提升客户满意度。从已有研究可知,餐饮外卖行业顺应了互联网时代潮流,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是具有风险偏好的,而风险规避特性使企业对供应链的选择难以协调。代建生等^[8]探讨了 CVaR(条件风险价值)风险度量准则下,把产品促销因素作为市场需求波动弄的动因,运用收益共享契约,使得风险规避供应链得到缓解。叶飞等^[9]和林强等^[10]研究了当供应商的产品供给具有不可靠性时,运用收益共享契约机制使得损失最小利润达到最大化,获得了最优订货决策。Xu 等^[11]研究了当二级供应链具有风险规避行为时,供应链成员的定价和协调,运用 CVaR 方法考察了风险规避型供应链的协调问题。Dai 等^[12]进一步考察了订购、促销和定价联合优化决策,对基于 CVaR 的两种订货模式比较研究策略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冯艳刚等^[13]运用 CVaR 方法构建一个具有可替代产品的报童博弈模型,研究了商品的替代率以

及零售商的风险厌恶程度对最优决策的影响。朱传波等^[14]等运用 CVaR 度量工具,研究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零售商订货策略,并分析零售商最优订货量对供应商可靠性及对其自身的风险规避系数的敏感性。闻卉等^[15]研究的背景是需求具有随机性,而供应链成员正是为了规避这种需求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他们设计了一个回购契约来优化供应链,研究风险规避水平对批发价格的影响。代建生等^[16]对风险规避零售商的订购与促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零售商越规避风险,其订购量和促销努力就越小。Ma 等^[17]则只考虑供应链单个成员具有风险规避特性,并未考虑多个供应链成员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博弈问题。浦徐进等^[18]考察了公平对于促销努力水平和供应链运作效率的影响。简惠云等^[19]建立了随机利润分配函数,该函数使得研究贴切生活实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带有风险偏好下的报童 CVaR 问题。郭飞等^[20]采用 CVaR 准则研究了风险偏好对供应商或零售商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供应链协调契约机制设计。总体而言,并非所有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供应链都可以得到完美协调和优化,因为所有风险中立下的供应链不能保证得到相应优化和协调,这就使得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供应链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契约去协调。

由于以往的需求函数大部分只是和价格建立一定的联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产品的需求函数不仅和商品的价格有关,还和商品的质量水平、服务、品牌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对需求函数进行改进,针对餐饮外卖行业建立市场需求函数模型,再对该行业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餐饮外卖的市场需求与质量高度相关。经过分析得出,价格、口感与质量水平共同决定外卖餐饮的需求函数。最后假设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具有风险规避特性,根据供应链决策与博弈研究,得到综合考虑口感、质量、价格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区间。而不考虑风险因素的供应链协调只是把供应链成员都视为风险中性的,未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本文将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供应链与实际生活中的餐饮外卖供应链结合,可以让拥有不同风险喜好的供应链成员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产品定位,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

一、餐饮外卖需求函数

(一)需求函数研究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①,市场需求 D 与价格 p 并不是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对高校(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公司(杭州市滨江区博世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周边 2017 年 4 月餐饮外卖月需求量与价格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 D 与 p 分别呈现图 1 和图 2 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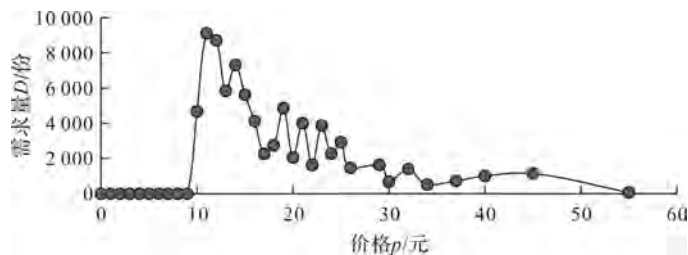


图 1 2017 年 4 月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周边餐饮外卖月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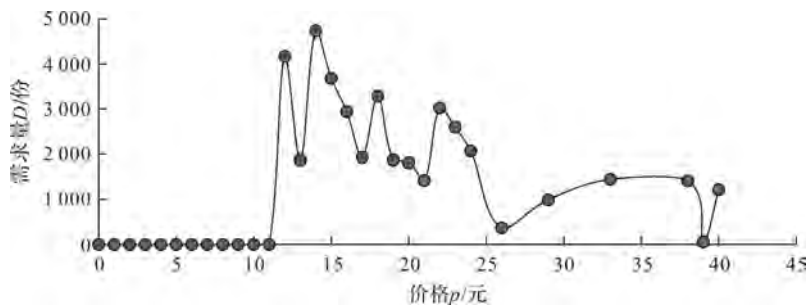


图 2 2017 年 4 月杭州市滨江区博世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周边餐饮外卖月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从图 1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并不是餐饮外卖的价格越高,需求量就越低,而是呈现一个需求量先随

着价格增加而增加,过了某个价格拐点后,需求量随着价格增加而减少的趋势。价格低于 9 元的外卖基

① 数据来源:“美团外卖”APP 实时数据整理。

本没有,这可能是由于:一是价格太低,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的利润以及外卖骑手的物流费用得不到保证;二是价格太低的外卖,消费者担忧食品安全与口感质量而不敢尝试。而图1和图2的价格拐点也各不相同,浙江大学与浙江理工大学周边外卖需求量出现价格拐点约为13元,杭州市滨江区博世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周边外卖需求量出现价格拐点约为16元,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学生和公司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存在差异。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 D 与 p 的关系是: $D=\alpha-\beta p$ (α 表示市场稳定情况下的固有需求, β 表示消费者对产品零售价格的敏感系数, $0<\beta<1$)。但在加入了消费者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 x 这一变量后,基于图1和图2得到的需求与价格二者关系却如图3所示。亦即, D 是由 p 与 x 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起见,忽略诸如物流配送速度、平台的品牌影响力、配送员态度等其他影响因素)。而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和餐饮商家制作成本 C 直接相关, x 越高, C 就越高。此外, C 和 p 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 C 越高, P 越高,这是为了限制低制作成本的餐饮外卖冒充高口感与质量的外卖而标高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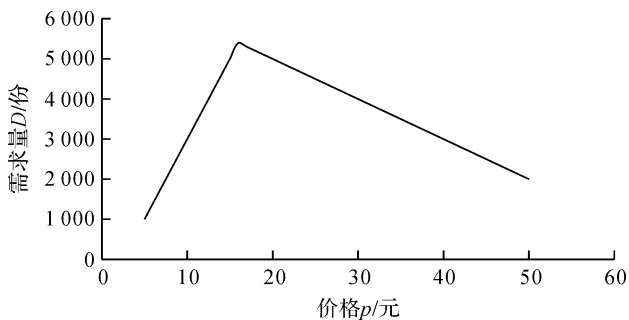


图3 市场需求量和价格之间关系

由上可知,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D=\alpha-\beta p+\theta x$ (θ 表示市场需求对产品口感质量的敏感系数, $\theta>0$)。 θ 越高,就意味着对消费者餐饮口感与质量认可度越高。 x 越高, p 也就越高。图3是需求与价格之间关系的函数图像,同时考虑了 x 。当 p 是 x 的近似二次方关系时,需求函数和产品定价以及产品口感与质量呈现图1与图2走向。因此可以把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参数 x 进行量化,即投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成本是 nx^2 ,其中 n 表示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投入成本系数。但斌等^[21]研究也表明了质量与成本之间呈现图3的函数走势。

因此,并不是商品价格越低,消费者的需求就越高。一方面,价格低意味着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将下降,所以消费者需求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商品价

格很高,虽然餐饮质量有所提升,满足了消费者的饮食安全和口感,但价格过高也可能成为消费者的负担。

(二)基本假设

- a) D 只与 p 和 x 有关,和其它因素无关;
- b) C 和 x 越高, p 也就越高,这主要是为了限制低制作成本的餐饮外卖冒充高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外卖;
- c) 餐饮平台的外卖口感与质量的投入成本是 $C_s=nx^2$;
- d) 外卖平台和餐饮商家都是理性个体;
- e) 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关于对方的成本和利润是透明的,且信息对称。

(三)基本模型构建

根据一般市场规律可知, $D=\alpha-\beta p$,因此餐饮外卖的需求函数为:

$$D=\alpha-\beta p+\theta x, (\alpha>0, \beta>0, \theta>0) \quad (1)$$

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即: $\alpha=\bar{\alpha}+\epsilon$,这里的 $\bar{\alpha}$ 是餐饮外卖潜在的固定性需求, ϵ 为受外界因素干扰的需求波动,如经济波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干扰,可能是负数也可能是正数,这里期望 $E(\epsilon)=0$,方差 $\text{Var}(\epsilon)=\mu^2$,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平台都知道需求情况,相应地按照这个需求标准来生产与运营。

风险规避型供应链成员的预期收益为 λ 。具有风险特性的供应链成员会综合考虑期望收益与期望收益方差,所以采用均值与方差的方式建立效用函数:

$$U=\lambda-\frac{\text{Var}(\lambda)}{T} \quad (2)$$

二、风险规避型供应链决策与博弈模型

目前,外卖O2O平台逐渐从井喷式发展过渡到成熟期,尤其是消费者和餐饮外卖商家可以网上互相评价、信息相对透明之后,消费者的关注重点也逐渐从价格转到餐饮外卖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物流配送和商家品牌等。为了在提高外卖销量的同时获得消费者好评,高质量的外卖成为现在餐饮外卖商家追逐的目标之一。“飞猫送餐”、“蹭饭网”、“品品美食”、“阿姨厨房”、“有饭局”、“果粉厨房”等外卖平台纷纷倒闭,归结原因都是败在价格战和外卖质量问题上。2017年8月24日,“饿了么”宣布与“百度外卖”合并,“百度外卖”成为“饿了么”的全资子公司,外卖平台也从“三足鼎立”,变成了“两雄争霸”,

外卖行业竞争异常激烈,在经历价格战之后,外卖口感与质量成为了大众首选因素。

白领市场的餐饮外卖规模一直都很稳定,但是校园周边餐饮外卖市场需求经常波动较大。一是学生假期多且长,所以寒暑假期间学校周边的餐饮外卖需求量急剧减少,生意冷淡。二是遇上雨雪天气时,更多学生选择点外卖进行用餐,导致外卖数量的急剧暴增。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如何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样很重要。

带有风险规避型的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外卖平台组成了二级供应链。构建分散式决策和集中式决策模型可以分别分析双方的风险容忍度对各自决策行为的影响。

(一)分散式决策下的风险规避型供应链协调

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商家的期望收益为:

$$\lambda_s = (\omega - c)(\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nx^2 \quad (3)$$

其中, ω 表示餐饮平台买进餐饮商家单位外卖的成本。

餐饮外卖商家期望利润 λ_s 的方差为 $\text{Var}(\lambda_s)$, 则:

$$\text{Var}(\lambda_s) = (\omega - c)^2 \mu^2 \quad (4)$$

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商家的效用函数为:

$$U_s = (\omega - c)(\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nx^2 - \frac{(\omega - c)^2 \mu^2}{T_s} \quad (5)$$

其中, T_s 表示餐饮外卖商家的风险容忍度。

同理,可以得知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平台的期望利润为:

$$\lambda_m = (p - \omega)(\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quad (6)$$

餐饮外卖平台的期望利润 λ_m 的方差 $\text{Var}(\lambda_m)$:

$$\text{Var}(\lambda_m) = (p - \omega)^2 \mu^2 \quad (7)$$

则风险规避型餐饮外卖平台的效用函数为:

$$U_m = \lambda_m - \frac{\text{Var}_m}{2T_m} = (p - \omega)(\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frac{(p - \omega)^2 \mu^2}{T_m} \quad (8)$$

其中, T_m 表示餐饮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这里的风险容忍度 T_s 和 T_m 分别表示餐饮外卖商家和平台企业对外界因素变化所表现的风险承受能力。当风险容忍度趋向于无穷大时,表示企业对风险是中性的且有能力做出调整;当风险容忍度很小时,表示企业对风险是厌恶的且不具备很强的应对能力。需要说明的是,当企业风险容忍度很大或者趋向于无穷大时,供应链是风险中性的,即供应链上的成员不惧怕任何风险,具备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在分散式供应链决策模型下,也可得出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餐饮外卖商家和外卖平台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U_s = \lambda_s - \frac{\text{Var}_s}{T_s} = (\omega - c)(\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nx^2 - \frac{(\omega - c)^2 \mu^2}{T_s} \quad (9)$$

$$U_m = \lambda_m - \frac{\text{Var}_m}{T_m} = (p - \omega)(\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frac{(p - \omega)^2 \mu^2}{T_m} \quad (10)$$

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外卖平台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接下来分别求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外卖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分析二者对餐饮外卖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和价格的决策。

1. 餐饮外卖平台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

在餐饮外卖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中,餐饮平台是供应链的主导者,其趋向于给出的餐饮外卖价格 p_m 。当餐饮商家观察到 p_m ,会选择对自己利润最优的 x_s^* ,而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也就变成了餐饮平台已知的 x_m^* ,餐饮平台基于餐饮商家给出的 x_m^* ,再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 p_m^* ,最终基于以上博弈确定策略。

因为 x 由餐饮外卖商家决定,所以对餐饮外卖商家的效用函数 U_s 求餐饮外卖平台的 x_m 一阶偏导数:

$$\frac{\partial U_s}{\partial x_m} = (\omega - c)\theta - 2nx \quad (11)$$

又因为 $\frac{\partial^2 U_s}{\partial x_m^2} < 0$,餐饮商家的效用函数关于口感

与质量投入水平是凹函数,令 $\frac{\partial U_s}{\partial x_m} = 0$,得出餐饮平台最优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x_m^* = \frac{\theta(\omega - c)}{2n} \quad (12)$$

把餐饮外卖平台认为的最优 x_m^* 代入到餐饮平台的效用函数 U_m ,得:

$$U_m = \lambda_m - \frac{\text{Var}_m}{T_m} = (p - \omega)(\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_m^*) - \frac{(p - \omega)^2 \mu^2}{T_m} \quad (13)$$

再对餐饮平台的效用函数求其价格的一阶偏导数,得:

$$\frac{\partial U_m}{\partial p_m} = \bar{\alpha} + \theta x_m^* + \omega\beta - 2\beta p - \frac{2\mu^2(p - \omega)}{T_m} \quad (14)$$

因为 $\frac{\partial^2 U_m}{\partial p_m^2} = -2\beta - \frac{2\mu^2}{T_s} < 0$,餐饮平台的效用函数是关于价格的凹函数,令 $\frac{\partial U_m}{\partial p_m} = 0$,得到餐饮外卖

平台决定的最优价格:

$$p_m^* = w + \frac{\bar{\alpha} + \theta x_m^* - \beta w}{2\beta + \frac{2\mu^2}{T_m}} \quad (15)$$

在餐饮外卖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中, x_m^* 不依赖于 T_m , 也不依赖于市场需求波动 μ 。结果表明, x_m^* 与 T_m 和 μ 无关, 风险规避型供应链策略下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和风险中立供应链策略下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一样。 p_m^* 和 T_m 成正比关系, T_m 越高, p_m^* 相应就越高, 但是 p_m^* 与 μ 成反比。结果表明, 餐饮价格和 T_m 有密切关系, 风险规避型供应链策略下的价格要比风险中立供应链下的价格低。

2. 餐饮外卖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

在餐饮外卖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博弈中, 餐饮商家是供应链的主导者, 其趋向于给出 x_s 。当餐饮平台观察到餐饮商家的 x_s 后, 会选择对自己利润最优的 p_m^* , 而当餐饮平台观察到餐饮商家给出的 p_m^* 时, 餐饮平台给出的餐饮外卖价格也就变成了餐饮商家已知的 p_s^* , 再次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 x_s^* , 最终基于以上博弈确定策略。

因为 p 由餐饮外卖平台决定, 所以对 U_m 求餐饮外卖商家 p_s 的一阶偏导数:

$$\frac{\partial U_m}{\partial p_s} = \bar{\alpha} + \theta x + w\beta - 2\beta p - \frac{2\mu^2(p-w)}{T_m} \quad (16)$$

又因为 $\frac{\partial^2 U_m}{\partial p_s^2} = -2\beta - \frac{2\mu^2}{T_s} < 0$, 餐饮商家的效用

函数关于价格是凹函数, 所以令 $\frac{\partial U_m}{\partial p_s} = 0$, 得到餐饮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价格:

$$p_s^* = \frac{T_m(\bar{\alpha} + \theta x + \beta w) + 2\mu^2 w}{\beta T_m + 2\mu^2} \quad (17)$$

式(17)记为 $p(x)$ 。把餐饮商家认为的最优 p_s^* 代入到餐饮商家的 U_s , 得:

$$U_s = (w-c)(\bar{\alpha} - \beta p(x_s) + \theta x) - nx^2 - \frac{(w-c)^2 \mu^2}{T_m} \quad (18)$$

对餐饮商家的效用函数求其外卖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的一阶偏导数, 得:

$$\frac{\partial U_s}{\partial x_s} = (w-c)[\theta - \beta p'(x_s)] - 2nx \quad (19)$$

其中, $p'(x) = \frac{\theta T_m}{2\beta T_m + 2\mu^2}$ 。又因为 $\frac{\partial^2 U_s}{\partial x_s^2} = -2n < 0$, 餐饮商家的效用函数关于外卖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是凹函数, 令 $\frac{\partial U_s}{\partial x_s} = 0$, 得餐饮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外卖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x_s^* = \frac{\theta(w-c)}{2n} - \frac{\beta}{4n\left(\beta + \frac{\mu^2}{T_m}\right)} \quad (20)$$

将最优 x_s^* 代入到餐饮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 p_s^* , 可以得到:

$$p_s^* = w + \frac{\bar{\alpha} + \theta x_s^* - \beta w}{2\beta + \frac{2\mu^2}{T_m}} \quad (21)$$

在餐饮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中, x_s^* 不仅依赖于 T_m , 也依赖于市场需求波动的 μ , 这和餐饮平台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中完全不一样。这里的 x_s^* 也依赖于 μ , 且与 μ 成正比, 与 T_m 成反比。餐饮外卖商家决定的最优 p_s^* 和 T_m 成正比关系, 风险容忍度 T_m 越高, p_s^* 就越高, 但是和 μ 成反比, 这点和餐饮商家的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策略中 p_m^* 相同。

(二) 集中式决策下的风险规避型供应链协调

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平台组成的整体供应链总期望利润为:

$$\lambda = (p-c)(\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nx^2 \quad (22)$$

餐饮外卖供应链集中式决策下的期望利润 λ 的方差为 $\text{Var}(\lambda)$, 则:

$$\text{Var}(\lambda) = (p-c)^2 \mu^2 \quad (23)$$

风险规避下集中式决策的效用函数为:

$$U = \lambda - \frac{\text{Var}(\lambda)}{2(T_m + T_s)} = (p-c)(\bar{\alpha} - \beta p + \theta x) - nx^2 - \frac{(p-c)^2 \mu^2}{T_m + T_s} \quad (24)$$

在集中式决策下使得餐饮 p 和 x 合理化, 利润最大化, 分别对利润函数的餐饮 p 和 x 求一阶偏导和二阶偏导: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p} = -2\beta p + \bar{\alpha} + \theta x + \beta c - \frac{2(p-c)\mu^2}{T_m + T_s} \quad (25)$$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x} = \theta p - \theta c - 2nx \quad (26)$$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x^2} = -2n \quad (27)$$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p^2} = -2\beta - \frac{2\mu^2}{T_m + T_s} \quad (28)$$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p \partial x} =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x \partial p} = \theta \quad (29)$$

得到海塞矩阵:

$$H(p, x) = \begin{bmatrix}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p^2} &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x \partial p} \\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p \partial x} & \frac{\partial^2 \lambda}{\partial x^2}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2\nu - \frac{2\mu^2}{T_m + T_s} & \theta \\ \theta & -2\nu \end{bmatrix} \quad (30)$$

当 $(-2n)\left(-2n - \frac{2\mu^2}{T_m + T_s}\right) - \theta^2 > 0$ 时, 海塞矩阵负定, 函数存在最优解。

$$\text{令 }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x} = 0 \text{ 得 } x^* = \frac{(\bar{\alpha} - \beta c)\theta}{2n\left(2\beta + \frac{2\mu^2}{T_m + T_s}\right) - \theta^2} \quad (31)$$

$$\text{令 }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p} = 0 \text{ 得 } p^* = c + \frac{2n(\bar{\alpha} - \beta c)}{2n\left(2\beta + \frac{2\mu^2}{T_m + T_s}\right) - \theta^2} \quad (32)$$

以上求出了分别在集中式决策和分散式决策下的最优价格、最佳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和利润。由于公式比较复杂, 不便于进一步判断大小关系, 接下来将结合案例具体分析。

三、案例分析

H 餐饮商家是浙江理工大学周边的一家餐饮公司, 主要经营各式面类饮食和米饭类饮食, 经营对象主要是周边学校的大学生, 商家产品线上线下同时销售。学生考虑到餐饮商家距离学校比较近, 外卖骑手的运输也需要一定时间, 因此外卖口感、质量没有线下高, 所以大多数学生在线下进行消费。考虑到这些问题, 本文对 H 餐饮商家进行一定的餐饮口感和质量提升, 主要是增加餐饮分量、进一步

改进食材口感、提升运输包装盒保温效果等。每份餐饮生产成本 $c=8$ 元, 市场规模 $\alpha=2000$ 份外卖, $\beta=70$, $\theta=30$, 餐饮口感和质量成本系数 $n=30$ 。因为 x_s^* 、 x_m^* 、 x^* 、 p_s^* 、 p_m^* 和 p^* 都是有关于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度 T_m 的函数, 这里把 T_s 看作常数, 设为 $T_s=60$; 为了反映风险容忍度对餐饮价格和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影响, 把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度 T_m 设置一个范围, $T_m \in [0, 150]$ 。

(一) 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影响

从图 4 可以看出, 当 T_m 在 95 附近时, $x^* = x_s^* = x_m^*$; 当 $T_m < 95$ 时, $x^* < x_s^* = x_m^*$; 当 $T_m > 95$ 时, $x^* > x_s^* = x_m^*$ 。在分散式决策下, 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斯坦博格博弈的供应链协调结果表明, 它们具有一样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在集中式决策下, 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随着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增加而增加。当餐饮外卖平台偏向于风险中性时即餐饮外卖风险容忍度很大, 集中式决策下餐饮外卖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大于具有风险规避特性下的供应链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结果表明, 当 T_m 较小时 ($T_m < 95$), 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分散式餐饮供应链有着较大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投资; 当 T_m 较大时 ($T_m > 95$), 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集中式供应链有着较大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投资。从图 4 并无法判断哪种决策下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一定优于另一种决策, 因为好的决策和许多因素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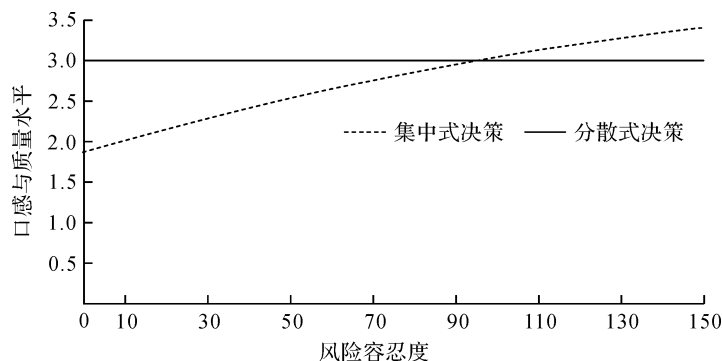


图 4 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影响

(二) 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价格的影响

从图 5 可以看出, $p^* < p_s^* = p_m^*$, 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分散式餐饮供应链的价格总是大于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集中式供应链的价格。无论是分散式还是集中式决策, 餐饮外卖的价格都是随着餐饮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增加而增加。当餐饮外卖平台偏向于风险中性时即餐饮外卖风险容忍度很大, 餐饮

外卖的价格是要大于具有风险规避特性下的供应链价格。以上表明, T_m 直接影响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餐饮供应链的价格决策。结合 T_m 与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的图像来看, 当 T_m 较大时 ($T_m > 95$), 集中式决策下的餐饮外卖比起分散式决策下的餐饮外卖有着更高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投入水平, 但是却有较低的餐饮外卖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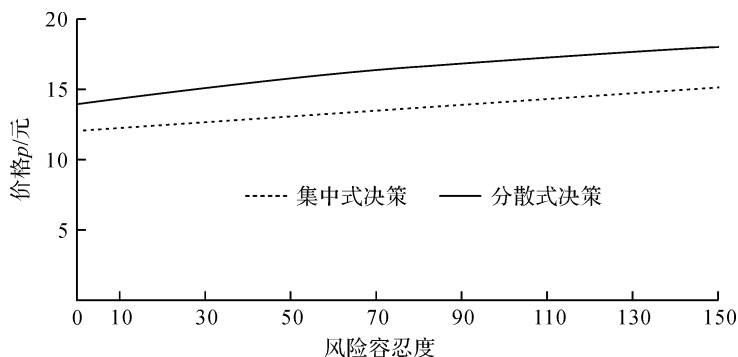


图5 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价格的影响

(三) 风险容忍度对总利润的影响

从图6可以看出,带有风险规避特性的集中式供应链的总利润总是要大于分散式供应链的总利润。无论是分散式还是集中式决策,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的总利润随着餐饮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增加而增加。当餐饮外卖平台偏向于风险中性时即餐饮外卖风险容忍度很大,无论是分散式供应

链还是集中式供应链,利润都是会大于具有风险规避特性下的供应链利润。这也不难理解,当餐饮外卖平台是风险中性时,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所处的环境是没有需求波动等外界因素困扰或者对外界因素的困扰具有完全抵抗能力,此时利润肯定大于对外界环境因素改变而不能适应的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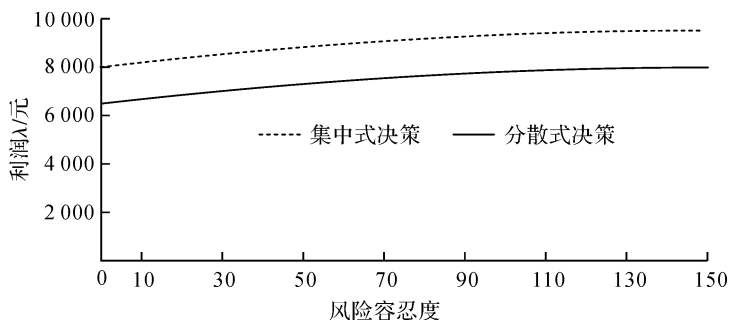


图6 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对总利润的影响

四、结 语

本文探讨了餐饮外卖商家和餐饮平台的风险规避行为,发现当餐饮商家的风险容忍度取某个固定值时,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和需求的波动直接影响外卖的价格、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和总利润。当餐饮商家的风险容忍度固定,餐饮平台的风险容忍度高于某个值时,集中式决策是作为有效的方法可以获得更高的餐饮外卖的口感与质量水平。集中式供应链下的外卖价格总是低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外卖价格,利润却高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利润。集中式决策下存在一个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度的区间,在此区间范围内,形成低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外卖价格,但是高于分散式决策下的外卖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外卖。这个区间对于餐饮商家和餐饮平台很重要,尤其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得到高的口感与质量水平的外卖。而当餐饮平台趋向于风险中性时,恰好使得餐饮平台风险容忍度在该区间,也就说明具

有风险中性的餐饮平台可以让外卖具有更好的餐饮口感与质量水平,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供应链成员利润。该结论对于餐饮外卖市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现实生活中的外卖市场并不成熟,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可以根据市场定位和风险偏好,再结合供应链其他成员的情况共同决定餐饮外卖的口感与质量水平和价格,这样可以让整个供应链成员的利润最大化。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假定餐饮商家的风险容忍度是固定值,这并不现实。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餐饮商家和外卖平台的风险容忍度同时变化,以便更好地刻画风险容忍度对餐饮外卖供应链成员的决策行为影响。

参考文献:

- [1] 杨旭. 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年度综合分析 2018 [EB/OL]. (2018-03-21) [2018-05-13]. <https://www.analysys.cn/analysis/trade/detail/1001246/>.
- [2] 郑海宇, 李林. 餐饮外卖行业的安全隐患及对策[J]. 物

- 流工程与管理, 2016, 38(12): 153-155.
- [3] 王妍捷. 外卖 O2O 市场下的物流策略研究[J]. 物流技术, 2015, 34(10): 23-25.
- [4] 刘文昌, 丁菲, 何奎. 基于 O2O 模式的餐饮外卖行业发展对策研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2015, 17(5): 23-25.
- [5] 于赫, 王忠吉. 浅析当今餐饮行业 O2O 运营模式[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16, 38(8): 77-80.
- [6] 常俏. 外卖 O2O 时效安全有待升级[J]. 中国物流与采购, 2016(5): 48-50.
- [7] 冉文江, 杨丽玲, 曹一, 等. 网络订餐配送 O2O 闭环模式探讨[J]. 江南大学学报, 2016, 15(2): 92-97.
- [8] 代建生, 孟卫东. 风险规避下具有促销效应的收益共享契约[J]. 管理科学学报, 2014, 17(5): 25-33.
- [9] 叶飞, 林强. 风险规避型供应链的收益共享机制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2, 26(1): 113-118.
- [10] 林强, 叶飞, 陈晓明. 随机弹性需求条件下基于 CVaR 与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决策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1, 31(12): 2296-2307.
- [11] Xu G Y, Dan B, Zhang X M. Coordinating a dual-channel supply chain with risk-averse under a two-way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Part A, 2014, 147(1): 171-179.
- [12] Dai J, Meng W. A risk-averse newsvendor model under marketing-dependency and price-dependen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5(160): 220-229.
- [13] 冯艳刚, 吴军. 突发事件环境下风险厌恶型报童博弈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5, 35(3): 598-607.
- [14] 朱传波, 季建华, 包兴. 供应链风险规避下 CVaR 的零售商订货策略[J]. 系统管理学报, 2014, 23(6): 861-866.
- [15] 闻卉, 曹晓刚, 黎继子. 基于 CVaR 的供应链回购策略优化与协调[J]. 系统工程学报, 2013, 28(2): 211-217.
- [16] 代建生, 孟卫东, 范波. 风险规避供应链的回购契约安排[J]. 管理科学学报, 2015, 18(5): 47-57.
- [17] Ma L, Liu F, Li S, et al. Channel bargaining with risk-averse retail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2, 139(1): 155-167.
- [18] 浦徐进, 龚磊, 张兴. 考虑零售商公平偏好的促销努力激励机制设计[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5, 35(9): 2271-2279.
- [19] 简惠云, 许民利. “报童问题”中风险偏好下的条件风险值及其优化研究[J]. 控制与决策, 2013, 28(10): 1446-1453.
- [20] 郭飞, 孟志青, 蒋敏. CVaR 准则下的双层供应链风险决策模型[J]. 管理工程学报, 2013, 27(2): 142-147.
- [21] 但斌, 任连春, 张旭梅. 质量影响需求下的二级供应链协调模型研究[J]. 工业工程与管理, 2010, 15(4): 1-4.

Research on decision and game of risk-averse take-out food supply chain

HAN Shuguang^a, DING Genji^b

(a. School of Sciences;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standardize the takeout market, make the market develop healthily and orderly, maximize the profit of catering merchants and catering platform and let consumers gain higher-quality catering serv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takeout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research data, the market demand function of takeout was built by combining the price with food taste and quality level of take-out food. The two-level supply chain consisting of risk-averse catering merchants and takeout platform was discussed. According to CVaR risk measurement norms, Stackelberg Game was used to formulate rational takeout food price, taste and quality level strategy for risk tolerance of catering merchants and takeout platform. Besides, two-level supply chain composed of risk neutral catering merchants and takeout platform was compared with the strate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risk tolerance value of the catering platform is within an interval, the takeout food has lower price and higher taste and quality level under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 This is all-win for catering industries, catering platforms and consumers.

Key words: take-out food; price; taste and quality level; risk-averse supply chain; Stackelberg Game; CVaR

(责任编辑: 钱一鹤)

DOI:10.3969/j.issn.1673-3851(s).2018.04.005

论表人词语模“X族”

赵艳梅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X族”词语在当代汉语表人新词语中数量众多,反映了一定程度的人“族”化倾向。“X族”在各式各样的表人词语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造词能力非常强大,因此该模式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数据统计方法,分别探讨模标“族”的语义特征和模槽“X”的构造特征,并综合分析模式“X族”形式的分化和意义的衍生。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对三种“族”类词语的规范有利于“X族”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词语模;“X族”;语义特征;造词法;语言规范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53-08

“词语模”是李宇明 1999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具有快速批量生产新词语能力的框架背景,它由具有类标记作用的不变“模标”和待填充的可变“模槽”两部分构成。^[1]可以说当今新词语的大量产生,词语模的强大“造词”能力功不可没。而词语模造词,不仅丰富了语言形式,也丰富了语义内涵,是内部语言生态的重要内容。^[2]尤其在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中,各种“人以模分”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各类人之间的细微差别,也能够比较细腻地表达语用主体对各类人的情感态度。而在各种表人词语模(表人模)中,“X族”具有能指的复杂性和所指的广泛性,因而也是受研究者关注的一类表人模,但已有成果中多从语法化、模因论、认知理论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意在博采众家之长,对模标“族”的语义特征和模槽“X”的构造特征进行探讨,并综合分析“X族”形式的分化和意义的衍生。

一、表人模“X族”的构词概况

“X族”是一个日源性的词语模。1947 年,日本作家太宰治在其代表作《斜阳》中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社会变动而日趋没落的贵族阶级——“斜阳族”,此后,日语中产生了一系列“X族”词语,后来影响到台湾地区,继而随着汉语与日语的接触以及台湾华语对大陆的影响,大陆也逐渐出现了指称各类人的“X族”词语^{[3]196}。为了使分析更为精准,本文以商务印书馆出版,侯敏、周荐等编著的年编《汉语新词语》(2006—2016 年)为基础语料,对其正文部分的词条和附录中补收的词条进行统计,搜集到表人新词语共 1646 条。其中,“族”类(包括“一族”)词语 355 条,占表人新词语总数的 21.57%,超过五分之一。这些“族”类词语都是专家学者利用语料库技术、网络技术等现代研究手段反复审慎遴选出来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词语世界中的“人‘族’化”倾向。对 2006—2016 年“族”类词语、表人词语分年度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6—2016 年“族”类词语、表人词语统计

类别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族”类词语数/个	29	47	36	67	72	33	15	29	16	8	3
表人词语数/个	140	171	122	211	279	183	157	130	111	71	71
“族”类词语占 表人词语百分比/%	20.71	27.49	29.51	31.75	25.81	18.03	9.55	22.31	14.41	11.27	4.23

收稿日期: 2018—04—0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7—03

基金项目: 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赵艳梅(1978—),女,吉林松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词汇方面的研究。

由表1可见,2006—2016年“族”类词语在表人词语中年均约占五分之一,尤其在2009年,竟然高达31.75%,这说明表人模“X族”的造词能力十分强大,可以说达到了“人以‘族’分”的程度。自2009年后,“族”类词语的百分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X客”“X男”“X女”“X奴”“X二代”等表人模继续保持了旺盛的造“人”能力;二是由于“X哥”“X姐”“X帝”“X控”等新兴表人模的出现,分摊了表人模“X族”的部分造词能力;三是因为2014年以来的新词语更加注重反映社会万象,表人新词语更强调表达的个体性和特征性。虽然近年来“族”类词语占表人新词语的百分比相对下降,但“X族”的绝对造词能力并没有削弱,“族”类词语数仍然逐年新增,这可归因于“族”作为后置模标的强大包容力以及前置模槽“X”的强劲聚合功能。

二、模标“族”的语义特征

李宇明^[1]认为,词语模中的模标具有一种“类”功能,或作为中心语表示类别,或作为修饰语表示某类事物的特征,或作为动词表示动作行为的特点。而“族”作为表人模“X族”的后置模标,其词性和位置都决定了它作为中心语的“类”功能,具有“提纲挈领、分门别类”的作用,这可以从“族”语义的历时衍变和共时发展中得到印证。

(一)“族”语义的历时衍变

虽然“X族”是一个输入性词语模,但作为模标的“族”却是日语中的汉语借词,日语赋予了“族”新的音义结合关系,然后又以“X族”的形式输出影响了汉语词“族”的发展。在这个输出输入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当今“族”类词语的大量出现,也正是日语词“族”在融入汉语的过程中契合汉语词“族”的语义的结果,致使“X族”遍地开花。

根据许慎《说文解字·旗部》,“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𠂔放从矢。”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旗部》认为:“矢锋也。今字用簇。古字用族。金部曰。簇者,利也。则不以为矢族字矣。束之族族也。族族,聚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之称。从𠂔。从矢。会意。𠂔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明确指出了“族”的会意性。从甲骨文来看,“族”写作,上面是飘扬的旗帜,下面是箭头即“矢”。可见从甲骨文发展到小篆,“族”字的会意性并没有改变,都是“从旗从矢”。而“旗”在《释名》中被解释为:“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期其下也。”其中的“与众期其下也”与段玉裁的《说

文解字注·旗部》中认为“𠂔所以标众”从语义解释上来看是相同的,都是“众之意也”,而且“族族,聚貌。毛传云。五十矢为束。引申为凡族类之称。”可见“族”也有“聚之意”。又因为“族”的文字形态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而当时的社会单元以氏族和部落为主,它们都是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社会群体。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族”的三个语义特征:[+群体性]、[+聚合性]、[+关系性]。“族”的这三个语义特征在历代文献中都有体现:如《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其中的“族”指“有血缘关系的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之亲”,蕴含[+群体性]和[+关系性]两个语义特征。又如《庄子·在宥》中“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其中“族”有“聚合”之意,含有[+聚合性]的语义特征。再如《韩非子·喻老》中“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其中“族”可以释为“众多”,暗含[+群体性]的语义特征。“族”的意义发展到汉唐,又有了“品类”之说,如《淮南子·俶真训》中“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韩愈《师说》中的“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可以归结为“族”[+类别性]的语义特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族”的语义不断推衍、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发展至今,“族”作为后置模标,在其构筑的“X族”表人模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群体性]、[+聚合性]、[+关系性]、[+类别性]这四种语义特征。甚至在2012年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中,鉴于“X族”发展的强劲有力势头而添加了“族”的第五个义项,“称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类人”^[4]。至此,“族”语义中的[+表人性]特征又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关系性]特征则由以前的“亲缘性关系”扩大化为各式各样的关系,而且“各式各样”是由“X族”中的前置模槽“X”来凸显的。

综上所述,“X族”中模标“族”的语义特征为[+聚合性]、[+群体性]、[+关系性]、[+类别性]、[+表人性],语义特征的强度依次递增。因为根据词典中“族”的第五个义项,[+关系性]、[+类别性]、[+表人性]是模标“族”在“X族”中的强性语义特征,依据向心结构的原则,“人”是结构的中心,[+表人性]强度最大,其次是离“人”最近的“一类”,即[+类别性]次之,最后是“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即[+关系性]处于最外围。随着“族”的第五个义项的出现,证明以上三个语义特征已被权威词典固定化,成为了无标记且恒定的,而这三个语义特征与语境意义的结合体则是有标记的、可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X”成了“X族”的特征,且“X”具有可变性。但是“族”的弱性语义特征[+聚合性]、[+群体性]要由“X”来体现,因此“X”必须在语义特征上呈现出强势的[+聚合性]和[+群体性],尤其是模标“族”的[+聚合性]近乎于语用主体的一种主观认定,即认为“有某种属性的人有成‘群’的趋势”,因此语义特征强度最小,那么在模槽“X”中,[+聚合性]强度必须最大,才能维持和模标“族”的语义守恒。

(二)“族”语义的共时发展

从共时方面看,“族”语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在表人模“X族”中,“族”与“X”组合后,被“X”临时激活而具有了语境义,而且这种语境义并没有因为模槽成分“X”的繁复而杂乱无章,而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当然这种语境义并非明显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X族”中,根据统计,在355个“族”类词语中,有89个“族”类词语中的“族”存在明显的语境义,占所统计“族”类词语总数的25.07%,可见这种“族”的语境义并不是一种偶发现象,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笔者根据侯敏、周荐等编著的年编中对355个“族”类词语的释义进行了分析,认为“族”的语境义具有三种语义特征:[+年龄性]、[+身份性]、[+性别性],可以说这些都是“人”的下位语义特征。大多数模标“族”被激活了只含一种语义特征的语境义,少数模标“族”则被激活了含有两种语义特征的语境义。具体分析如下:

1. 含有一种语义特征的“族”

一是含有[+年龄性]的“族”,此类“族”在释义中明显带有年龄色彩,且表年龄的词语经常作为“人”的修饰语或“人”的下位词出现。

a)“人”的修饰语:如“奔奔族(出生于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媚皮族(五六十岁的人)”、“飞特族(年轻人)”、“啃老族(成年人)”、“抠抠族(年轻人)”等。

b)“人”的下位词:如“怪字族(青少年)”、“Emo族(青少年)”、“草族(未婚青年)”、“飏爱族(青年人群)”。

二是含有[+身份性]的“族”,此类“族”在释义中偏重于身份色彩,这些身份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身份,一类是家庭身份。表社会身份的词语多与学生、白领、单位职员、公务员等相关;表家庭身份的词语常与父母、子女、夫妻等相关。这些词语有些直接在释义中出现,有些蕴含于字里行间。

(1)表社会身份

a)表学生:如“飞鱼族(中国留学生)”、“赖校族

(毕业后不愿离开学校的学生)”、“毕婚族(指大学刚毕业的人)”、“毕业逃债族(指大学毕业生)”、“替课族(代替别人上课、出勤的人)”、“刷刷族(指为了追求高分的学生)”等。

b)表白领:如“蛋白族(白领)”、“鬼旋族(城市白领)”。

c)表单位职员:如“飞单族(业务员)”、“职业敲族(文书、秘书)”。

d)表公务员:如“有碗族(公务员)”。

e)表其他:如“洋漂族(外籍人士)”、“蹭饭族(校外人员)”、“欠族(电商卖家)”、“蜂族(从事出版、媒体等文化行业的人)”、“打烊族(消费者)”。

(2)表家庭身份

a)表父母:如“学租族(家长)”、“啃嫩族(父母)”、“自教族(父母)”。

b)表子女:如“海啃族(由父母供养的海归)”、“节孝族(节假日回去尽孝的人)”。

c)表夫妻:如“已婚单身族(婚后不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人)”、“恐二族(因压力恐惧生二胎的人)”。

(3)表双重身份

如“抄号族(年轻的白领和在校大学生)”、“分床族(指夫妻双方,多为职场白领)”。

三是含有[+性别性]的“族”,此种“族”词语在释义时带有或暗含性别色彩,分为男性类和女性类。

a)表男性:如“弄族(有房子、车子、妻子的男人)”、“泡良族(引诱妇女的感情骗子)”。

b)表女性:如“海蒂族(都市新女性)”、“裹脚族(具有传统妇女特点的女性)”、“嫁碗族(想嫁给公务员的女性)”、“隐孕族(隐瞒已经怀孕的女性)”。

2. 含有两种语义特征的“族”

这种类型的“族”含有组合语义特征,或是[+年龄性]和[+身份性]的组合,或是[+身份性]和[+性别性]的组合,或是[+年龄性]和[+性别性]的组合。这种类型的“族”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如“花草族(职场新人)”、“难就族(高校男生)”、“求嫁族(年轻女性)”。

以上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考察了“族”语义的推衍变化,历时层面“族”的语义特征已经凝固,并作为义项进入了词典,而共时层面“族”的语义特征主要是“X族”中模槽“X”激活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语境性,能否作为凝固的义项进入词典还有待历史的检验。可以说,历时层面是一种聚合考察,而共时层面则侧重于组合考察,这是研究任何时代的语言现象都应遵循的方法。

三、模槽“X”的构造特征

作为表人模“X族”的模槽成分“X”,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义上由于模标“族”的多重语义特征而显得分外“异彩纷呈”。尤其在意义方面,可分为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对于其词汇意义,苏向红^{[8]196-197}把“X”分为“行为、理念或方式、兴趣爱好、生活境遇、外在形象、心理特征、职业特色”等七个方面,周美玲等^[5]把“X”分为“生活、时政、经济、教育、文化”等五个方面,刘甜^[6]把“X”分为“简单加合、意义融合”两个方面。对于其语法意义,付义荣^[7]分别从词性和构词两方面对“X”进行了分析。可以说,分类的不同是学者们对现实世界“X”的认知在语言世界的反映。关于“X”形式的讨论多集中在“音节数量”和“书写形式”两个方面。而本文是在书写形式的基础上,从理据角度对“X”进行的一种兼顾形式与意义的分类。

首先,对355个“族”类词语的“X”进行考察后发现,其书写形式的组成成分无外乎以下三种:汉字、字母、数字。因此,其书写形式可以分为:汉字型、字母型、数字型、字母汉字组合型、数字汉字组合型、数字字母组合型。

其次,结合词语意义对以上六种类型书写形式的355个“X”进行了理据探源,综合任学良^{[8]2}的《汉语造词法》和陈光磊^[9]的《汉语词法论》中对造词法的分类,把表人模“X族”中“X”的造词类型分为“借词”型、语法型、修辞型和综合型。这里之所以把模槽“X”看成是一种造词而不认为是构词,是因为“X”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意图。正如任学良^{[8]5-6}所说,造词法还要研究一个问题,即造词意图,就是造一个词所想表示的意思。表人模“X族”中的“X”就是语用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语音、语法、语义、修辞或综合以上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的一种有理据造词,其造词意图就是求新求异求简的表达需要。

(一)“借词”型造词

这里所说的“‘借词’型造词”中的“借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音和义都借自外语的词,而是借用了外语词、方言词、行业语词或古语词的音、形或义的词,我们是用“借词”这一语素组合来指称“X”的一种造词类型。

1. 借自外语词

指音和义或只是义借自外语的词,即传统所说的音译词、意译词和借形词。

a)音译词:即完全用汉字标注外语读音而书写

出来的外来词语,如“麻豆族(model)”、“庐舍族(loser)”、“爱疯族(iPhone)”、“脉客族(man keep)”、“阿鲁族(アルバイト,读成arubaito)”等。

b)意译词:只引入新的外来概念,但用本族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构成的新词,如“土食族(locavore)”。

c)借形词:指借用外来词的形体来表意的词,如“円族(日币单位)”。

2. 借自方言词

指意义借自方言词语的词,如“搞手族”、“废柴族”、“山寨族”,均来自粤语。

(二)语法型造词

指模槽“X”在语法成分上的减缩、省略和重叠,前两者可称之为“缩略”,是表达上求简的需要,后者“重叠”有“强调”的语用意图。

1. 缩略

俞理明^[10]认为,缩略是把一个冗长累赘的词语改造成一个简洁的词汇成分。而年编中对表人模“X族”中的“X”的释义都比较长,基本都是“语”或者“句”,因此缩略之后的“X”对语境的依赖性非常强,语义透明度较低。在355个“族”类词语中,有167个“族”类词语中的“X”完全使用了缩略造词,占“族”类词语总数的47.04%。根据年编对“X”释义的语素、词提取和整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跨层提取、同层截取、语义概括和提取概括综合四种类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缩略后“X”的语素数量越多,其语义透明度越高,反之越低。

a)跨层提取:指把释义语句进行线性切分,从相邻或不相邻的层次中提取语素、词进行顺序加合或逆序加合,从而得出“X”。

一是顺序提取加合,运用此种方式得出的“族”类词语较多,有49个,如“出海族”、“好高族”、“理车族”、“梦田族”、“男就族”、“试衣族”、“午美族”、“MSN脱机族”、“BMW族”、“CC族”等。

二是逆序提取加合,用此种方式得出的“族”类词语有11个,如“摆婚族”、“退盐族”、“试药族”、“艺考族”、“QQ隐身族”等。

b)同层截取:指把释义语句进行线性切分,从同一结构层次中截取出相邻的语素组合或词,得出“X”。用这种方法得出的“族”类词语有34个,如“闪玩族”、“分床族”、“望风族”、“掏空族”、“号啕族”等。

c)语义概括:指把释义语句在形式上浓缩成语素的组合“X”,语素义的加合或整合即释义。此方

法得出的“族”类词语有16个,如“朝活族”、“乐淘族”、“攒贝族”、“拼瘦族”、“闪跳族”、“双抢族”、“无趣族”等。

d)提取概括综合:指“X”中的一部分语素或词是从释义中提取出来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对某部分释义的语义概括,“X”是两部分的加合。由此方式得出的“族”类词语有57个,按照顺序可分为前概括后提取和前提取后概括两小类:

一是前概括后提取,该“族”类词语有42个,如“爱鲜族”、“飚爱族”、“悄婚族”、“敲章族”、“走班族”、“爱券族”、“无火族”、“拾惠族”、“职业敲族”、“未富先奢族”等。

二是前提取后概括,此种“族”类词语有15个,如“午动族”、“炒货族”、“闭关族”、“恼火族”、“年清族”、“自给族”、“难就族”、“轨交族”、“已婚单身族”等。

2. 重叠

所谓重叠,即语用主体将某些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中的一个构成成分重叠而形成叠音结构,其作用一是为增加无声的网络语言的音乐美,转写口语表达中童真、俏皮、亲昵的语气;二是为转写口语中的强调重音而特别创造的^{[11]189}。所搜集到的“族”类词语中有18个“族”的“X”采用了这种造词方式,其中单音节动词的重叠有15个,单音节形容词的重叠有2个,单音节名词的重叠有1个,在增加“X”韵律美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事物行为的特点,如“奔奔族”、“傍傍族”、“帮帮族”、“抛抛族”、“囤囤族”、“团团族”、“走走族”、“抠抠族”、“车车族”等。

(三)修辞型造词

修辞学造词法由任学良^{[8]202}首先提出,他认为该方法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而苏向红^{[12]35}则认为修辞方法造词是指选择并组合语素以创造出鲜明、生动的新词语的方法。前者强调的是一种狭义的辞格造词,后者则侧重于广义的修辞方法造词。鉴于本文对“X”的分析角度,我们倾向于后者的提法,认为修辞方法不仅限于辞格,所以,修辞型造词既包括一般所认为的辞格造词,如比喻造词、借代造词和仿拟造词,也包括运用了一定修辞方法的谐音造词。

1. 比喻造词

比喻造词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借此喻彼,能够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所指称对象的本质特征。本文所搜集的“族”类词语中有20个“族”的“X”采用了此种造词法。如“海囤族(海样囤积)”、“鬼旋族(飘荡在外不回家)”、“秒团族(网上快速团购)”、

“3.3.30族(驾龄3年内、车龄3年内、日常行驶30公里内)”等。

2. 借代造词

借代造词是借用相关关系“换名”造出新词语^[13],能够体现被指代的人的本质特征。根据模槽“X”的词性,可以分为事物借代和行为借代。

a)事物借代:此种方式得出的“族”类词语较多,有43个,如“蚕茧族”、“零帕族”、“汉堡族”、“考拉族”、“便利贴族”、“榴莲族”、“指尖族”、“蚁族”、“后备厢族”、“草族”、“锚族”等。

b)行为借代:此种方法得出的“族”类词语有10个,如“裹脚族”、“长草族”、“偷菜族”、“混族”、“NONO族”等。

3. 仿拟造词

仿拟造词是根据事物的某一特征,利用语言中原有的词,更换其中的部分语素,仿造出一个乃至一系列新词语。^{[12]37}在所考察的“族”类词语中,模槽“X”的仿拟不仅利用了原有的词,有些还利用了已有的词语模,使得仿造出的新“族”词语有“成模化”趋势。如利用词语淘、恐、隐、晒、哈、啃、背、蹭等来仿拟的有“淘港族”、“淘婚族”、“恐归族”、“恐聚族”、“隐婚族”、“隐孕族”、“晒黑族”、“晒卡族”、“晒密族”、“哈租族”、“哈洋族”、“啃亲族”、“啃老族”、“啃楼族”、“背卡族”、“背黑族”、“蹭饭族”、“蹭奖族”等;利用已有的词语模“X盲”、“X托”、“X迷”、“X客”、“X漂”、“准X”、“裸X”、“宅X”等仿似的有“财盲族”、“房托族”、“枪迷族”、“甲客族”、“试客族”、“洋漂族”、“午漂族”、“工漂族”、“准老族”、“裸婚族”、“宅内族”等。

4. 谐音造词

谐音造词指运用想象,利用语音上的相同或相近关系来创造新词语,能够增加趣味,凸显创意。在搜集到的“族”类词语中有3个词语中的“X”利用了此种方法,它们是“围脖族(微博)”、“咸鱼族(闲余)”、“乌魂族(无魂)”。

(四)综合型造词

所谓的综合型造词,是指综合运用了两种或两种以上造词方法的造词,手段多样,表意曲折。有25个“族”类词语的“X”采用了综合造词手法,如“音译+缩略”的有“陪拼族(陪同 shopping)”、“飞特族(谐音 Freeter,是英语“free”和德语“arbeiter”的缩写)”、“酷抠族(cool 抠门)”等;“谐音+缩略”的有“日光族”、“月光族”、“河狸族”等;“比喻+缩略”的有“泡良族(引诱良家妇女)”、“海啃族(海外归来啃

老)”;“借代+缩略”的有“EMO族(Emotionally driven hardcore punk,代指感情)”、“3A族(爱情、家庭、事业三个方面,A代指最高一级)”、“谐音+重叠”的有“扣扣族(谐音“抠)””;“谐音+比喻”的有“海豚族(海囤)”、“比喻+仿拟”的有“夕阳隐婚族”;“谐音+缩略+仿拟”的有“月老族(“月光族”和“啃老族”的缩写)”。

综上所述,表人模“X族”中的模槽“X”构造非常复杂,这是由语用主体的语用心理决定的,同时也受到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

四、模式“X族”的分化和衍生

由于模标“族”语义特征的多重性和模槽“X”构造的复杂性,使得表人模“X族”的模式在形式上出现分化,在意义上得以衍生。

(一)形式分化

词语模形式上的分化被称为“多模标套叠型词语模”,即一个词语模内部存有或两个或两个以上模标的词语模,这些模标在词语模中的位置固定,它们的整体组合构式具有层次性。^{[3]136}在众多的表人模中,只有“X族”存在这种模标套叠现象,这也再一次印证了模标“族”在语义上的强大融合能力。在统计资料中,此类“族”词语有101个,占总数的28.45%,不可小觑。根据“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体使用率、研究者关注度以及“X”的成模化程度,可以把套叠型“X族”分为成模型套叠、趋向成模型套叠和语境型套叠。

1. 成模型套叠

成模型套叠,即“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体使用率高,研究者关注度大,“X”已是成型的词语模,“X”是仿拟构造的一部分属于此种类型。这里用“-”代表“X”中的模槽成分,如“-漂族”、“-客族”、“晒族”、“宅-族”、“-盲族”、“-迷族”、“-托族”、“准-族”、“裸-族”,具体词语见“仿拟造词”部分,此不赘举。

2. 趋向成模型套叠

趋向成模型套叠,即“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体使用率较高,研究者关注度一般,“X”已是趋向成模型的词语模,“X”是仿拟构造的另一部分属于此种类型。同样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如“淘-族”、“隐-族”、“啃-族”、“哈-族”、“蹭-族”,具体词语此不赘举。

3. 语境型套叠

语境型套叠,即“X”中某个词汇成分的语用主体使用率一般,研究者对其没有什么关注度,“X”是

在语境作用下临时形成的“词语模”,这种语境大多是有关行为或心理的。

a)行为语境,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如“飏-族(飏爱族、飏薪族)”、“背-族(背卡族、背黑族、背车族)”、“毕-族(毕分族、毕漂族、毕房族)”、“代-族(代排族、代检族)”、“赖-族(赖班族、赖校族)”、“秒-族(秒团族、秒杀族)”、“穷-族(穷游族、穷忙族)”、“-光族(日光族、月光族)”、“-抠族(死抠族、酷抠族、智抠族)”。

b)心理语境,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如“恐-族(恐归族、恐年族、恐会族、恐二族、恐检族)”、“爱-族(爱鲜族、爱堵族、爱邦族、爱券族)”、“乐-族(乐淘族、乐益族)”。

c)其他语境,用“-”代表“X”中的类模槽成分,如“-碗族(有碗族、考碗族、嫁碗族)”、“午-族(午动族、午美族)”。

“族”类词语在形式上的分化,其实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一种小类的聚合,这种聚合是以模槽“X”的相同词汇成分为基础的,但划分时也要结合意义。如“爱疯族”就不能归入“爱-族”模式,因为前者的“爱”是音译,后者的“爱”则有“喜欢、享受”之意。同理,“拼瘦族”也不能归入“拼-族”,“脉客族”亦不能归入“-客族”。另外,有个别“族”词语的小类隶属有交叠,如“毕漂族”,以“毕”为聚合标准属语境型套叠,以“漂”为聚合标准则是成模型套叠,但此属极个别现象,不影响整体分类。

(二)意义衍生

综合“X族”的模式义和“X”的模槽义,某些“族”类词语在意义上也形成了聚合,这样的“族”类词语有84个,占总数的23.66%,可见语义场在“族”类词语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根据意义关系的类别,可以分为同义关系、近义关系、对义关系和类义关系。

一是同义关系,如“车车族-后备厢族”、“淘课族-网课族”、“秘婚族-隐婚族”。

二是近义关系,如“考碗族-巡考族(都是考公务员)”、“抠抠族-扣扣族(生活都节俭)”、“捧车族-隐车族(都不开车)”、“裸婚族-悄婚族(仪式都简单)”、“跳早族-闪辞族(工作时间都很短)”。

三是对义关系,如“朝活族-午动族”、“急婚族-懒婚族”、“恐会族-喜会族”、“毕婚族-毕分族”、“啃老族-啃嫩族”、“隐离族-隐婚族”、“阴天族-阳光族”、“难就族-男就族”、“快活族-慢活族”、“虚客族-扫街族”。

四是类义关系,指“X族”或“X”在意义上属于

同一类的关系,分为“婚恋类、工作类、生活类”:

a)婚恋类,如“蜗婚族”、“摆婚族”、“伪婚族”、“滞婚族”、“婚活族”、“草食族”。

b)工作类,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小类。积极类如“蜂族”、“零帕族”、“奔奔族”;消极类如“榴莲族”、“花草族”、“咸鱼族”、“汉堡族”、“便利贴族”、“乌魂族”、“装忙族”、“啃薪族”。

c)生活类,可分为乐观能动型和悲观被动型。前者如“蚁族”、“麦兜族”、“斑马族”、“河狸族”、“向日葵族”、“飞鱼族”、“无火族”、“智旅族”、“慢游族”等;后者如“混族”、“废柴族”、“电茧族”、“柿子族”、“死抠族”、“EMO族”等。

从对表人模“X族”形式和意义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二者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在“族”类词语产生的过程中,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其表现是,大部分的同义、近义、对义“族”词语和部分的类义“族”词语中带有明显的形式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了“词语模”这种框架背景的强势造词能力。

五、关于“族”类词语的规范问题

“X族”是利用语言中已有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创造新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X族”已经走过了30年,它没有被冷落于语言历史的舞台,而且还在当下众多新生代的表人模中渐放着异彩,我们不得不屈服于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力。这些“族”类词语忠实地记录着“面目迥异”的各色人群,表达了语用主体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假恶丑的讽喻,因此从总体来说,它们都是一般词汇中合法的、且较活跃的成员。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语言是没办法纯洁的,语言只要在使用中,就会发生变化”^[14]。既然词语模造词的特点是批量、快速生产,那就不可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有“粗制滥造”的现象,带有个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应学会区分“良莠”,维护词语模造词的规范性。对于“族”类词语而言,至少应注意以下三类规范:

(一)对没有增加新意的“族”类词语的规范

“族”类词语从时间跨度上来说,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从产生方式上来说,都属于词语模造词,因此应该是新词语。这种新要么表现在形式方面,要么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但不能为了追求一个方面的新意而牺牲了另一个方面。在所搜集的“族”类词语中,就存在语用主体为了形式的新奇而牺牲意义的情况。如“枪迷族”、“房托族”、“财盲族”、“换客族”、“虚客族”、“试客族”等,从词汇意义

来讲,“迷”、“托”、“盲”、“客”等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表人模后置模标,表示“某种人”,而“族”作为后置模标本身就是表示“具有某种特点的人”,组合后词汇意义冗余。从语法意义来讲,“族”作为后置模标是一种指称,要求模槽成分应是陈述性的,而“迷”、“托”、“盲”、“客”等都是比较明显的表指称意义的后置模标,组合后语法意义同指。上述“族”类词语虽然在形式上确实出现了较新颖的模标套叠,但明显没有增加新的意义,属于新词语系统中的羡余成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大,应予以规范。

(二)对语义重复的“族”类词语的规范

既然“X族”记录的是具有各种特点的人,特点的区分主要是靠模槽“X”,那么替换不同的模槽成分,其“X族”的语义应是不同的,至少是有所差别的。但“族”类词语中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就体现不出这种差别,如“车车族-后备厢族”、“淘课族-网课族”、“秘婚族-隐婚族”等;或者体现的差别不明显,如具有近义关系的某些“族”类词语,如“考碗族-巡考族(都是考公务员)”、“抠抠族-扣扣族(生活都节俭)”等。对于这样的“族”类词语,应综合考察,保留更符合语言规则、更有区分度和表现力、使用率较高的词语,渐弃使用与之同义或近义的词语。

(三)对语义透明度低的“族”类词语的规范

所谓语义透明度,是指合成词的整词语义从其构词语素的语义推知程度,其操作性定义是指各构词语素与整词的语义相关度^[15]。语义透明度高的词语,其表意上越明确,可接受度就越高。在所搜集的“族”类词语中,大部分词语如“试衣族”、“隐婚族”、“啃老族”、“月光族”、“低碳族”、“艺考族”、“蚁族”等语义透明度较高,能够准确、恰当而又形象生动地反映社会中具有某种特点的一类人,因此可接受度就高,流传广、使用者多;而少部分词语像“黑飞族(没有驾照或许可情况下进行飞行活动)”、“拖粉族(到港澳或境外购买奶粉带回)”、“闪闪族(随意用闪光灯拍照)”、“蛋壳族(痴迷‘咸蛋超人’)”、“卧槽族(不愿更换工作)”等却表意不明确,而极少数词语如“孤族(孤老终生)”、“刷刷族(刷分数)”、“扫街族(喜欢街拍)”、“留守族(别人外出自己留守)”等甚至有歧义,因为“孤”还可表示“孤儿”,“刷”还可表示“刷卡”,“扫街”还可表示“清扫街道”,“留守”还可特指“农村中的留守人群”。以上列举的“族”类词语语义透明度都不高,表意模糊,在使用中容易引起误解,这类词语很快就会消失,可以考虑用新的形式取而代之,或任其消亡。

六、结 语

本文以 355 个“族”类词语为研究对象,全面细致地分析了表人模“X 族”模标、模槽和模式的特点。首先,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考察了模标“族”的语义特征,在历时层面具有[+聚合性]、[+群体性]、[+关系性]、[+类别性]、[+表人性]五种语义特征,在共时层面具有[+年龄性]、[+身份性]、[+性别性]三种语义特征。其次,对模槽“X”的构造进行了理据探源,把“X”的造词类型分为借词型、语法型、修辞型和综合型。最后,分析了模式“X 族”形式上分化出的三种套叠类型和意义上衍生出的四种语义关系。由于可选取的语料和时间范围有限,可能会导致分类上的遗漏和不尽合理,这是后续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要理性看待“X 族”所生成的词语,合乎“表义需要、意义明确、合乎造词法、普遍使用”这四大原则^[16]的“族”类词语,必然在使用中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它们也会在词汇系统中长期保留下来;但同时应该人为地加以规范“族”类词语中的糟粕部分,使表人模“X 族”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能够“轻装上阵”。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词语模[C]//邢福义. 汉语法特点面面观.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146-156.
- [2] 张先亮, 李妙文. 从语言生态看新词语的产生和流行: 以“颜值”为例[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7): 124-130.
- [3] 苏向红. 当代汉语词语模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6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738.
- [5] 周美玲, 黄伟群. 近五年新词语中表人群的类后缀发展: 以 2006—2010 年新词语为例[J]. 宁夏大学学报, 2013, 35(2): 88-92.
- [6] 刘甜. 基于社会语言学的“X 族”词语模语义建构分析[J]. 中州大学学报, 2012, 29(1): 86-90.
- [7] 付义荣. 漫谈“族”词尾[J]. 集美大学学报, 2009, 12(1): 45-50.
- [8]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9] 陈光磊. 汉语词法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4: 16.
- [10] 俞理明. 缩略形式的选取单位及其分析[J]. 西昌学院学报, 2005, 17(1): 5-9.
- [11] 宋培杰. 网络语言中的词汇变异现象探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 39(4): 187-190.
- [12] 苏向红. 试论修辞方法对当代汉语新造词语的作用[J]. 修辞学习, 2007(5): 35-42.
- [13] 段曹林, 曾翠媚. 汉语新词语修辞造词分析: 以“171 条新词语”为例[J]. 江汉大学学报, 2012, 31(6): 64-68.
- [14] 李英姿. 和谐语言生活视角下的语言规范观[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17, 33(3): 20-25.
- [15] 干红梅. 语义透明度对中级汉语阅读中词汇学习的影响[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1): 82-90.
- [16] 齐沪扬, 邵洪亮. 新词语可接受度的多角度审视: 兼谈新词语的规范问题[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8, 37(2): 74-79.

A study on the person-denoting word formation model X-zu

ZHAO Yanmei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number of “X-zu” wor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new person-denoting words is numerous, and they reflect human “zu” tendency of certain degree. X-z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person-denoting word formation models, and the word-building capacity of X-zu is very powerful. So, this model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the method of data statistics is applied to discuss semantic features of mode marker “zu” and structure features of model cavity “X”. Besides,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odel “X-zu” form and meaning deriving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ree kinds of “zu” words contributes to healthy development of “X zu”.

Key words: word formation model; X-zu; semantic feature; word-building;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责任编辑: 陈丽琼)

仪式观视角下传统民俗的传播与民族认同塑造

——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俗为研究个案

吴依霏,沈霓含,黄家茵,闻 娱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以美国学者 James W. Carey 的“传播的仪式观”为核心框架,把人类民俗的传播视为一种仪式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畲族婚俗的文化表演、象征性符号互动、集体记忆三个维度对人类的仪式行为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仪式是一种模式化的象征性活动,人们凭借这个过程共享集体记忆、情感与信仰。进一步研究发现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仪式中一系列象征性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建构了一种“想象共同体”,同时认为正是仪式中的符号互动传播促进了民俗的传承与个体的民族认同塑造。

关键词:传播的仪式观;婚俗;集体记忆;想象共同体;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3851(2018)08-0361-09

在文化人类学中,“仪式”这个概念显著地影响了人类学家对文化与自身的内在关系的理解。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强调传播不是位移,而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1]28}。他认为,仪式中个体的信仰共享才是传播的实质。仪式的运作方式通过符号来传达信息,侧重于人们参与仪式的符号互动体验。从仪式观的视角出发,传播是人们以仪式参与者的身份,通过符号的展演来创建一个有共同信仰和共同秩序、能够对人类行为做出解释的文化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人们对符号进行接收、解码以及传播,最终形成了具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并且这个场域映射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简而言之,传播的仪式观与文化视野下的人类学有着契合之处。

婚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富有魅力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是其表现载体。它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民族认同感、民族生活价值观等,不仅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构成各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近几年有关婚俗传播

的学术研究,基于传播的仪式观视角分析婚俗的相关研究较少,主要包括三个主题:一是对婚礼仪式过程的人类学考察与解读,例如王兰^[2]以人类学理论对蒙古族婚俗中订婚、迎亲等一系列的仪式内容进行探究;二是基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探究其历史发展变迁,例如刘丽娟^[3]以黔中仡佬族的婚俗为考察对象探究其变迁缘由及特征;三是研究婚俗中的服饰、舞蹈、音乐等的文化内涵,例如刘翔^[4]基于陕西关中民间婚俗分析了其婚俗服饰的发展状况和其中包含的历史人文内涵,陈琛^[5]对新疆柯尔克孜族人婚俗舞蹈的动作、传说等进行考察,并对其传承与保护进行了探讨,赵书峰^[6]以瑶族婚俗音乐作为考察对象,针对其中的文化隐喻阐发思考。从传播的仪式观角度来看,婚俗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是一个通过符号互动而不断传播的过程。在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的调研中,笔者发现该地的婚俗文化颇有特色,并且其传承现状较为乐观。新人在婚礼仪式上通过一系列符号的表演与传播,对当地传统婚俗文化的延续以及对当地畲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产

收稿日期:2018-06-25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25

基金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2017R406058)

作者简介:吴依霏(1995-),女,福建漳州人,本科生,主要从事传播学理论与实务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闻 娱,E-mail:1735023492@qq.com

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以传播的仪式观作为研究视角,将婚礼仪式视为一场富有寓意的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以浙江省桐庐县畲族聚居地——莪山畲族乡为例,通过考察畲族婚俗仪式的过程、具体特征及其深刻内涵等,探究仪式传播在民俗文化遗产中的作用,以及婚俗仪式传播与想象共同体建构、民族认同塑造之间的关系,以此深化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民俗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一、婚礼是一场文化传播的仪式活动

婚礼作为群体性的社会人文活动,它通过符号的展演和特定的仪式规则进行婚俗文化的传播。婚礼仪式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即象征性与表演性,其中象征性经由表演性呈现出来。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符号、具有指代性的动作及其意义构成了仪式整体,它是一种模式化的象征性活动,人们凭借这个过程共享民族记忆、情感与信仰。以浙江莪山畲族乡婚礼为例,首先,莪山畲族乡婚礼以对歌、特定的器具服饰为媒介和符号进行了丰富的意义表征,婚礼中的人物、器物、声乐等仪式化要素都贯穿着整个婚礼的始终;其次,莪山畲族乡的婚礼规则赋予了仪式参与者包括新人、伴郎以及亲戚长辈等不同角色自愿地进入到这场婚礼中“表演”的权利,也即是仪式参与者在共同的场域下开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体间文化交流活动。人们经由恰当的行为方式进行角色表演和意义共享,共同完成这一场婚俗文化传播的“文化表演”仪式。

(一) 仪式的传播手段(工具)

米尔顿·辛格在《当一个伟大传统现代化之时》一书中提出“文化表演”和“文化中介”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表演”包括人类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交流,“文化表演”正是由“文化中介”组成的——交流的符号不仅是语言,还有那些非语言媒介如器物等。^[7]

传播通过对象征符的创造、认知与运用,构建了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模式。人们在仪式中倾注了自己的情感、观念、思想等,传播是仪式参与者为了展示符号元素而进行的“表演”行为,而符号的表达不仅仅只有一种形式。仪式的流程完备依附于参与仪式表演的道具、歌声乐曲、肢体动作等传播工具,这些传播工具对于仪式中文化表演的开展和符号意义的共享不可或缺。在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中,传播者把语言性质的对歌以及非语言性质的特定器物与行为动作转化为声音符号、道具符号和动作符号,并注入了婚俗文化元素并使其服务于婚礼仪式。所有的

仪式参与者在这个文化场域中各自扮演着文化角色,展现了仪式的文化趣味性与戏剧性。

在结婚之前,莪山畲族乡的青年便以“缘歌”来寻得意中人,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山歌表情达意,并用对歌的方式考验对方的才情。在新郎娶亲之前,新娘须以哭腔唱歌,诉说自己对父母、兄弟姐妹的依依惜别之情,俗称“哭嫁”。新娘哭唱得饱含真情实感还能博个好彩头,当地畲民认为新娘哭得越悲情则意味着未来生活越幸福美满,即以悲衬喜。在婚礼宴席上,还有个颇为有趣的环节,俗称为“调新郎”,即新郎须把酒菜逐个唱出来,餐具、酒和菜肴才会随之上桌;待客人尽兴而归,新郎也需将酒菜名、餐具名一样一样地唱出来,厨师相应地收拾新郎所唱之物。在闹洞房环节,青年们也会用山歌表达对新人的祝福之意,唱着闹房歌和祝贺歌,祝福新郎新娘和美美。可以把对歌视为富有亲和力与感染力的象征性符号,歌曲所表征给仪式参与者的是蕴含在其背后的莪山畲民单纯朴实又重感情的民族品质。莪山畲民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也祝福着一对对新人走向幸福。这种质朴的情感叙事方式受到莪山畲民的认可和喜爱,对歌激发了莪山畲民共同的地域文化心理。

除了对歌这一声音符号,莪山畲族乡的新娘出嫁时还运用特定的道具符号进行“文化表演”。结婚当天新娘要梳扎“凤凰”头,身着“凤凰”装以示吉祥如意。凤凰头是在梳着凤凰髻的基础上戴上凤冠形成的,将头发以螺旋状盘绕于脑后就梳好了“凤凰髻”,然后佩戴上由珠串、银盖、银钗、银花、银片组成的尖角凤冠。凤凰装形似凤凰绚丽的羽翼,其色彩鲜艳斑斓而不错杂,上面绣着凤凰和牡丹的花案。接着给新娘戴上项圈、手镯等银质饰品以及铜制圆镜,再为其盖上两侧穿着桂圆的红盖头,新娘便梳妆打扮完成。笔者把器具看成是一种“文化中介”,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传播仪式正是借助凤凰头饰、凤凰装、圆镜、五果、龙凤喜烛、桂圆、五谷种子、红蛋、红布袋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道具为媒介进行传统文化的仪式化表达,莪山畲民通过这些符合本民族审美心理的器具来表征婚礼仪式中的一系列意义,也经由这些器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民族文化。尤其是雕刻着各类纹饰的银质饰品,它们是中华传统雕刻技艺与畲族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彰显着畲民淳朴、神秘的民族色彩。这些器具的存在构成了莪山畲民在婚礼仪式中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

莪山畲民还充分运用动作符号为婚礼仪式增添

戏剧性色彩。新娘被接到夫家之前需要带上自家的三口米饭,即新娘先将木筷递给背后的兄长,兄长再把木筷穿过新娘胳膊窝摆到餐桌,之后新娘便从准备好的米饭里咬三口饭并吐到手绢上,由兄长把手绢叠好让新娘将其带到男方家里,这寓意新人婚后将获得农畜丰收。在婚礼中,新人须各自拽住彩绳的一头,相对而立,在宾客的注视下拜堂成亲,接着一同前往炉灶,新娘托举竹筒让新郎向炉膛内吹气,使灶内燃起熊熊火焰,这一举动寄予了夫妻对今后生活红火美满的美好愿景。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突出表现形式,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有着深刻而本质的联系。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中的动作符号富有生活气息,它们与畲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兼具人文性与社会性,真实反映出莪山畲民生产劳动的激情以及祈愿通过劳动收获美好生活的精神世界,独具农家本色。

莪山畲民的婚礼流程所涉及的符号元素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作为声音符号的对歌歌曲、道具符号中的器具和服饰、动作符号中的肢体行为。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的象征性表达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的符号展演而组成了多方位的婚俗文化意义的符号阐释系统。一场仪式中,虽然每个象征性符号所展现的具体意义不同,但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式各样的符号对莪山畲族乡婚俗文化的意义阐释主要呈现在“和、美、福、旺”的象征性表达上。传播塑造了文化符号的形态与内涵,文化又影响着传播的过程。传播过程中所渗透的视听符号系统均为文化产物,而传播的实质是人类文化的表达与象征,因此传播与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简而言之,婚礼仪式是婚俗符号意义与婚俗文化的动态传播系统,仪式中所展现的象征性符号向仪式参与者诠释着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二) 仪式的规则

表演者和观众的角色由一场仪式中的规则所设定。仪式的开展是井然有序的,参与仪式的个体都能在仪式场域中感受到仪式本身携带的框架,仪式中涉及到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等均包含在这个框架的范畴内,对仪式参与者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另外,个体通过身体实践等方式回应着仪式的规范。传播的仪式观强调人们对仪式行为的参与过程,以此来表明、确认和维持正在进行而且已经存在的社会过程的基本秩序。凯瑞曾阐述仪式的目的在于“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7]。可以看出,仪式的

规则能够为符号和意义的表达建立一个富有条理的氛围,并恰如其分地规范参与者的角色及其行为,协调仪式中一系列符号表征的进展节奏。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流程极为注重礼仪和繁文缛节。从定亲和迎亲方面的流程来看,畲民恋爱充满浪漫色彩,男女双方以歌传情,两人私定终身后便告知父母,托媒说亲。待到正式定亲,女方的舅母、姨母、姑母家便会留她“做表姐”,即请女方在家中做客,女方以对歌形式向亲人依依惜别。迎亲当天,娶亲队伍在半路上会被女方的姐妹以杉刺挡住去路,以讨要媒人的红包。进入女方家厅堂后,娶亲队伍需将丰盛的聘礼罗列在桌上,向众人展示。接着,女方会邀请他们清洗脚部并换上崭新的布鞋,称作“脱鞋礼”。午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环节是伴郎举行“借锅”仪式,这在莪山畲族乡被称为“赤郎借锅”,意为伴郎以唱山歌的方式向女方借用炊具款待宾客。赤郎唱到哪个炊具,姑嫂们就得把先前收好的炊具摆出,只要有一个炊具漏唱了,赤郎就得重新唱借。等到炊具借齐后,赤郎要屠宰一只家禽,并且不能让血落地,如若溅下几滴则相应地要被罚酒几碗,姑嫂们经常趁机捣蛋,以活跃娱乐氛围。

在傍晚过后的婚宴上,待到酒过三巡,新娘须在嫂子唱的“敬酒歌”中向客人纷纷敬酒,同时宾客要将红包置于杯内赠予新娘。婚宴落幕,男方和女方各派出自己选好的“歌手”打擂台,双方彻夜对歌,将婚宴当日的气氛推向最高潮。成亲后的第三日,新人要一同前去探访新娘的父母,俗称“请回门”。当日,新郎与丈人小酌,同时新郎须唱酒令,岳母则要对女婿的关心,将精心准备好的“饭心饭”即含馅料的米饭赠予女婿。女婿也将红包回馈岳父母,以示敬意。基于人情往来,新郎也会请新娘的弟兄们来家中做客,称作“接回门”。宴席中,亲家舅要挑战将藏在糯米饭里的小物件在不能洒米的情况下夹出来,否则将会被罚唱歌。“回门”之后,整场婚礼就圆满结束了。

婚礼的流程仪式充分诠释了仪式的规则性,所有的流程都是约定俗成的,新人与亲朋好友共同遵循这个仪式的规则,以便顺利地走完婚礼流程,所有人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按照规则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仪式需要建构一个行为关系规范才得以顺利进行。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处处彰显着模式化的言行规范,并且每一条婚礼步骤都承载了不同的文化寓意。这些富有文化趣味性的婚礼规则作为婚礼仪式中的核心内容,构建了以模式化的肢体语言

传播婚俗文化的意义交流系统,一是包含婚礼符号意义的婚俗文化传播,二是承载莪山畲民族文化要素的传播,仪式的规则成为一场仪式中独特的叙述方式。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模式化的动作如“做表姐”、“哭嫁”、“借锅”、“回门”等作为规则的符号化呈现方式,协调与规范了莪山畲民在这场仪式中的行为方式,也唤醒了他们在婚礼仪式中的集体意识——对缔结婚姻之事的重视与祝福。在符号意义化的婚俗“文化表演”中,人们通过观看和参与一套模式化的婚礼仪式,间接或直接地对仪式中所传达的象征性符号进行解读,并将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仪式规则的协调,构成有秩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体,它包含着仪式参与者的“文化表演”、仪式的规则与集体的架构。除此之外,仪式所遵照的程序是文化的一部分,仪式的有序开展需要借助文化的维系与协调作用的发挥。

二、婚礼仪式中的象征性互动与集体记忆

凯瑞将人类的社会行动比作由一连串符号构成的文本^{[1]42},对这个文本的认知离不开对符号意义表征的解读。美国心理学家布鲁默基于米德的象征性互动理论而阐释了“意义、社会互动、解释”这三个关键词,他提出象征性互动是以象征符为媒介的社会互动关系,其本质是“互动”,即人们借助符号进行表达与交流。^[8]仪式是一个充满了多种象征符号的意义体系,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通过仪式这种具有感染力的手段进行意义表述、传递和共享,庞大的象征性符号系统如动作、声乐、器物等在特定情境下以隐喻的方式被婚礼参与者所接收、理解和阐释,这其中包含对符号的解码过程。仪式“场域”里,人们通过婚俗文化符号的象征性互动,继而带来集体记忆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仪式的象征性社会互动中,传者通过象征符来释放符码,受者根据接收到的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进行意义解读,继而反馈、共享他们所得的意义表征。婚礼作为一种媒介仪式,因其具有联结、参与、分享的特点而使得仪式的参与者能够产生共同的文化心理,并在这场婚礼仪式中潜移默化地接收和传播某些象征性符号的意义。基于此,莪山畲族乡的居民个体在婚礼仪式中的互动传播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首先,具有历史性的族群成员作为符号展演的主体,既是符号的缔造者又是符号的传播者。文化

具有历史性,并非所有仪式参与者都能够准确解读畲族婚礼中的符号体系,而具有着一定阅历的畲民能够在观看符号展演的过程中将其表征意义与本民族历史因素相结合,从而做出更深层次的符码解读。婚礼仪式中的各类象征符号所包含的文化表意,一方面是民俗的传播,另一方面是莪山畲族乡本土历史文化元素的传承。在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中,新娘作为婚礼仪式中最突出的文化表演者,以一系列装束创造出契合畲族历史文化传播的情境。新娘出嫁时梳着“凤凰头”并在红盖头两侧挂上桂圆串,新娘通过这个带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装扮向在场的其他人传达了特殊的符号寓意,接着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解读凤凰头、桂圆串这些婚俗符号分别具有的“吉祥和谐”和“早生贵子”的表意,而更深层次地,具有历史性的畲族群体的成员能够进一步解读出“凤凰头”所蕴含的民族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重要意义。“凤凰头”与“凤凰装”均承载着畲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新娘在婚礼仪式这场文化表演中经由一系列符号的组合,将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向观演者传播,进而推动文化传承。畲族新娘在成婚时须以“凤凰装束”的习俗示人,这不单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民俗瑰宝,更是畲族文明的细致呈现。

当然,参与仪式的畲民都是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个体,任何符号意义的表征都是不同人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进行解码的产物,因此符号的释义并非始终一致,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人在文化背景上的个体差异,仪式参与者对同一符号的解码不尽相同。比方说,“凤凰头冠”是中国古代新娘出嫁必戴的头饰,寓意是能享受贵妃、娘娘般的福气。由于如今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了古时候的贵妃、娘娘,莪山畲族乡的新娘沿袭下来的这一传统头饰的寓意有了很大的改变,俨然变成了吉祥与夫妻和谐的象征,但也有部分畲民认为“凤凰头”这一符号寓意着新娘走向荣华富贵。

其次,莪山畲民在婚礼仪式中运用一系列的器物符号来定义自己的行为意义,同时又通过符号来理解别人的行为意义。人们往往运用特定的器物和行为来表示吉祥以及辟邪,其中,器物的外观形状及其包含的特质经由人们的类比联想使其具备概念上的辟邪驱魔的护身功用。在器物方面,例如迎亲时夫家须派人一路护卫着新娘前往新郎家,新娘有时会于胸前挂上圆镜以驱鬼邪。在畲民的传统观念看来,镜子有类似于“照妖”的效果,它能够使妖怪现原形,当鬼怪被镜子照到自身的影像时便会死去。类

似地,在新人床上布置的几盏灯火也具有辟邪的表征,因为畲民认为鬼怪惧怕火光,火可以消灭妖魔邪气,消除新人内心的忧虑,寓意着新人能够拥有吉祥平安的生活环境。

在行为方面,比如当嫁妆送到女方家后,赤郎须杀一只男方家带来的雄鸡用以抵挡煞气,公鸡因勇猛强悍的特征被畲民赋予驱邪的象征意义。此外,畲民之所以通过“哭嫁”来成亲,是因为民间传说办喜事会引发鬼怪的嫉妒,新娘作为婚礼中最美丽的人物,极有可能遭受邪气侵害。新娘为了平安出嫁,她便需要做出与喜庆氛围不契合的举动,以悲泣迷惑鬼魅来躲过一劫。莪山畲族乡新婚之夜还有着整夜对歌到天亮的习俗,对歌是畲民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对歌中忌讳唱不吉利的歌曲,而彻夜对歌这一行为符号象征着辟邪。在莪山畲民的潜意识里,魔鬼喜欢于黑夜出没但又惧怕热闹嘈杂的场景,而新人与宾客的彻夜对歌正是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漫漫长夜,故能够驱赶邪魔,为新人带来吉祥。

虽然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鬼邪,但通过富有驱邪意味的对歌方式,“仪式中那些被认为具有无比威力的辟邪物以及极富象征性的行为举动都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人们误认为这些仪式活动真的会产生神奇的驱邪作用。”^[9]仪式中的象征符一方面包含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刺激着参与者的情绪,象征符所表达出的观念与情绪的综合使仪式强化了它所要表达的内涵。人们渴求驱魔除邪的共同心理愿望借助器物符号和行为符号进行表达,同时符号与意义的交织使人们形成对同一符号的相似或相同的解码,进而婚礼仪式的所有参与者便能够以放松的心态融入到这场仪式中。

最后,符号表征的完整阐释依托于特定的情境,同时这个情境也塑造了仪式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10]认为集体记忆以各种典礼性、仪式性的英雄壮举形式出现,并在诗人和史诗性的诗歌中出现。而保罗·康纳顿^[11]认为,一个社会通过举行仪式保存和重现记忆。有关过去的意向和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事实上,集体记忆跳脱不开情境,情境指人们身处的环境和场景,包括时间、地点、人的行为和角色等。集体记忆需要依托于各种符号的影响才得以产生,正是这些情境构成仪式参与者的记忆框架与塑造着他们的民族情感,而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又维系着他们的共同信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仪式与其他传播媒介如图像、文字等相比具有塑造集体记忆上的特殊性。畲族婚礼仪式不仅传播信息,还借助一系列符号塑造了丰富而具体的情境。情境将历史与现实相勾连,使集体记忆被唤起和不断再现,并且推动着畲民在参与仪式中逐渐产生或者强化对本民族传统的正面情感如自信感、自豪感,具备积极的情绪是畲民认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仪式中一个个符号被赋予了情境中的特定含义,相反,任何符号唯有在一定的语境当中才能切实地表达出其表征意义。庞大的符号系统需要仪式参与者的共同关注与解码,在畲族婚礼仪式的符号解码过程中,畲民通过与在场其他人的互动交流达成信息共享、情感共鸣,使自己与群体相互联结,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增强了与他人之间的契合度并感受到一种群体性的、民族性的心理归属;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意义的结合体,具有强化价值准则的功能。^[12]畲族婚礼仪式是符号的集合体,其中蕴含着畲民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仪式通过一系列符号的文化表演引发畲民对本民族行为规范与价值体系的集体认同。

莪山畲族乡婚礼仪式成为畲民创造集体记忆与民族情感进而发生信仰共享的媒介情境,仪式的参与者通过接收、解码和传递一系列的婚俗文化符号来深化自己对本民族、本地域传统民俗的理解与归属感,这也可以视为一种信息反馈。当这些婚俗文化符号的表征渗透到每个仪式参与者的内心时,便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集体记忆和自觉遵守的社会观念,最终人们达成了信仰的共通与共享,这又使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在婚俗文化传播仪式中,一对新人作为首要的象征性符号的输出方,向人们展示了婚礼中涉及到的一系列器物、服饰、用具、声乐、流程规则等,而受者由于与新人的民族背景、自身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对于婚礼仪式中呈现出来的象征性符号组合往往欣然接受,并且将其内涵传播给他人。

从莪山畲民在参与婚礼仪式中对本民族婚俗文化的接受心态方面来看,他们都是处于一种娱乐化的情境中——例如新人及其亲朋好友在婚礼中要接受一关又一关的“考验”,不能顺利通过“考验”者就要罚唱歌。仪式的参与者在仪式的场域中旁观或者是直接参与这种“文化表演”,这种具有趣味性的仪式环节构建了一种轻松融洽的、偏向感性的传受互动模式,塑造了愉悦嘻要的民俗交流情境,让婚礼仪式在模式化的规则与传统民俗的天平中达到平衡。

三、婚礼仪式中的想象共同体与民族认同塑造

(一) 仪式的共享:文化根源的认同和维系

美国学者安德森指出,通过仪式性的媒介接收活动,如同时观看某一媒介事件,人们可以获得共同的文化感受,以及对拥有相同体验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感知,这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13]可以说,仪式不但呈现和阐述了人们的社会行为,还包含着个体的情感与价值观表达。人类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想象的世界凭借仪式中一系列象征符而彼此交融,想象的共同体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情感的社会文化存在,它由仪式的参与者共同确认,并且它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

基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莪山畲族乡的婚俗文化传播仪式恰恰建构了或者是存在于一种“想象共同体”中,具体表现为群体基于共同生活习惯、历史、思想等方面而约定俗成的社会关系,并且维系着想象的共同体的纽带是他们之间共同的文化根源。莪山畲民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婚礼仪式便是交流分享本民族文化的平台之一,但婚礼仪式仅仅是在表层上将群体联结起来,真正激发他们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的是婚礼仪式中一系列象征性符号意义的交流与共享。

仪式本身就是传播信仰与意义的媒介^[14]。笔者认为,婚礼仪式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性展现,它作为婚俗文化传播的形式载体,促使人们在象征性互动的神圣场域中感受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价值观、情感等,获得精神体验与慰藉。其中关于莪山畲族乡婚俗文化的视觉性符号或听觉性符号,譬如带着鲜明民族色彩的“凤凰头”装扮、混合着质朴乡音和浓郁情趣的对歌等等,都迅速地唤起婚礼仪式参与者的情感归属与共同信仰。仪式是具体的,而信仰则是抽象的,仪式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作为一种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向世人传播了无形的文化信仰,即文化信仰是隐含于仪式中的思想价值观念。婚礼仪式通过喜闻乐见的象征性符号传播成为仪式参与者信仰的表达与分享的场域,莪山畲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在仪式符号、仪式表演、仪式规则、仪式氛围下互相融合,同时人们主动或被动地解码和传递符号的表征意义而凝聚在一起,建构和维系了共同体的文化信仰。正如凯瑞所说:“在参加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1]28}因此,莪山畲

族乡的婚礼仪式可看作是参与者进行民族认同的确认的文化场域,也是思想价值观即共同信仰分享的一个生动过程。一系列的婚俗符号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构成莪山畲民彼此间相同的文化根源,并通过仪式的共享和传播使民族认同得以确认和维系。

(二) 共同信仰的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塑造

对于婚俗文化,其仪式传播的过程是“传统文化符号被创造、理解和应用、改编于现实生活的过程,以塑造、完善受众的文化观、价值观和生活观为目的”^[15]。在婚俗文化的传播中,各种有意义的象征符被解码与运用,人们基于此拥有和巩固了共同的信仰观念。

莪山畲族乡的婚礼仪式中,畲民将族源神话融入到服饰媒介,新娘身穿的“凤凰装”从侧面展现了畲族的起源及其神圣的图腾信仰。图腾不仅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文明的表达,更是一个民族永久的集体记忆。畲族信奉盘瓠,认为盘瓠是畲族的始祖。盘瓠是春秋时代一位在战火中破敌立功的英雄人物,相传他受赐与公主成婚,公主身穿凤凰装嫁给盘瓠,盘瓠与公主所生的后代把劳动工具“犁”、“簪”(雷)、“篮”(蓝)、“盘”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便是畲族姓氏的起源。共同祖先认同与世系记忆通常被视为民族概念的核心内涵,它对民族认同的形成和社会的承继具有重要意义。^[16]图腾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它能够帮助人们对自身的族群归属产生清晰的认知,即唤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意识。凤凰装以生动形象的视觉表现形式追忆畲族的祖先盘瓠,并含蓄地包含着姓氏起源传说,从而唤起了莪山畲民的历史记忆,同时畲民把自身的情感、祈望和价值观寄托于图腾中,传达了畲民的共同信仰,进而畲民彼此间产生内心共鸣,认同和维护了民族内部的血缘关系。图腾崇拜不仅包含着畲民对祖先和民族姓氏的追溯,还蕴含着对祖先的英雄崇拜情结,这在畲族的社会延续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集体记忆产生于一个族群的生产生活并附着于客观世界而再现,为族群所共享。莪山畲民的集体记忆不单由服饰中蕴含的祖先神话故事以及姓氏起源传说所组成,还有着关于生产生活的部分。对歌贯穿着新人缔结姻缘过程始末,对歌的内容按照题材可划分为叙事歌(包括神话传说等)、杂歌(包含爱情、劳动生活、伦理道德等内容)和仪式歌(包含婚仪歌、纪祖歌等),其中杂歌在婚礼前后使用得最为频繁。莪山畲族乡的新人在相遇相知、迎亲娶亲、用餐

等过程中都需要杂歌的助兴,杂歌中的劳动歌与缘歌(即情歌)均是畲族姑娘在山间劳动时偶遇心仪的小伙子而编唱的传统歌曲,一般由姑娘主唱,小伙子根据姑娘唱的词义对唱,表达劳作丰收与谈情说爱的意味。传统民歌作为畲族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口头文学,它不仅是一种集结了畲民智慧的文化表达形式,还是畲民生产生活的缩影,其中蕴含着畲民历史以来上山劳作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畲民对劳动的赞美、热爱之情。它以声音符号的形式在新人缔结婚姻的始末不断地再现与传播,集体记忆在传统民歌的传唱中被进一步强化。

从族群的集体记忆及其符号的传播,再到其被内化认同,带有莪山畲族乡当地文化内涵的象征性符号存在于婚礼仪式当中,它们共同烘托了民族共同情感,民俗的传播意义随之升华。婚礼仪式不单单是婚俗文化的呈现形式,它还使莪山畲民聚集在一起,构建了一个集体记忆共享的公共空间。人们不仅共享符号的意义,还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来加深自己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理解。

仪式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显示现实,还能缔造现实。婚俗文化的传播是莪山畲民建立、联结和改造现实的过程,人们通过象征符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进行创造、认识和解释来建构了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人们在一个时空场域里对共同信仰的维系。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人的主观性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发挥着很大作用。共同信仰又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在塑造人类的现实行为中产生影响。不同的人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经验而对仪式活动中的符号产生不同的意义解读,同时又在与其他仪式参与者共享自己对象征符的认知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完全被自我与他人所接纳的观念与信仰。“当仪式表演节目张扬出的各种观念与人们已有的信仰相吻合时,就成功地促使人们做出与信仰制造者目的相一致的解读。”^[17]在这个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中,人们会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引发思考,从而渐渐地产生一种认同感。

人们不仅创造现实,还维系着他们所创造的一切。整个婚礼仪式中,无不透露着莪山畲民对生产生活的热爱,畲民用仪式的方式传播和维持着他们所创造的符号意义。婚礼中的声音符号、动作符号和器具符号对于畲族文化的传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作为口语媒介的“缘歌”来看,它是一个融合了畲族文化的叙事文本。畲族青年在遇到意中人时

需要以唱歌形式吸引对方,大部分缘歌是以山间劳作中的某一事物为依托来表达男女间的真情实感,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文化生活形式在畲民生产劳动的山间流传,传承了畲民辛勤劳动的文化传统和以歌定情的民族习俗。

从作为身体媒介的动作符号来看,婚礼仪式中拦路、留风水、脱草鞋、拜灶神、借镬、杀鸡、拜堂、安床、回门等环节均发源于畲族传统文化。例如,赤郎到了新娘家要向灶神行“拱手礼”,即双手抱拳将身子略向前弯以示尊敬,还要以歌高唱来借炊具,待炊具借齐全后须亲自宰杀家禽以招待宾客等,均彰显了畲民对神明的敬仰以及盛情的待客之道,人们通过这些动作符号表达了共同的心愿,即希望在灶神的庇佑下让家人健康与平安。再例如,男方家须在结婚前请“亲家伯”(即男方派出的歌手)到女方家说亲,女家姑娘们须对亲家伯故意刁难,倘若亲家伯未能巧妙应对,则会被姑娘们以灶灰抹脸并赶出女方家并要求男方家另换人前来说亲。刁难亲家伯这一动作符号包含了畲民丰富的生活内容:首先,亲家伯须唱功了得,到了女方家要与众多前来刁难的姑娘们对歌,这传承了畲民历史传统中以唱山歌交流思想情感的风俗;其次,姑娘们以灶灰抹亲家伯的脸,实际上意在警告男方在结婚后不许欺负女方,蕴含着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且灶灰象征着炊事,体现了畲民对炊事劳动的热爱传统。莪山畲族乡的婚礼还多方面凸显了畲族传统美德中的孝道,如新娘出嫁前要逐一拜访亲戚长辈并以对歌形式依依惜别、当新郎吃完岳母递上的“饭中饭”须把红包放进碗里以表达对岳母的感恩之情,等等。此外,该婚礼仪式中也充满着畲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情绪,如夫家要找一位儿孙满堂的“大姐”来“安床”,安床的同时要说吉祥话。畲民在婚礼中遵循一系列的仪式规范,旨在通过身体实践,以有形的方式呈现支撑畲族群体的形而上学。畲民在婚礼仪式中以其自身的身体动作传承畲族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传统风俗,并且个体在这个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巩固了有关畲族传统文化的记忆。

从器具符号来看,比如新娘的风冠通常就地取材,以山竹为原料制作,并配以带有象形类字符纹的银质饰品。畲民结合历史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以纹理图案为载体表现出自然风光景象,这些纹饰一方面蕴含着畲民在山间劳作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包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畲族新娘的凤凰装束坚守并世代传承了祖

先起源的传说、山间劳作的生活习俗、图腾信仰等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对畚族历史的叙事以及畚民对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表达。

仪式寄托了人们的个人愿望、生活态度以及社会情绪,仪式参与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原有信仰观念对仪式中的一系列符号进行解码,当这些符号所携带和传递出来的集体记忆、习俗、价值体系等与自己产生心理趋同时,那么这些反映出民族精神与风俗习惯的符号便成为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介质。婚礼中一系列的媒介工具激发了畚民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情感依附,人们通过婚礼仪式的符号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并获得心理上的强烈认同。仪式所强化的不仅是参与者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个体与民族缔结了更为深层次的羁绊。婚礼仪式中展现的婚俗文化在本质上是民俗凭借一系列符号表征“使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种种想象落实到实处,以重建想象的共同体”^[18],继而,民族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共同体中被不断地接受、认同和延续,强化了个体的民族认同感。

四、结 语

仪式是象征符的集结体,又是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19]它作为符号与意义交织的模式化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同时又兼具文化表征的功能。同时,仪式所突出的是参与者彼此间进行符号意义的交流、共享文化信仰的过程,其中涉及的符号元素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密切关联,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社会实践。

莪山畚族乡的婚礼仪式是以共同信仰为根基的具有民俗传播意义的活动,它以动作符号、声音符号和道具符号抽象化地表达了畚民的生活观念与传统习俗,但又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琐细。在仪式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共享和交换都为共同体成员对文化探寻根源、提升自我民族意识提供了可能。^[20]事实上,仪式包含着个体对符号表意的认知,而符号附着和联结着深厚的社会关系,在畚民这个共同的身份下,符号意义的共享使世代传承的思想文化观念、信仰以及情感得以建构和维系,并联结为一个具有意义的想象共同体,从而塑造和强化了民族认同,这也是参加婚礼仪式对于莪山畚民的根本意义所在。另外,在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我国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民俗的保护力度,谨防我国传统文化“失根”。为贯彻落实“双百”方针,

相关部门要善于利用各类民间仪式,促进各地更好地传承民俗,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感。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2] 王兰. 过渡礼仪:“河南蒙旗”婚俗的人类学考察[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1):70-73.
- [3] 刘丽娟. 历史视野下的黔中仡佬族婚俗变迁研究[D]. 贵州:贵州民族大学,2017.
- [4] 刘翔. 陕西关中民间婚俗服饰探析[J]. 戏剧之家,2015(8):252.
- [5] 陈琛. 柯尔克孜族“约隆”婚俗中的舞蹈调查与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7.
- [6] 赵书峰. 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调查研究:以湘、桂、滇瑶族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2016,29(3):184-196.
- [7]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6.
- [8] 黄晓京. 符号互动理论:库利、米德、布鲁默[J]. 国外社会科学,1984(12):56-59.
- [9] 瞿明安. 中国少数民族婚礼驱邪仪式中的象征符号[J]. 宗教学研究,2007(3):144-150.
- [10]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4.
- [11]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
- [12] 冉雅璇,卫海英,李清,等. 心理学视角下的人类仪式:一种意义深远的重复动作[J]. 心理科学进展,2018,26(1):169-179.
- [13] 石义彬,熊慧. 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J]. 湖北社会科学,2008(2):171-174.
- [14] 郭讲用. 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J]. 当代传播,2012(4):29-32.
- [15] 郭讲用. 传播仪式观中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J]. 新闻爱好者,2010(24):24-26.
- [16] 哈依沙尔·卡德尔汗. 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克烈部分支阿巴克烈部落为例[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20-28.
- [17] 陈力丹,王晶. 节日仪式传播:并非一个共享神话:基于广西仡佬族依饭节的民族志研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4):73-76.
- [18] 邵培仁,范红霞. 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J]. 当代传播,2010(3):15-18.
- [19] Edgar A, Sedgwick P R.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M].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340.
- [20] 陆璐. 仪式传播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与表达[D]. 合肥:安徽大学,2016:49.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folk custom and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view: A case study on marriage custom of She nationality village in Mount E, Zhejiang Province

WU Yifei, SHEN Nihan, HUANG Jiayin, WEN Yu

(Shi Liangca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American scholar James W. Carey as the core frame and regards the communication of human folk custom as a ritual a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t explores the ritual behaviors of She nationality’s marriage custom in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performa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ritual is a kind of stereotyped symbolic activity, in which people share collective memory, emotion and belief. In the wedding ceremony of She nationality village, locals construct the “imagined community” by exchanging and sharing a series of symbolic mean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ritual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of folk customs and shapes individual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marriage custom; collective memory; imagined community;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陈丽琼)

杭州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研究

程飞彪,朱琳,黄均华,江俊浩,胡绍庆,胡广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 树木形态是园林植物配置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探求园林树木在景观中的组合规律,对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曲院风荷公园内的园林树木进行调查,从植物形态组合的角度,分析园林树木形态组合及其与园林建筑景观的搭配,阐述不同的树木形态组合所表达出的景观效果,逐一分析其潜在的组合规则。同时测定典型区域中植物景观构成,运用群落生态学中物种重要值的定量方法和园林多角度视图来分析树木形态组合在园林景观构成中的地位 and 作用。研究表明:曲院风荷公园内尖塔形和圆球形是乔木最为广泛的组合形式,而灌木则没有较为明显的组合规律;与建筑的组合中前景植物以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为主,背景植物则以尖塔形最为突出。相关结论可以为园林景观中植物材料的选择、植物和周边素材搭配应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 杭州西湖;重要值;形态分类;植物配置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70-10

外在形态是人类感知和掌握环境空间、对事物进行喜好评判的首要特征。园林空间融合了人类对于环境形态的理解,园林艺术是表达人与自然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设计手段和精神创作^[1]。园林一般由山、水、石头、建筑、植物五大元素构成,其中园林植物,特别是园林树木,则是组成园林空间特有结构和属性的主要成分。在园林空间设计中,树木的外在形态,即树形是构景的基本要素之一^[2]。树木本身具有各自独特的姿态、色彩和风韵,不同形态树木的组合更是变化万千、妙趣横生,搭配特有风格的其他园林元素,对园林空间的构建可以说是“尽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所以,对园林中树木的形态组合进行定性、定量研究,能够更加科学地认识树木形态组合在园林景观构成中的作用和效果。有学者对天津园林植物的研究^[3]表明,影响植物景观效果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植物树形、常绿落叶比、观赏色彩数量、人工设施等。不同树形经过科学的配置和安排,可以产生韵律感、层次感等多种艺术组景的效果,可以表达和深化园林空间意蕴。^[4]孙筱

祥先生在《园林艺术与园林设计》一书中指出:园林树木形态使没有生命的建筑物与周围的树木花草取得过渡与调和,使具有强烈几何形体的建筑物与周围不规则的自然风景在形态和色彩上取得过渡与统一。^[5]本文以杭州西湖曲院风荷公园为对象,研究公园内植物的形态及其与周边建筑的组合规律,为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建议。

一、曲院风荷公园树木种类及形态调查

(一)研究方法

1. 现场调查

对曲院风荷公园内所有园林树木进行了实地调查,同时从艺术美感和树木与建筑在空间上的形态搭配两个角度选取两个研究区域,利用CAD制图软件在计算机上将两个研究区域分别划分成120个和80个方格,每个方格面积均为25 m²,并记录各个方格内木本植物的种类、形态、株数、高度、冠幅、胸径和生长状况等。

收稿日期:2018-04-27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X119);杭州市社科规划办专项项目(2015NSYJ3);浙江理工大学521人才项目

作者简介:程飞彪(1993-),男,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胡广,E-mail:hug163@163.com

2. 园林树木形态分类

在对曲院风荷公园内园林树木的形态进行调查后,根据树冠形态将树木形态基本类型分为:圆球形、水平展开形、圆柱形、纺锤形、尖塔形、垂枝形和特殊形七种,见图 1。同时按照植物的生长型将公园

内所有木本植物分为乔木和灌木两大类(由于藤本类植物可塑性强,形态多变,且与其依附物外形密切相关,较难分类,本文暂不讨论)。结合上述分类规则,对公园内园林树木进行整理比较,按照植物树冠或群丛外轮廓对各树木形态类型进行分类,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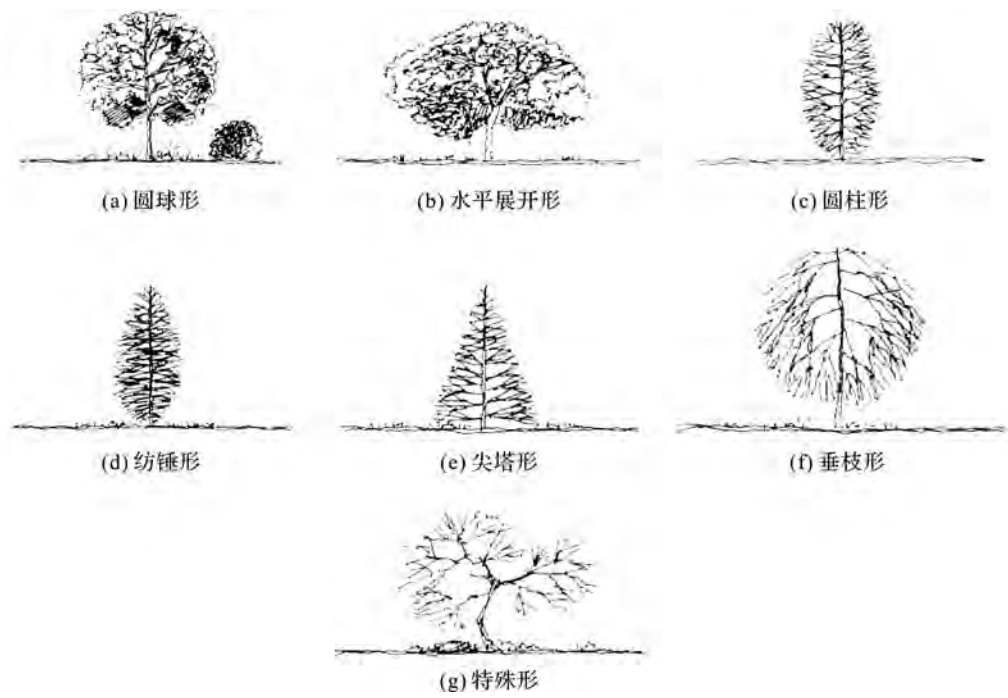


图 1 园林树木的七种形态类型

表 1 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分类及代表树种

类别	形态	代表树种
乔木	纺锤形	含笑(<i>Michelia figo</i>)、香樟(<i>Cinnamomum camphora</i>)、银杏(<i>Ginkgo biloba</i>)、秃瓣杜英(<i>Elaeocarpus glabripetalus</i>)、枫杨(<i>Pterocarya stenoptera</i>)
	圆柱形	玉兰(<i>Magnolia denudata</i>)
	水平展开形	日本五针松(<i>Pinus parviflora</i>)、鸡爪槭(<i>Acer palmatum</i>)、红枫(<i>Acer palmatum 'Atropurpureum'</i>)
	圆球形	早樱(<i>Cerasus yedoensis</i>)、桂花(<i>Osmanthus fragrans</i>)、无患子(<i>Sapindus mukorossi</i>)、国槐(<i>Sophora japonica</i>)、美人茶(<i>Camellia uraku</i>)、厚皮香(<i>Ternstroemia gymnanthera</i>)
	尖塔形	水杉(<i>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i>)
	垂枝形	垂柳(<i>Salix babylonica</i>)、垂丝海棠(<i>Malus halliana</i>)
	特殊形	棕榈(<i>Trachycarpus fortunei</i>)
灌木	圆柱形	木芙蓉(<i>Hibiscus mutabilis</i>)(幼树)
	水平展开形	洒金东瀛珊瑚(<i>Aucuba japonica var. variegata</i>)、八角金盘(<i>Fatsia japonica</i>)、紫薇(<i>Lagerstroemia indica</i>)
	圆球形	金叶女贞(<i>Ligustrum × vicaryi</i>)、花叶女贞(<i>Ligustrum ovalisilium</i>)、胡颓子(<i>Elaeagnus pungens</i>)、枸骨(<i>Ilex cornuta</i>)、红叶石楠(<i>Photinia × fraseri</i>)、红花檵木(<i>Loro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i>)、毛白杜鹃(<i>Rhododendron mucronatum</i>)
	垂枝形	云南黄馨(<i>Jasminum mesnyi</i>)

3. 重要值计算

重要值(IV)是生态学中植被数量参数之一,由Curtis等^[6]提出,它是反映某个物种在森林群落中作用和地位的综合数量指标,在植物群落研究中应用广泛,能够直接反映植物群落中不同物种的数量特征以及判别群落中优势物种^[7-9]。本文中重要值体现了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类别占据景观空间的相对大小。

IV的计算公式如下:

$$IV = (RA + RD + RF) / 3.$$

其中:IV为重要值;RA为相对多度;RD为相对显著度或相对盖度;RF为相对频度。相对多度: $RA/\% = (\text{某种植物的个体数} / \text{全部植物的个体数}) \times 100$;相对显著度: $RD/\% = (\text{某种植物胸面积和} / \text{全部植物胸面积总和}) \times 100$;相对频度: $RF/\% = (\text{某种植物的频度} / \text{全部植物的频度总和}) \times 100$ 。

(二) 树木形态组合与实景分析

对曲院风荷公园内园林树木形态组合进行归纳和功能分析,同时对选择的两个代表性景观,从平面、立面和透视三个角度表现并分析其景观价值。用手绘的方式直观的将树木的搭配方式及种类反应在平面上,回归到树木种植设计最初最原始的一面。在所选景观内树木形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不同树木形态及其组合在景观中的作用,并通过对所选景观的逐个分析,整合归纳常见的树种形态与建筑的组合形式,以及这些组合所形成的景观意境和风格,探究园林树木之间以及和建筑的内在的联系和规律。

二、曲院风荷公园中的树木形态组合

(一) 不同形态树木的空间表现与作用

a) 圆球形:圆球形树木因其柔和的外形常丛植

或群植,如图2(a)所示。与其他形态树木不同,圆球形树木外形简单清爽,不会过度引导视野。^[10]因此,在整个构图中,圆球形树木可以作为百搭要素而不会破坏整个画面的统一性,不仅可以组团造景,也可以调和其他外形较强烈的植物和建筑。

b) 水平展开形:水平展开形树木在横向上会引导人们的视觉,因此,这类树木可以用于空间布局中形态的过渡。水平展开形树木也可以和平坦的地形以及较为低矮的建筑物搭配,能延伸建筑物的轮廓,使其融汇于周围环境之中,如图2(b)所示。

c) 圆柱形:圆柱形与纺锤形相似,差别在于其顶部为平整圆形,如玉兰等。大量的使用该类树木,会增强竖向视觉空间,如图2(c)所示。

d) 纺锤形:纺锤形树木因其与圆柱形相似的外部形态有着相近的使用方式,如图2(d)所示,设计用途亦是跟圆柱形树木相似。

e) 尖塔形:尖塔形树木整体形态简单明确,相比其他形态树种有着更高的辨识度。由于其明确的外在形态,为了在构图上不突兀,通常不会将这类形态的树木种植在较为广阔平坦的地势中。此外,尖塔形树木搭配传统型建筑会更加突出建筑美感,如图2(e)所示。

f) 垂枝形:在自然界中,水边的垂柳非常常见。通过与周边水体进行搭配是这类树木配置的常见手法。将该类树木种在种植池的边沿或地面的高处,越过水池的边缘或垂挂的树木枝条和水面会产生动与静的鲜明对照,如图2(f)所示。

g) 特殊形:特殊形树木因其独特的外部形态常在园林规划设计中孤植于环境里,其形态与枝叶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树木,辨识度高,观赏性强,如图2(g)所示。



图2 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的实景照片

并非所有树木都能与上述七种形态一一对应,有些树木的形状在不同的季节表现出不同形态特征,人为修饰也会改变其天然形态。尽管如此,树木形态仍是园林设计中设计师在构图、构景时十分关注的一点。

(二) 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组合在曲院风荷公园中的应用

a) 纺锤形与圆球形组合。纺锤形树木一般体量较大,常与体态较小的圆球形树木搭配种植,如图3(a)所示。但是纺锤形树木因其体态上的优势造成过多的视线焦点,如果在设计中使用数量过多将破坏整个画面的构图。



(a) 纺锤形与圆球形组合



(c) 水平展开形与圆球形组合

b) 纺锤形与水平展开形组合。在景观构图中横向的水平展开形树木与垂直的纺锤形和圆柱形树木会在视觉上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效果,使垂直树木更加突出,如图3(b)所示。

c) 水平展开形与圆球形组合。展开形树木通过延伸水平空间与较矮的圆球形树木配植在一起时,对比尤为醒目,如图3(c)所示。

d) 尖塔形与垂枝形组合。垂枝形树木因其垂直向下的枝条可以引导人们的视觉,因此可以在引导视线向上的树形之后,配合使用垂枝树木,如图3(d)所示。



(b) 纺锤形与水平展开形组合



(d) 尖塔形与垂枝形组合

图3 园林树木不同形态的组合配置

(三) 曲院风荷公园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的基本规则

从整体上看,曲院风荷公园中存在着多种树形组合的配置模式,但是也都具有多样统一的基本规律。

a) 形态组合的通相——不同形态树木的组合需要先求同。一般选择的树种在某些特征上具有一致性,例如树种相同、高度相同、色彩类似和物候类似等。对比过于强烈的树种搭配在一起会破坏画面的协调性。图3中各场景中的植物分别在高度、物候和色彩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b) 形态组合的殊相——树木组合在求同的基础上需要存异。过于相似的树木组合会使景观显得刻板;形态、动势和大小上的差异会使得景观生动活泼。各树种组合除了形态差异外,姿态和大小上都有一定的区分。

c) 形态组合的主次——树木组合需要有主次之分。主树和客树的数量和规模不能简单地平均分配,这样会造成景观的机械平衡,不分主次。主树构

成景观的主景,而客树则丰富景观的曲折变化,同时还要保证主体部分互不遮掩。

在曲院风荷公园内乔木之间的搭配以高宽比较突出的尖塔形、纺锤形或圆球形最为频繁。例如清帘坊、荷香酒溢等景点中运用大量近似的尖塔形或纺锤形乔木作为建筑的背景,前景树木多为略低矮的圆球形与纺锤形小乔木或灌木,这些主要形态组合均体现了多样统一的基本原则。

三、园林树木形态与园林建筑的景观搭配

园林树木配置一般包括两个方面^[1]:一是从构图、构景、色彩以及园林意境的角度考虑不同体量、种类树木之间的组合;二是不同园林要素之间的搭配组合。建筑是园林的组成要素之一,优秀的园林建筑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常成为一处景点乃至一个城市的标志。园林建筑尽管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品单独存在,但是建筑和植物材料的合理搭配能使整个景观表现更为丰富,增强游人融入自然的

感受。而且树木柔和多变的外形与建筑硬朗的线条互补,因此园林中树木与建筑的搭配是形成优美景观必不可少的。挑选各种形态的园林树木进行科学的配置,组合各种其他园林元素以达到适宜的景观效果是一名景观设计师的主要工作之一。^[12]

a) 协调建筑物与周围的环境。在建筑物周围搭配圆球形和展开形等柔和形态的树木,可以软化建筑物生硬的线条,协调其与周围的环境,同时也赋予了建筑物生命力,如图4(a)所示。若配上形态规则的树木,如尖塔形和圆柱形,则会更加突出建筑的庄严、肃穆。

b) 丰富建筑物的艺术构图。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在平地矗立时画面常显得孤寂,这时需要搭配一些自然形态的园林树木如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进行衬托或对比,在协调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的同时,也起到了丰富建筑物立面构图的作用,如图4(b)所示。

c) 赋予建筑景观季相变化。树木配置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并用形式美做艺术性表达。不仅考虑树木的现在形态,更要关注树木的未来以及随着季节的更替而不断变化的特性,从而达到步移景异、时移景异,营造出“出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优美景观。

树木在一年中,呈现萌芽——展叶——开花——结实——落叶——休眠的变化,树木形态的变化展现出不同的季节景观,由此赋予了建筑景观季相感。随着树木四季的变化,同一景观及其意境也会随之改变。落叶树木春天繁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季红果累累,冬季枝干苍劲,其形态也从水平展开形、圆球形向特殊形发生变化,周而复始。

d) 补充建筑物的功能。通过和不同形态树木的搭配设计,可以补充和提升建筑物的功能。当建筑的出入口比较小时,在出入口搭配相当体量的水平展开形的树木会让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相对和谐,也更容易让人适应其中,如图4(c)所示。当然在一些比较庄严的建筑旁搭配圆柱形或纺锤形树木,构建相对规整的树墙,将更加突出建筑风格。在园林中,如果放眼望去只有建筑,那么建筑的美感就会显得单薄而无味,而通过配置不同形态的树木则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例如,将具有线条美的尖塔形树木作为建筑的背景将会使其更加醒目,如图4(d)所示。在公园或风景区入口处配置形态独特、醒目的特殊形树木,可以给人指引的作用,如图4(e)所示。



(a) 树木的配置软化建筑的线条



(b) 不同形态的树木丰富建筑的立面



(c) 水平展开形树木在建筑入口的配置



(d) 尖塔形树木作为建筑背景的配置



(e) 特殊形树木在建筑入口处的配置

图4 树木形态与园林建筑的搭配

四、树木形态景观应用案例分析

(一)研究区域一

位置:曲院风荷公园东部清帘坊。

面积:4100 m²。

树木组成:见表 2。

配置特点:如图 5 所示,采用多形态、多色彩的乔灌木进行多层次多样化组合,营造自然、生态的丛林式景观。树木的搭配不仅成为建筑主体背景式的烘托,更加为建筑营造出怡人、舒适的环境。不同形态类型的树木景观环境对人生理和心理产生不同影响。多形态的树木组合空间也满足了不同人的心理需求^[13]。

1. 树木形态组合分析

在研究区域一中,主体建筑一面临近大面积的水面,背景植物多由高大的尖塔形乔木作为建筑的衬托,延绵之势与水面相呼应;临水一侧多由圆球形及垂枝形的垂柳组合作为近景,对整个建筑与水面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由于建筑一面亲水,为了不遮挡主体建筑灌木相对较少,大量的尖塔形水杉配合水面形成大气而优美的滨水景观。中景植物多由水平展开形及纺锤形树木组合,不仅过度远近景中树木之间体量之差,而且很好地缓和了建筑与远景树木之间的体量之差。在整个研究区域中,圆球形与水平展开形的树木组合以及水平展开形和尖塔形的树木搭配较为密切,使用频率较高。

2. 树木各形态重要值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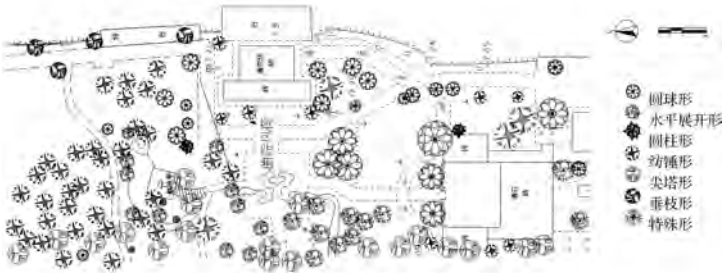
以树木形态为分类依据,分别计算研究区域一不同树木形态乔木和灌木在该区域景观植物材料中所占的重要值,如图 6 所示。

表 2 研究区域一的树木形态分布及数量

层次	树木形态	树种名称	株数/株
乔木	圆球形	早樱	4
		桂花	6
		无患子	7
		国槐	4
		美人茶	5
	水平展开形	日本五针松	2
		鸡爪槭	19
		红枫	1
	圆柱形	白玉兰	2
		含笑	2
	纺锤形	香樟	3
		银杏	15
		秃瓣杜英	16
	尖塔形	水杉	19
	垂枝形	垂柳	4
	特殊形	棕榈	1
灌木	圆球形	金叶女贞	24
		花叶女贞	4
		胡颓子	4
		枸骨	20
		红叶石楠	6
	水平展开形	桂花	30
		红花檵木	7
	水平展开形	洒金东瀛珊瑚	63
		八角金盘	2
	圆柱形	木芙蓉	15
	垂枝形	云南黄馨	4



(a) 研究区域一透视图



(b) 研究区域一平面图

图 5 研究区域一的树木配置情况

由图6可知,在研究区域一中,重要值较高的乔木植物形态是尖塔形、纺锤形和圆球形,其中尖塔形植物的重要值为30%,优势最为明显;而水平展开形、垂枝形、圆柱形和特殊形态的乔木重要值较低,其中特殊形乔木最低为1%。灌木的树木形态较少,有圆球形、水平展开形、圆柱形和垂枝形,其中圆球形灌木的重要值为74%,远远高于其他形态的灌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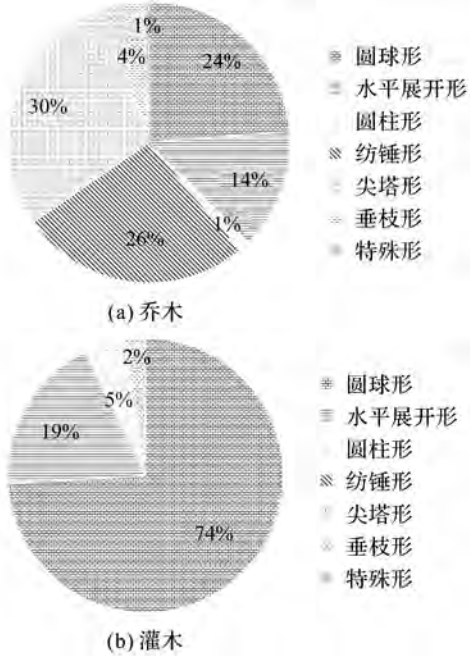


图6 研究区域一中不同形态园林树木的重要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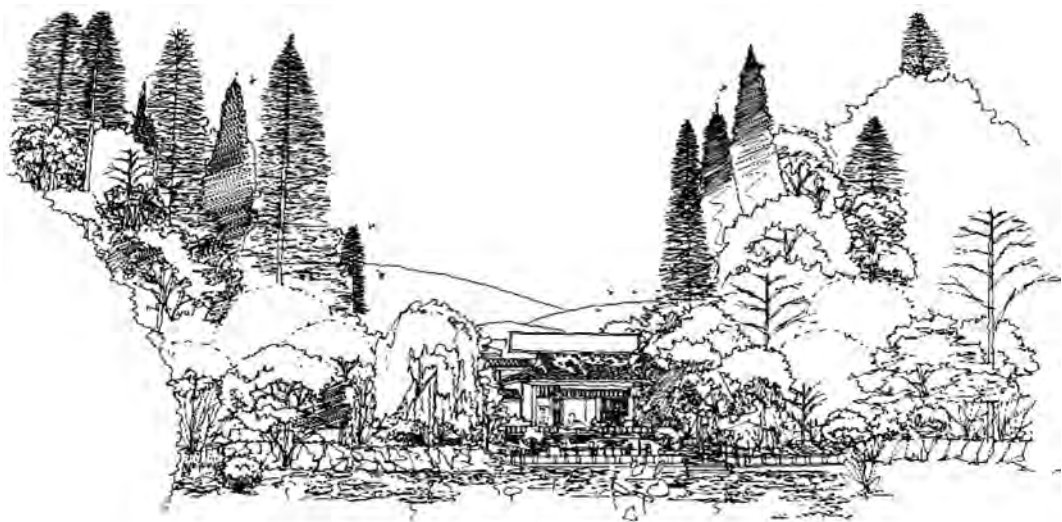
(二)研究区域二

位置:曲院风荷荷香酒溢。
面积:4000 m²。
树木组成:见表3。

配置特点:如图7所示,用多层次、多形态的乔灌木树木组合成两侧不对称式的自然景观,建筑背面由植物围合形成较封闭的背景环境;建筑正面则临水形成开放的视野与光照条件,更加突出建筑物的轮廓与细节。不同形态树木的组合和造型对景观的烘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4]

表3 研究区域二的树木形态分布及数量

层次	树木形态	树种名称	株数/株
乔木	圆球形	早樱	1
		桂花	27
		美人茶	1
		厚皮香	1
	水平展开形	鸡爪槭	17
	圆柱形	白玉兰	2
	纺锤形	银杏	12
		秃瓣杜英	12
		枫杨	2
	尖塔形	水杉	16
灌木	垂枝形	垂丝海棠	2
	圆球形	枸骨	10
		毛白杜鹃	2
		红花檵木	7
	水平展开形	洒金东瀛珊瑚	40
		紫薇	61
		八角金盘	8
	圆柱形	木芙蓉	6



(a) 研究区域二透视图



图 7 研究区域二的树木配置情况

1. 树木形态组合分析

在研究区域二中,乔木作为建筑的衬托对整个环境的营造起主要的作用。由于建筑一面亲水,为了不遮挡主体建筑灌木相对较少。尖塔形与纺锤形树木作为背景树木大量出现与相对矮小的建筑形成对比,也营造了整个环境的氛围基调。大量的展开形树木与建筑的搭配则更好地将建筑融合在整个环境中,也成为建筑的一部分成为主景,树木合理的配置不仅没有太过突出反而更好地衬托了建筑。由图 7 中不同形态树木的定位可知,以主体建筑由南至北构成的近、中、远景里,近景树木形态以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为主,远景以尖塔形为主,且整个研究区域中圆球形与水平展

开形的树木以及圆球形和尖塔形态的树木搭配较为密切,频率较高。

2. 树木各形态重要值分析

以树木形态为树木物种分类依据,分别计算不同形态乔木和灌木在该区域景观植物材料中所占的重要值,如图 8 所示。

在研究区域二中,重要值较高的乔木植物形态是尖塔形、纺锤形和圆球形;其中尖塔形植物的重要值为 37%,优势最为明显;而水平展开形、垂枝形和圆柱形的乔木重要值较低,其中垂枝形和圆柱形乔木最低,仅为 2%。研究区域二中灌木的植物形态较少,有圆球形、水平展开形和圆柱形,其中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占比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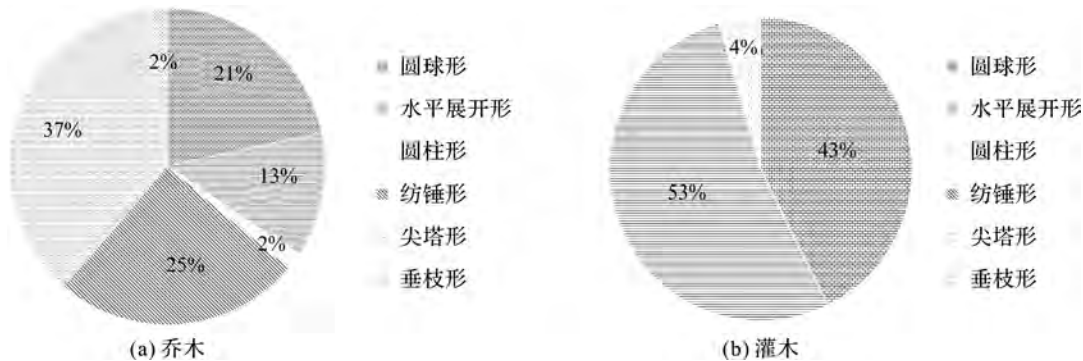


图 8 研究区域二中不同形态园林树木的重要值

五、结论与展望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树木的配置是园林规划设计中尤为重要的一

环。以往对园林树木选择和搭配的研究多以树木物种为研究单元,其缺点在于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普适性相对较弱。本文以园林树木的形态类别作为研究单元,同时结合了传统的园林景观分析和生态学的

量化分析,通过实例探讨了园林景观设计中树木形态配置的基本规律。

a)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符合多样统一的基本规则,在总体景观统一的基础上,又突出各形态的特点,使得景观协调又生动活泼。

b)在曲院风荷公园中,尖塔形乔木占据主要的上部景观空间,在植物造景中最为突出;而人工修剪的圆球形则在灌木中占据主要优势。

c)在不同形态乔木的组合中,尖塔形与圆球形的乔木组合频率最高。重要值分析发现乔木形态的选择在不同区域大致相同。

d)灌木的形态选择在不同区域的差距较大且形态种类也较单一,因其人为修剪频繁、体量小及群体化种植的特点决定了灌木形态分布规律性不明显。

e)树木形态与建筑的组合中前景树木以圆球形和水平展开形为主,背景树木以尖塔形最为突出。

上述结论虽然仅根据曲院风荷公园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但是由于这些结论是基于树木形状而非具体树木物种,受地域与气候限制较小,因而具有更好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在与曲院风荷公园类似的环湖公园中,尖塔形与圆球形的树木组合在以山体或湖面为背景的景观营造中具有较好的效果。

(二)应用前景及今后研究方向

本文从园林树木形态组合及其与建筑搭配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尝试剖析树木形态在园林景观空间营造的效果以及组合规律,为园林树木形态的景观应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创新研究的思路及方法,进而对树木形态选择的量化研究和园林景观的科学营造发展提供帮助。在进行树木配置时要善于借助不同树木的形态特征,展示出树木在形体上装点空间的艺术美。^[15]

本文简单地分析了杭州曲院风荷公园的树木形态组合的规律与应用,未来对于园林树木形态组合的研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深入探讨,例如树木形态的季相变化、树木形态美的心理学基础、树木形态的光影变化、树木形态与动物的联系等。虽然树木形态只是园林树木选择和配置的一个方面,但是在了解

解树木形态组合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树木配置,不仅可以营造出更为合理和美观的景观空间^[5],同时也为风景园林设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野和角度。

参考文献:

- [1] 陈静. 浅析园林景观中植物的形态美学[D]. 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3:1.
- [2] 李树华. 园林种植设计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8.
- [3] 张秦英,罗开喜,白云鹏,等. 基于SBE法的天津常绿园林植物景观评价研究[J]. 北方园艺,2015(23):90-93.
- [4] 徐洁. 园林植物形态分析与景观应用的研究[D]. 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13:29.
- [5] 孙筱祥. 园林艺术及园林设计[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42.
- [6] Curtis J T, McIntosh R P. An upland forest continuum in the prairie-forest border region of Wisconsin[J]. Ecology,1951,32(3):476-496.
- [7] Lindsey A A. Sampling methods and community attributes in forest ecology[J]. Forest Science,1956,2(4):287-296.
- [8] Ayyad M A G, Dix R L. An analysis of a vegetation: Microenvironmental complex on prairie slopes in Saskatchewan[J]. Ecological Monographs,1964,34(4), 421-442.
- [9] 钱迎倩,马克平.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原理与方法[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32.
- [10] 田晔林. 湖南省山茶属红山茶组植物分类及园林应用研究[D]. 长沙:中南林学院,2001:23-24.
- [11] 崔淑勇.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中植物配置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3):3852-3853.
- [12] 侯静. 风景园林中植物景观规划设计方法[J]. 现代园艺,2017(6):134-135.
- [13] 邢振杰,康永祥,李明达. 园林植物形态对人生理和心理影响研究[J]. 西北林学院学报,2015,30(2):283-286.
- [14] 周坤. 上海迪士尼乐园主题式景观场景营造与植物搭配[J]. 中国园林,2017,33(7):12-16.
- [15] 宣立佳,陈小平. 植物配置在生态园林设计中的体现[J]. 现代园艺,2016(10):69.

Study on shape combination of ornamental trees in Quyuanfenghe Park, Hangzhou

CHENG Feibiao, ZHU Lin, HUANG Junhua, JIANG Junhao, HU Shaoqing, HU Gua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ree shape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lant arrangement for landscape design. To investigate the shape combination law of ornamental trees, the ornamental woody plants were surveyed in Quyuanfenghe Park at the West Lake Scenic Area in H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nt shape combination, shape combination of ornamental trees and their match with garden landscape were analyzed. The landscape effect expressed by different tree shape combinations was stated, and the potential combination law was investigated one by one. Meanwhile, plant landscape structure in the typical area was determined. The method to determine species importance value in community ecology and multi-angle view of garde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role of tree shape combination in garden landscape structure.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the spire and sphere shapes are the most extensive combination form of trees, while there is no obvious combination law for shrubs in this park. The sphere and horizontal expanding plants were commonly arranged for the foreground of buildings, and spire plants were arranged for background.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plant selection, an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nfiguration between plants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 landscap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est Lake in Hangzhou; important value; morp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plant arrangement

(责任编辑:陈丽琼)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论中国现代画家诗人的宗教身份认同

叶澜涛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 由于中国古典绘画与宗教之间互相影响的艺术传统,因此许多现代传统型画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宗教身份认同,这样的宗教身份认同感也影响了这些画家的诗词创作。根据现代画家诗人的职业属性和认同程度差异,具有宗教身份认同的现代画家诗人群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宗教信仰者,如李叔同、丰子恺、苏曼殊等;一类是宗教研究者,如叶恭绰、饶宗颐等。现代画家诗词中的宗教身份认同,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画家诗人创作中悠久的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宗教与绘画及诗词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现代;画家诗人;宗教;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80-08

中国的绘画与宗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极大影响了中国绘画的题材表现,大量的佛像绘画开始出现。^[1]而道教绘画最早出现于东汉,魏晋时期图像类道书已经初具规模,到了唐宋时期,道教壁画已经相当普遍。^[2]与西方宗教画的功能相似,中国的宗教画在传播宗教思想、扩展绘画题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有不少僧侣道士精于绘事,在修禅问道之余从事绘画研究,成为著名的宗教画家,例如五代的巨然、北宋的惠崇等。宗教画发展到元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擅佛家宗教画的“清初四僧”(石涛、朱耷、弘仁、髡残)和擅长道家宗教画题材的黄公望、赵孟頫等。

宗教画的发展历程显示出宗教与绘画之间密切的艺术关联。宗教的艺术呈现方式除了绘画外,与诗词的关系亦是十分紧密。由于中国绘画一直拥有“诗画一律”的传统,因此画家在创作绘画时常常题诗于画,产生了大量宗教题材的题画诗。这些题画诗一方面是画家对画意进行解读的有效途径,帮助

赏画者了解绘画的内容;另一方面,题画诗也能够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将绘画的时间、地点、背景、意图等信息通过诗词的方式传达给受众。宗教与诗歌的关联除了题画诗的形式外,画家们也常常单独在其诗词集中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怀。通过这些宗教题材的诗词,我们可以了解画家的思想渊源和艺术倾向。部分中国现代画家继承了传统的“诗画一律”的宗教画创作传统,无论在绘画中还是在诗词中都大量表现与宗教相关的内容,表达出画家心中强烈的宗教情感。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关于现代画家诗词中宗教因素的研究仅对少量著名画家的诗词创作展开讨论。论文方面,如夏中义的《〈缶庐别存〉与梅石写意的人文性——兼论吴昌硕的“道艺”气象暨价值自圆》^[3]、《故国之思与泼墨云山境界——论张大千题画诗的心灵底蕴与其绘画的互文关系》^[4]和卢忻的《信手拈来总可惊——潘天寿诗歌概说》^[5]等,对个别画家的诗词做了详尽解读。专著方面,如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6]、刘梦芙的《近百年名家旧体

诗词及其流变研究》^[7]等,虽然对画家的诗词创作有专章的介绍,对于这一创作群体缺乏深入有效的分析。

虽然现代画家诗词中涉及到宗教题材的内容并不少见,但由于画家人生经历和知识背景的差异,宗教因素在这些画家诗词中呈现出的面貌也有一定的差异。根据现代画家诗人的职业属性及其宗教影响的程度差异,现代画家诗人群的宗教身份认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宗教信仰者,如李叔同、丰子恺、苏曼殊等;一类是宗教研究者,如叶恭绰、饶宗颐等。虽然,具有宗教身份认同的现代画家诗人远不止这些,但这些画家诗人仍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现代画家诗人中的宗教信仰者

在现代诸多画家诗人中有部分画家诗人因个人经历或人生信仰等原因具有了宗教身份。这种宗教身份一方面体现在其日常行为举止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其绘画诗词的创作中。具有宗教身份的现代画家诗人以李叔同、丰子恺、苏曼殊等最具代表性。

(一)李叔同的宗教信仰经历

李叔同是现代律宗著名的继承者,他的宗教信仰经历颇为传奇。出家之前的李叔同可谓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4岁开始临习书法,8岁开始攻读《文选》,21岁以童生身份参加生员考试,考取第三名。26岁留学日本,广泛接触美术、音乐和戏剧,28岁与日本模特结婚。33岁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大力提倡艺术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当他的事业和人生达到完满的时候,偶然的断食试验却让李叔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时,还只是每周减食饭量。为期三周的断食结束后,他还请摄影师为自己拍了一幅手捧《断食日记》的照片。看起来,一切都像是他以前从事的诸多试验之一。然而,《断食日记》却记载断食期间“文思渐起,不能自己”,“精神世界一片灵明”,“发喜无垠”,断食第七日时已经“空空洞洞,既悲且欢”,这对于李叔同来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让他感到莫名的兴奋。断食成功后,他改名“李婴”,号弘一,取字为“婴”意即返回蒙初之始,万物皆可放下。

李叔同的出家似乎并无征兆,然而作为一个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才子型艺术家,似乎一切又显得顺其自然。9岁时,他常随家人前往寺院,学会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1913年夏,他与夏丐尊在杭州广化寺吃茶时,夏丐尊说了一句玩笑话:“像我们

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无意中让李叔同当了真,这算是他出家的远因。断食斋戒的经历让李叔同“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这是他出家的近因^[8]。他的弟子丰子恺非常理解老师李叔同的追求,遁入空门正是向人生更高层次的迈进。“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最后顶点就是第三层。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9]96-98}李叔同的出家正是因为他不满于在第二层流连,一旦决定出家,便真的放弃所有绝不回头。他的长兄听闻三弟出家的消息赶紧与弟妹俞氏打算来杭州相劝,但俞氏知道丈夫的性格,一旦决定的事情绝难改转,因而也就没有成行。他的日籍妻子福基倒是与李叔同见上一面,但无论福基如何相劝,李叔同始终不为所动。福基见他心意已绝,只得大哭一场伤感离去。再次相见已是几年后,福基由李叔同出家前的好友相伴,在岳庙前的一家素食店与李叔同相见。席间,已改名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不曾主动说一句话,三问一答。“席后他乘船向湖心亭而去,竟不一顾。”^[10]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不仅放下俗世的尘念,也放下了对于艺术的诸般爱好。出家后,绘画、音乐、戏剧甚至诗词诸般技艺皆不续作,惟有书法没有放弃,但已为宗教服务,不再追求体式变化,反而朴拙如婴。

出家前的李叔同,诗词曲歌样样精通,出家后却只作联语、偈语。联语多为赠与寺庙题写的对联,偈语则多为体悟佛法的诗句。1929年,弘一乘船至厦门,在南普陀寺协助闽南佛学院整理学院,特为学僧撰写《悲智颂》: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着于不。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怀。愿垂玄察。

弘一法师所修为律宗,律宗是最讲究持戒的佛教宗派,祖庭在唐代终南山净业寺,因此又称南山

律。弘一法师出家后严守律宗教义,曾手书《受八关斋戒法》。所谓“八关斋戒”的戒律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非梵行,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非时食,七不香花鬘庄严其身,亦不歌舞倡戏,八不坐卧高广大床。弘一法师终身严守“八关斋戒”,以己身正戒律,对于规范当时日益松弛的佛教戒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弘一法师弟子丰子恺受其业师好生护幼的佛法影响,创作《护生画集》以提倡爱护世间生灵万物。弘一法师感其昔日弟子心诚,特别为《护生画集》题赞:“李(圆净)、丰(子恺)二居士,发愿留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画一叶,附白话诗,选录古德者十七首,余皆贤瓶道人补题。并书二偈,而为回向。”^[11]弘一法师为弟子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题写了不少诗词,这些诗词处处可见弘一法师的律宗思想,如《蚕的刑具》,“残杀百千命,完成一袈衣。维知求适体,岂毋伤仁慈?!”这是提倡“不杀生”。如《醉人与醉蟹》,“肉食者鄙,不为仁人。况复饮酒,能令智昏。誓于今日,改过自新。长养悲心,成就慧身。”则是强调不饮酒、不杀生。如《残废的美》,“好花经摧折,曾无几日香。憔悴剩残姿,明朝弃道旁。”则是强调不用香花等夸饰之物装饰自身。丰子恺借助《护生画集》中通俗雅致的漫画形式,向众生反复宣扬自己护生守德的思想。

晚年的弘一法师常集《华严经》偈语手书成联,为的便是“破我执”。“远离一切有,圆满无上悲。”这是集《光明觉品》《入法界品》中的句子,讲的是放下“有”的执念,才能完成自身的圆满。“远离众生相,具足大悲心。”这是集《光明觉品》《妙胜说偈品》中的句子,说的是要远离世间诸般色相,常怀慈悲之心。“度脱众生海,满足大愿云。”这是集《十行品》《入法界品》中的句子,讲的是超越众生万念,成就人生愿望。律宗作为我国八大佛教流派之一,属于大乘佛教。以上劝解众生“破我执”联语,正是强调度化众生时,不要有“我”的执念。“我执”即自我意识的障碍,当过于注重“我”,智慧就会消失。因此,要消灭“我”,变成“无我”,方可成佛。弘一法师正是做到了“无我”,才走向作为佛教的真境界。弘一法师出家后,有一次在弟子丰子恺家中看到当年自己身着西装和戏装时的照片。他一一讲述当时的场景,满脸不动声色,面带超然而空虚的笑容,仿佛完全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这说明他已超然地进入“无我”之境。辞世之时,弘一留下两句偈语:“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正是怀着“其淡如水”的情感,他离开世界时无嗔无惧。所谓“天心月圆”,正是要与天地日月融为一体。

(二) 丰子恺的宗教信仰践行

李叔同的艺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在出家前和出家后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和友人。当时在浙江一师学习的丰子恺非常崇敬这位多才多艺的老师,他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回忆道:“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如他,要向他学习。”^[12]李叔同出家前夕,曾赠与丰子恺一册自撰的诗词手卷,指着其中一首词《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同学诸子》告诉丰子恺,他当时作此词时正是他这个年纪。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徒,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积极践行恩师教诲。他在192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自己生日当天在上海立达学园正式皈依佛教,取法名婴行^{[9][154]}。自此,丰子恺在他的绘画中融入更多的佛教色彩,积极宣扬“戒杀”“护生”的思想,其中《护生画集》最为典型。他为了祝贺弘一法师五十寿辰,特别绘制护生画50幅,即《护生画集》第一集(1928年开明书店发行)。弘一法师60岁时又画60幅,70岁画70幅,预定是100冥寿时画100幅。他先后画就了护生画共450幅,分六集,1979年全书在香港出版发行。除了作画外,丰子恺还专门以法名“婴行”为《护生画集》撰写诗词,如《裸负其子》,“母鸡有群儿,一儿最偏爱。娇痴不肯行,常伏母亲背。”如《漏网》,“群鱼皆被难,一鱼独漏网。如人遇炸弹,相距仅数丈。如人遇炮火,飞弹拂颈项。身逢争战苦,此情始可想。”又如《蚂蚁搬家》,“墙根有群蚁,乔迁向南冈。元首为向导,民众扛糗粮。浩荡复迤迳,横断路中央。我为取小凳,临时筑长廊。大队廊下过,不怕飞来殃。”丰子恺之所以在《护生画集》中表现出强烈的佛教思想,除了老师弘一法师的影响外,也和当时的环境有关。丰子恺在抗战时期避难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助,在《子恺日记》中他一直在描述逃难生活之艰辛,这源于他对于生命的怜惜之情,这种悲悯之情自然化为笔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情与物。丰子恺感情体验异常细腻,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对于外在世界的体悟比常人更多一层。在丰子恺的佛学思想中,最著名的是他提出“护心说”,“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

世界的和平，故我们所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鱼虫的本身(小节)，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13]

(三)“革命和尚”苏曼殊的佛缘

苏曼殊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他的身世还是生活总是饱受世人争议。他似乎一直生活于矛盾之中，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佛教徒还是红尘中人？介入革命还是超脱远离？一直成为纠缠在苏曼殊心灵深处的心结。作为“中日混血私生子”，父亲与日本妻妹的通奸始终萦绕在敏感的少年苏曼殊心头。12岁时苏曼殊为生活所迫出家。由于当时懵懂无知，根本上说不上对于佛教教义有所体悟感受。因为生母已归日本，而自己在家族中备受歧视，“族人以子谷为异类，群摒斥之。”^[14]苏曼殊无所归依，出家实属万不得已的选择。因不忍族人虐待，被慧龙寺方丈带入山门。而他难忍持戒，偷食五香鸽肉犯戒被赞初法师逐出山门。16岁与日本少女相恋，少女溺亡后，苏曼殊披剃于蒲涧寺。20岁因革命形势不利，他决意再次出家，寄身番禺雷峰山海云寺，自命法号“曼殊”。与李叔同体会人生诸般滋味后出家不同，苏曼殊出家为僧并非发自内心皈依，更多的是出于生计考虑，所以他在佛法认知和守戒自持方面与一般佛教徒相比有较大差距。佛家讲超脱、讲无我，但早在1902年他留学日本期间，他就参加了陈独秀领导的“青年会”，后又参加“拒俄义勇军”“军国民教育会”等革命组织。不仅如此，1913年他还发表了《讨袁宣言》，斥责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在南社中享有“革命和尚”的称谓。

正是因为种种的矛盾和尴尬，苏曼殊一心将自己的苦闷寄意于文学。他大量创作小说、诗歌，翻译各国文学，显示出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在诗歌方面，他的诗歌充满颓废之美，近晚唐诗风。与此同时，他的诗文又有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李欧梵曾这样解读苏曼殊的多重性格：“像这些新道家圣徒一样，苏曼殊也有意显示出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风格，同时又试图用佛教教义来证明其合理性。不过，他那副和尚的外衣仅仅是一种装饰罢了。并不能为他的生活态度提供多少正当的理由，倒是给他格外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15]

苏曼殊的诗歌除了写给“调筝人”的情诗外，还有一部分是具有佛教色彩的禅诗，这些禅诗显示了他的僧人本色。《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即其中之一，“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

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这首诗作于1905年冬，当时苏曼殊在西湖白云禅院禅修时所作。诗的前两句写景，描绘的是雪景中的西湖寒梅。后两句写人，描述的是诗人自己在寺前修炼的情形。雪景净俏萧索，入定人则淡定自若，禅修人与雪景相映成趣，颇有一番佛意。

与李叔同一心皈依的禅诗不同，苏曼殊的禅诗中似乎总有对俗世不尽的缠绵与怨念。所谓缠绵，指的是他的禅诗中连绵不绝的情愫缠绕其间，成为有“情味”的禅诗；所谓怨念，则指的是他对于自己的飘零身世耿耿于心不能释怀。苏曼殊创作了许多有“情味”的禅诗，如《有怀》，“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其二)这首诗看似一首有关佛教题材的诗，实则是一首情诗。这首诗是为了怀念秦淮河上伎人金凤所作，前两句就是在怀疑自己修佛的定力。《寄调筝人》(三首)原本是情诗，但由于苏曼殊的僧侣身份，情诗中又多了一层佛教色彩。“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其一)“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其二)正是因为佛法与情欲之间的矛盾，因此这组诗颇引人争议。鲁迅曾评价“《寄调筝人》系曼殊自作的情调颓废性的三首七绝。”^[16]所谓“颓废性”指的正是二者的矛盾之处。

苏曼殊的禅诗中不仅情味十足，还有充满凄凉身世的怨念之情。这在许多诗中可以找到痕迹，如《过若松町有感》，“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若松町是日本长崎县市镇，苏曼殊东渡日本时于此养病。回忆往日时光，诗人颇感孤独凄凉。又如《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君》，“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这首诗与前一首写作背景相同，幼年不幸的苏曼殊似乎总把感情寄托他人，然而他人似乎总会离他而去，孤独成为他逃脱不掉的宿命，做天地间“行云流水一孤僧”。在《步韵答云上人》中，他感慨“旧游如梦劫红尘，寂寞南洲负此身。多谢索书珍重意，恰依憔悴不如人。”这是一首酬答南社同仁张烈的诗，当时苏曼殊正应孙中山要求远赴印尼任教，因此有句“寂寞南洲负此身”。“恰依憔悴不如人”是回应友人张烈的问询，他用“不如人”极言自己穷愁潦倒的处境。

同为僧人，之所以李叔同和苏曼殊在诗文风格和佛学修上有如此大的差别，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是人生经历不同。李叔同出生于富庶家庭,年少时因财力充裕加之聪颖过人,尝试的艺术诸般门类皆能运用自如。出家之前感情经历丰富,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宗教追求属于他终极精神追求的必然结果。苏曼殊却不同,与李叔同的“完满”相比,苏曼殊一直处于“亏欠”状态。幼年的不幸经历、情感上的反复挫折使得苏曼殊一直有“弃儿”心态。他一直在僧俗之间徘徊,除了年龄原因,恐怕与颓废的个人心态也有密切关系。二是对于佛教教义的认识不同。由于前者的差异,因此二人对于佛教教义的认识水平是有差异的。弘一法师所修律宗教义严格,但他谨遵严守并远赴厦门等地宣讲传播,这种认同感是发自内心的行为。而苏曼殊从来就将佛门当作遁世的工具。他偷盗师兄遣凡(法名博经)的度牒,自号“曼殊”,所行之事已为佛门所不耻。出家后又反复纠缠于世俗情感,他还利用宗教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可以看出,他的宗教身份成为感情生活和革命生活的点缀和掩饰,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结成就了其人生经历和文艺创作的独特价值。然而,由于浓重的弃儿心态和颠簸飘荡的生活也使得他有强烈的厌世倾向,长期抑郁的精神状态和自杀般的痛饮暴食是他英年早逝的根本原因。

二、现代画家诗人中的宗教研究者

除了宗教信仰者之外,还有很多画家诗人对于宗教研究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心中实际上有着强烈的宗教情结。这些画家诗人喜欢通过研究宗教、绘画宗教人物来拓展绘画的表现题材,寻求内心的祥和宁静,其中以叶恭绰和饶宗颐为代表。

(一)画家诗人叶恭绰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叶恭绰辞去了交通总长职务。虽然1926—1928年间,他还担任了财政讨论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但实际上他的主要精力已经转到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保护上。除了整理典籍、筹办图书馆等文化建设外,叶恭绰文化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护佛教典籍和修建佛教场所。叶恭绰热心于佛教事业,青年时期即潜心研究佛学,与谛闲、印光、普照、虚云等法师相交,43岁后坚持常年斋戒直至逝世。不仅如此,他还花费大量精力从事佛学研究,大力保护佛教典籍。1923年在北京发起印行日本的《卮字续藏》和1932年在上海发起影印的宋版《碛砂藏》均是现代佛教典籍的重要贡献,此外还大力提倡保护《大藏经》、敦煌经卷等佛教典籍。在《编

印中华大藏议》中,他提出“深愿吾国贤哲勿逸此重要之机会,而有以贡献其能力。”^{[17]494}在《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中,他有感于敦煌经卷在清末民初损失严重,主张将这批佛教典籍重点加以保护,“庶几会石室宝笈,集凉藏大成,存古代文献之珍,究圣量名言之实。”^{[17]481}

在佛教事务管理上,叶恭绰自1930年起担任全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并推选为秘书主任。1931年,他在青岛捐资10000元与佛学家周叔迦一起筹建寺庙,这座寺庙后来成为湛山寺的前身。1937年他在上海拟建法宝馆,收藏各类佛门法器,为此还专门赋诗《廿六年一月法宝馆落成偶占》,“华严七宝绝纤埃,集古珍藏异境开。财法施余无一事,不妨平地起楼台。”由于战乱的原因,法宝馆虽然没有建成,但叶恭绰有好佛之心却是事实。1948年,倓虚法师找到叶恭绰,希望他能帮助流落到香港避难的僧侣建立僧校收容,叶恭绰慨然应许。他与王学仁、黄杰云等同人努力筹资建立了“华南佛学院”。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叶恭绰即为发起人之一。从以上种种行迹不难看出,叶恭绰虽不是僧侣身份,但爱佛护佛之所为为佛教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任职交通部门期间,叶恭绰主要创作交通题材的诗作。卸任之后,他主要创作佛教内容的诗作。他与许多僧侣方丈保持良好关系,这一点体现在他的诗词中,如《圆通寺绍山上人送玉兰》,“丈室初花也自奇,隔墙欣送玉交枝。南泉拈出浑如梦,谁赴灵山礼本师。”这是感谢圆通寺僧侣所赠玉兰的酬答诗。又如《游玄墓为智谷上人题画》,“人生到处有青山,山我相逢一破颜。谁识山河本平地,高峰深谷等闲看。”他还曾为一些交往密切的法师写过挽诗。《挽谛贤法师》是为谛贤法师作的挽诗,“四十八年勤说法,万千亿众喜知归。人天眼目方同仰,尘世津梁亦已疲。分拟冥鸿云外影,漫嗤杀马道旁儿。国清山上明明月,愁失荆溪作导师。”诗歌前半部分肯定了谛贤法师为宣扬佛法所作的贡献,“四十八年勤说法,万千亿众喜知归”;后半部分则表达了对谛贤法师逝世的惋惜之情,“国清山上明明月,愁失荆溪作导师”。又如《挽观本法师》,“曹溪花叶未成尘,微笑惊遗露点身。阅世津梁同自惜,余生云水更谁亲。梵音五会空新谱,月影千江几故人。他日药山寻往事,欲参半偈已无因。”从这些挽诗、酬答诗中不难看出,叶恭绰与僧侣之间频繁的互动往来。

不仅叶恭绰作了大量诗词与佛教有关,他还为不少经卷题写序跋。除了前文提及的《编印中华大

藏议》、《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外，他还为《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跋》、《影印宋藏遗珍序》、《敦煌出土经卷二跋》、《妙真法师藏明宫金字观世音普门品跋》、《题方节庵藏唐人写经》等经文题跋。在这些序跋文中常可见他对于佛教经卷仔细阅读和考辨，在《北齐河清年画佛像跋》中他提到：“此像用堆彩绘于粗布上，与西洋油画画法相同。着色处皆凸起，朱色尤为显明。意必其时中亚细亚或印度画法。因不知系何处所发现，毋从据以研究。然必出于吾国之西北方，可毋疑也。”^[18]该考辨内容精细认真，从画法考辨到出土方位探究。在《清郭频迦手书楞严、金刚、心三经跋》中介绍到：“频迦翁写此三经时，为五十九岁，盖老笔也。而精力弥满，到底不懈。翁文采风流，照耀一时，不料勤修白也，精进若此。贤者固不可测也。”^[18]从中不难看出叶恭绰对于所藏经卷的作者、年代及风格熟稔于胸，绝对称得上行家里手。

叶恭绰除了收藏整理佛教典籍外，整理清词也是他退职之后一项重要工作。1929年，他在上海发起编写《全清词钞》，调查和整理清代词的写作状况。编撰中结识青年才俊饶宗颐，让他也参与编撰。饶宗颐与其他同仁的协助使得《全清词钞》的编撰工作进展顺利，二人也结下深厚的友谊。1941年饶宗颐完成他的工作准备回乡之时，叶恭绰还曾赠与他《眼儿媚·送饶伯子归里饶海阳人》，“笛声吹断念家山，去住两都难。举头天外，愁烟惨雾，那是长安。仙都路阻同心远，谁与解连环。乡关何处，巢林瘁鸟，忍说知还。”可见叶恭绰对饶宗颐的器重。饶宗颐参加《全清词钞》的经历不仅扩大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他对词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在叶恭绰处见识了藏品丰富的佛学经典，也为他以后从事敦煌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饶宗颐后来主持编修《潮州志》时还专门请叶恭绰题写序言以报答感恩之情^[19]。由于叶恭绰的提点和启发，饶宗颐对于佛学特别是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饶宗颐曾谈到，“我和叶恭绰先生很接近，他极力倡导敦煌研究，他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20]

（二）饶宗颐的佛学研究

饶宗颐从小与佛结缘，一直保持对于佛学研究孜孜不倦的兴趣，他回顾一生时曾感慨：“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无不日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21]饶宗颐与佛学结缘，终身的研究与佛教有关，这其实与他幼时的经历有关。饶家

世代为潮州望族，至饶宗颐祖父辈时，饶家已是潮州首富。饶宗颐的父亲喜欢藏书，陆续购买了十万余卷的书，将藏书楼命名为“天啸楼”。小时候饶宗颐就在这些藏书中玩耍，幼年即对中国图书的分类有所了解。饶宗颐的伯父饶次云专攻绘画，除了爱好山水画外对经史和佛经也颇有研究，伯父的收藏为幼年的饶宗颐播下了佛学的种子。饶宗颐的启蒙教育主要是以家学为主，包括诗词基础、书画基础以及目录学训练，为他以后独立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16岁时参加父辈的诗文集会，他作的第一诗《优昙花诗》便是与佛教有关。

优昙花诗

序曰：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焉定之理，为以释意焉。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殒谢亦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大苍。
大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距为逼，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昙花在佛教中是圣洁之花，从这首咏赞昙花的诗作不难看出佛教思想对于少年饶宗颐的影响。在结识叶恭绰之前，饶宗颐结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当时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和编译所所长，他应其邀请参加了《中山大辞典》中经史典籍词条的编写。编写《中山大辞典》和《全清词钞》的经历使得饶宗颐的学术视野大为扩展，得以管窥国学奥妙，学会作为独立研究者的治学路径。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楚辞地理考》、《说文古文考》、《古史新证补》等著作。1952年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饶宗颐受聘到香港大学担任讲师。在港期间，他认识了潮州老乡方继仁。方继仁长期经商资财丰厚，同时对国学也兴趣浓厚。他资助饶宗颐从英国购买了一套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这些资料在当时非常宝贵，在亚洲除了日本之外只有饶宗颐手上有这套资料。敦煌微缩胶卷为饶宗颐继续他的佛学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完成十多篇敦煌学方面的论文，如《敦煌本文选笺注》（1957年）、《敦煌琵琶谱读记》（1960年）、《敦煌

写本登楼赋重研》(1962年)、《敦煌舞谱校释》(1964年)等。敦煌学系列论文的发表标志着饶宗颐敦煌学研究的重大进展。1963年,饶宗颐应印度班达伽研究所之聘做研究员。旅印期间,他又接触到《梨俱吠陀》等印度诗歌经典,扩展了他对于印度佛教文学的认知。除了读书研究之外,他还漫游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将游历时所写作的诗歌结集为《佛国集》。从《佛国集》的诗词中可以了解饶宗颐当年的治学情形。在《Bhandarkar 研究所客馆夜读梵经》提到他攻读梵经的辛苦,“梵经满纸多祗怪,梵音棘口譬癬疥。摊书十目始一行,古贤糟魄神良快。积雨连朝卷云起,书声时杂风声里。思到多歧屡亡羊,树在道旁知苦李。须眉照水月共明,扰人最是秋虫声,将迎难证心如镜,输与晖日识阴晴。”诗句“摊书十目始一行,古贤糟魄神良快”风趣地形容了致力梵学研究的艰难和苦闷。求学之艰难如同修行,虽然搅扰之处尤多,但诗人还是努力迎难而上,寻求内心的平静。在印度,他游览了不少佛教遗迹,不少纪游诗记录其行迹,如《阿旃陀(Ajanta)石窟歌》、《建志补罗(Kanchipuram)怀玄奘法师》、《那伽跋陀那(Nagapattinam)记汉塔废址》、《南印度七塔(Mahabalipuram)歌》等。探访这些佛教古迹时,饶宗颐的心灵受到了净化和升华,“自笑此身同转萍,攀危安若履户庭,洗虑且去心中螟,于兹悟得无穷龄,伤怀莫学子才耶。”(《阿旃陀(Ajanta)石窟歌》)诗人在探访阿旃陀石窟的过程中变得澄怀观道、洞穿世事,心灵变得纯净自然;“我有精诚动真宰,凌霜欲为鸣九钟。日薄麟争今何世,圣者恃道安由丰。东门鞭石作梁渡,南极铸柱贡山铜。冥冥神理谁能究,天昏寒浪来悲风。”(《南印度七塔(Mahabalipuram)歌》)在探访钦奈南面的“七寺城”时,看到满眼的寺庙,诗人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借诗歌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于佛学的崇敬和谦卑。饶宗颐旅行于东南亚的诸多佛国一方面是为了饱览各地风光,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对于东南亚佛学的感性认知。

1966年,饶宗颐从印度回国后不久又赴法国。他与法国汉学界权威戴密微教授交好,戴密微教授邀请饶宗颐赴法国研究巴黎所藏敦煌写经、敦煌画稿及校勘敦煌曲词。在研究敦煌壁画时,饶宗颐发现在这些经卷的末尾有不少唐人所绘画稿,于是他决定潜心研究敦煌壁画和画稿。他将研究成果结集成《敦煌白画》一书,这一研究经历使得他对于敦煌壁画有了更多的体悟,他将这种体悟融入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画派。

从饶宗颐的学术经历来看,虽然涉及的学术内容庞大芜杂,涉及到敦煌学、甲骨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等多个方向,但佛教研究特别是敦煌研究始终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主要内容。他不仅在学术上对佛教孜孜以求,而且始终将佛教研究与修身养性相结合。他努力实践佛教中清心寡欲的理念,坚持每天打坐。2002年他还为香港大屿山手书《心经》全文,提醒民众注重内心修为,寻求人与世界的和谐之道。

三、结 语

中国现代画家诗人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宗教认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宗教传统。中国的宗教教义与传统哲学思想之间常常在内容上有重合交错之处,因此,许多画家诗人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时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绘画与宗教之间也存在着多重的互动关系。现代画家诗人在创作大量宗教题材的诗画作品的同时,对于宗教典籍的研究也使得其在心性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宁静致远的人生追求、慈悲悯人的济世情怀等人生观的建立都与画家常年的宗教浸润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画家诗词中体现的宗教认同感是现代画家诗人情感认同的维度之一,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对现代画家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认同的认知,对于深化现代画家的诗词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敏. 中国古代佛教绘画[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30.
- [2] 许宜兰. 艺术与信仰:道经图像与中国传统绘画关系研究[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4.
- [3] 夏中义.《缶庐别存》与梅石写意的人文性:兼论吴昌硕的“道艺”气象暨价值自圆[J]. 文艺研究, 2013(12):115-126.
- [4] 夏中义. 故国之思与泼墨云山境界:论张大千题画诗的心灵底蕴与其绘画的互文关系[J]. 文艺研究, 2016(1):115-130.
- [5] 卢忻. 信手拈来总可惊:潘天寿诗歌概说[J]. 文艺研究, 1997(1):138-148.
- [6] 胡迎建. 民国旧体诗史稿[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 [7] 刘梦芙. 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3.
- [8] 李叔同. 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 社,2003:197.
- [9] 丰华瞻,殷琦. 丰子恺研究资料[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 [10] 吴可为. 古道长亭:李叔同传[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95.
- [11] 李莉娟. 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55.
- [12] 丰子恺. 子恺品佛[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153.
- [13] 丰子恺.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卷5)[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655.
- [14] 陈平原. 漫说文化丛书:佛佛道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5.
- [15]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上海:三联书店,2000:94.
- [16] 鲁迅. 鲁迅全集:卷一[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7.
- [17] 叶恭绰. 遐庵汇稿[M]. 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8] 叶恭绰. 遐庵小品[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42.
- [19] 陈贤武. 略论叶恭绰对饶宗颐治学道路的影响[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28(2):16.
- [20] 严海建. 饶宗颐传[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0.
- [21] 饶宗颐. 澄心论萃[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410.

Discussion about religious identity of Chinese modern painter poets

YE Lan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art tradition between Chinese classical painting and religion, many modern traditional painters also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religious identity, which affects the poetic creation of the painters.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and identification differences of modern painter poets, the modern painter poets with religious identity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ne type is religious believers, such as Li Shutong, Feng Zikai and Su Manshu; the second type is religion researchers, such as Ye Gongchuo and Rao Zongyi. On the one hand, the religious identity of modern painter poets indicates the long religious tradition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painter poets. On the other hand, it prove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religion, painting and poetry.

Key words: modern; painter poet; religion; identity

(责任编辑:王艳娟)

武士阶层在近代日本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及启示

盛 贇¹,周 飞²

(1.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浙江 上虞 312369;2. 金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 滁州 239001)

摘 要: 19 世纪末日本社会转型成败的原因在于是否成功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社会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是社会动员的必要条件。武士道价值体系对天皇的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能够增强变化社会中所缺乏的秩序和效率;武士阶层沟通天皇和普通民众,实现多方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趋同,冲破了官僚集团利益固化的藩篱,克服了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提供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本和精神支持,成为体制外动员的媒介。因而武士阶层是日本社会成功动员的关键变量。而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动员机制。以史为鉴,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动员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国家尤为重要。

关键词: 社会转型;社会动员;武士阶层;官僚集团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88-07

19 世纪初期日本天保政权内忧外患,气候异常致使农业严重歉收饥荒严重。危机通过天灾的形式加剧了“人祸”,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与此同时,1853 年美国将军佩里到访日本要求通商,打开了日本的门户,日本自此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大潮,传统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现代化危机,外在的示范效应和内在的合法性危机共振明显。中下层武士发起的“尊王攘夷”的“王政复古”运动,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并于 1868 年建立了明治政府,随即开启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力求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以西方为标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短时间内分别超越清朝和沙皇俄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基于中日两国现代化起步时间相近(日本实际上近代化起步要晚于中国,中国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现代化的步伐)和文化相似等因素,很多学者在分析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时,将原因归结为日本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而中国只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两国现代化的结果,但无法阐明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本文试图从社会动员的

角度,分析近代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武士的作用,以及其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清末社会的差异和启示。

一、社会转型的合法性困境和体制性障碍

在规范层面上,关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家性质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的两派为“讲座派”和“劳农派”。前者强调明治政府是封建绝对君主制国家,“劳农派”则坚持明治政府是资本主义君主制国家的政治属性^[1]。无论是封建专制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君主制,都无法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因为制度从建立到释放效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过程。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有西方政治制度之形而缺乏西方政治制度之实,天皇不但至高无上,而且法理上垄断了权力源头;议会权力相当弱小处于虚位,这一权力格局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明治维新的 20 年间,资本主义特征不明显,大部分企业为官办性质,很多非政府企业如三井商社等也在政府牢牢控制之下。政府对国防工业的投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官

办”非军事工业亏损严重,非政府“工厂”发展缓慢^①。日本经济并未表现出因改革而带来的增长,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依然相当严重,“流通的纸币币值对铸币已经打了70%的折扣”^[2]。

二战后,本尼迪克特^[3]开启了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并与日本现代化研究相结合,试图从文化角度捕捉现代化的动因和机制,也推动了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自省。丸山真男^[4]为集大成者,认为天皇制不仅是现代化的“机轴”和国体,也是意识形态和“制度精神”的保证,肯定了天皇制及其传统在社会转型中的高度价值。加拿大学者诺曼^{[5]102-103}基于文化视角对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研究,从社会结构上把握日本现代化的政治动力,认为“军事”官员和政治“官僚”虽属于专制的成份,但确是社会“进步的先锋”和“现代化的前卫”。

此后,巴林顿·摩尔和斯考切波都有关于日本现代化的研究,但都是基于农民和地主阶级的视角。斯考切波^{[6]114}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缺乏一个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巴林顿·摩尔^{[7]475}否定了农民阶层的“历史客体论”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进程成功与否与农民起义密切相关,平息农民起义的关键原因在于日本土地精英维持了传统农业社会不至于被摧毁。

无论是从文化视角,还是从政治结构上,都强调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秩序和效率供给。传统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因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本文认为,分析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应将其放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而不落于现代化本身之窠臼,在对近代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现代化道路进行比较时,便会发现清朝政府并不具备社会转型的需求和社会动员的条件,而日本的武士阶层和武士道价值体系则克服了政权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两大政治弊端,成为日本社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因素。

二、武士阶层:日本体制内动员的关键变量

“公卿与武家同心,下及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8]。日本社会转型的成功在于其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明治维新具备了支撑社会动员的合法性认同,并且领导阶层与普通民众基于利益共享、一致的价值观而冲破了官僚利益集团的藩篱。武士阶层便是日本现代化政治优势的源头。武士阶层不仅仅主导着社会变革,“武士道”精神还意味着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认同。

明治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天皇和武士阶层的关系。日本天皇是神道教最高领袖,自古万世一系。天皇的精神象征地位不依附于权力和外在条件,幕府统治时期掌握大权的将军也不敢妄议废黜天皇。天皇本人没有姓氏和户籍,天皇的神性又被武士道所强调的绝对的忠君、服从和崇尚武艺的价值观所放大,并通过倒幕运动和明治政府成立等政治成果所确认。

首先,天皇在武士道价值体系中意味着真正的精神中心,所有层面价值的终极来源都被天皇垄断,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被军国主义分子荒木称为“弘皇道于四海”,这是一种“尊圣意”、“慰圣虑”的武家文化。

其次,武士道对天皇的守护不仅仅驻足在信念层面,更外化为对天皇及明治政府的实际支持。其通过“尊王攘夷”的复古运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设,同时武士阶层的分化为明治维新的继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即使是“王政复古”运动中利益直接受损方的藩主,诸如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等诸侯也都献出自己的封地。

再次,武士道是日本伦理体系的根基,是天皇和民众价值体系的桥梁,而“忠诚”又是武士道价值体系中的个人政治伦理。大量的小说、戏曲、评说等都以武士道为叙事背景和故事主要内容,这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化凝聚了民众的意志,其所持的“忠君爱国”的信念成为了民众的内心原则和行为操守。在很多层面,武士道就像酵母那样由它发源的阶级逐渐渗透到大众,为全体国民建立起一个道德标准。这种武士准则,最初是精英阶级的荣耀,之后成为整个国家的抱负和激励。^[9]最后,武士道给天皇留下了永恒的正当性归属,即便是日本战败的事实也不能动摇民众对天皇的合法性认同,日本人和“日本战俘非常清楚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3]23}。

天皇是日本的象征,这意味着通过武士道精神搭建武士阶层和天皇的政治合法性通道便能迅速稳定住政局并组织起政府,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危而不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社会张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没有武士阶层的推动和拥护,走向

① 1884年开展的非政府“工厂”调查显示:1881家“工厂”中有1237家位于农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工厂”雇工不到5人,只有176家“工厂”雇工超过50人;只有72家“工厂”使用蒸汽动力,47%的“工厂”使用水力,其余的完全使用人工。见:詹森.剑桥日本史:19世纪[M].王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564。

历史舞台的天皇一定带有某种政治残疾,而非“天皇制”下的天皇。

在精神层面上,武士阶层以及身份转型后的各行业精英,自觉弥合自身与代表国家利益的天皇价值差异,并最终在物质层面上实现利益共享。这套政治逻辑首先是经倒幕运动展开的。武士阶层虽然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幕府本身的财政恶化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依靠官俸生活的武士们变得逐渐贫困,下层武士情况更加恶化以致成为“浪人”。明治维新前,中下层武士除了薪俸外,收入有限,生活相当困难,因此德川幕府成为了没落的武士阶层与天皇的同一政敌。因而武士阶层除了对天皇的忠诚外,还通过发动政变推倒了幕府统治,将大政奉还天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果对于其双方都是直接受益的。

德川幕府时期,武士身份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而且武士们还被禁止从事商业。从德川政权中期开始,不少对俸禄不满的武士主动斩断了与领主的纽带关系,或者通过与商人阶层的联姻来获得生活的改善。1869年,明治政府通过立法取消了武士的身份,同时政府为此支付了一定的补偿金,武士可以正常地投入到商业、农业等各行业中去,在经济上获得了更高的报偿。所以,明治政府的政策虽然激进,却没有招致大规模的武士反对^①。

官僚制在明治政府建立前后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全国性政权的建立迅速膨胀。官僚集团特殊利益的存在,能够说明德川幕府晚期统治失效的原因^②,却不能够解释为何明治政府中庞大的官僚阶层特别是来自幕府晚期的同一批次官僚并没有阻碍中央政府的全国性动员。关键原因是明治政府的内阁主要成员都有武士背景。明治前后很多领导人多为下级武士出生^③,不仅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是下级武士出生,而且“直到20世纪,作为明治维新领导的武士官僚们一直保持着对国家机构的控制权”。^[10]1876年,官吏总数为23135名,其中前武士共计17935人,占据77.5%。这一比例持续到明治十三年一直保持在73%以上。^[11]基于对天皇合法性的认同,这一官僚阶层本身具有的文化和身份共识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作为一个知识和领导阶层,武士阶层独立并有效控制其他各个阶层而获得了自主性^[10],因而要实现“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社会动员是必不可少的。

三、武士阶层的分化与体制外的动员

前武士阶层中的精英牢牢控制了体制内的权

力,天皇和中央政府整合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体制内向体制外的通道已经打通。明治政府废除了武士制度,武士阶层迅速分化并且渗透到各个行业。作为最主要的知识阶层,他们为日本政治、经济、军队和教育等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起到了中坚作用。1880年日本大约有79%的科学家出生于武士,到1900年具有武士背景的科学家仍然高达54%的比率。^[12]体制外存在两个最重要的阶层——最活跃的商人阶层和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对这两个阶层的动员是基于他们自身的优势和国家需要相结合。富国强兵需要商人阶层的加入,更要求建立一支归属中央的常备军,农民阶层为此提供了最主要的兵源输出。

(一)重商主义

明治宪法取消了阶级差别,赋予了商人平等的权力,释放了商人阶层的整体活力。但商人在面对前武士和政府公务人员还是谨慎有余,因为制度的实施并不能立刻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商人的社会歧视根深蒂固,工商业为此需要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商人阶层对政治官僚表现出强烈的顺从^[13]。明治政府利用了商人阶层的心理短板,吸引他们为政府服务。但明治维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技术落后。特别是明治初期经济形势很严峻,金本位制的黄金储备不够,致使刚刚发行的日元贬值,甚至是在交易市场上不被认同;对外贸易逆差严重,黄金流失严重,这又加重了日元的持续贬值;西方国家直接在日本设立进出口经销商,直接压制了日本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等。毫无疑问,重商主义满足了明治政府对国家的一切想象。

对重商主义的动员不仅仅停留在政策导向上,政府深度介入到商业中。通过建立官办工厂,扶持并控制财阀集团,利用财阀为日本政府服务。表1反映了1928年日本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

① 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虽然有部分武士不满废除其特权的原因,但也有政见之争的因素,并且很快被平息,也没有其他藩的加入,这说明了明治政府的合法性。

② 当时日本并非只有两个政府,甚至连幕府也有两个,一个是身在大阪和京都地区的德川庆喜本人,另一个是江户的以德川氏为中心的更加官僚化的政权。见:詹森、剑桥日本史:19世纪[M].王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331.

③ 下级武士出生的明治前后领导人中包括三条实美、仓岩具视、大久保利通、五代友厚、西乡隆盛、松方正义、高杉晋作、山县有朋、广泽真臣、福冈孝弟、坂本龙马、江藤新平、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木乔迁、胜海舟等。

田)的实力状况。四大财阀作为政府控股企业的代表,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据较高的成分并成为国家重商主义的表征。建立国有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既可以直接服务于“殖产兴业”的企业贷款,又可以凭借正金银行的海外业务优势以货物为抵押贷款给实业商。这一环节中,日本政府要求驻外使馆代为保管并妥善运回贸易所得金银货币,可谓进行了最彻底的资源整合和动员。正金银行虽为民间集资发起的银行,但实为政府控股,“政府资金占正金银行的50%以上的压倒性优势”^[14]。

表1 1928年末四大财阀企业集团占全部企业实缴资本的比率 %

行业	四大财阀	十大财阀
金融业	49.7	53.0
重工业	32.4	49.0
轻工业	10.7	16.8
其他行业	12.9	15.5
合计	24.5	35.2

注:资料来源: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日本財閥の解体資料[M]东京:持株会社,1950:468-469。

之所以认为明治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是重商主义的高度动员,是基于财阀的组成以及财阀经济活动很多时候明显违反了市场盈利原则。首先,德川幕府以来商人与武士阶层一直存在着共生关系,武士接受商人过继过来的孩子以此换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人也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明治维新后,武士身份和特权取消的同时也提高了商人的社会认同,武士转化成商人的障碍更小了。历史上不少中下层武士一直都有从商的经验,而且因为对倒幕运动的贡献和取消武士制度得到了国家的报酬和补偿金,大量的士族企业家相继出现,进入新型实业和金融行业。1878年(明治十一年)日本国立银行共有股东34360人,其中平民股东4730人,拥有股金总额887.9万元;而华士族^①股东29630人,拥有股金总额3518.2万元。华士族股东占总人数的86%,出资占总金额的77%^②。最为关键的是,很多前武士们最后发展成了金融寡头和行业巨头,虽然数量很少,但在日本经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以武士背景而转为新型企业最成功的是土佐在长崎发展业务的岩崎弥太郎。在他领导下的一批武士组织了航运公司,日后成为日本第二大财团的三菱会社。”^[15]除此之外,安田、浅野等企业也是以武士背景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大商号三井在明治维新后也吸纳了很多武士成员。其次,武士阶层分化到商人中(虽然很多时候是为了谋生),给商人植入了许

多政治性观念,在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矛盾时,秉持忠君爱国观念的商人武士能够迅速决定为国家服务。“到了1890年,日本已有440人,其私有财产超过50万日元。这些金融企业界人士,如上所言,多具武士背景,或是武士家人,其精神状态皆与武士相同。他们从事实业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了国家的前途,对自身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皆可抛弃不顾。他们看政府为自身的合作伙伴而非竟敌。他们认为站在自己岗位上达到富国的目的,与在朝之官员同样是对国家的贡献。”^[15]再次,他们卷入到北洋政府贷款(而且很多贷款明知是无法收回成本的)、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以及其他有政治献金嫌疑的捐款中,这种带有极强的政治功能的活动绝不能仅仅从财阀寻求排他性市场特权来解释。还有些财阀则直接和日本军方合作,例如三井、三菱等,日本国内国外战争都有财阀集团的身影。在被日本殖民过的韩国也能发现垄断企业的政治属性,例如韩国现代集团在与朝鲜的政治互动中承担着韩国政府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重商主义由于武士的加入使得社会动员在商人中能够轻易实现,巴林顿·摩尔认为庞大数量的武士能够成功转型为商人的很少^{[7]219-232},他明显低估了这种转换的意义。首先,正由于武士的加入使得商业阶层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也是由于武士作为中坚阶级沟通上下的能力,能得到社会面更为广泛的支持,工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其次,士族进入工商业的重要性还在于维新后旧商人阶级在整体上出现了衰落退缩的趋势,若无士族充实这一队伍,给工商界注入新的活力,起码在维新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将缺乏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企业家集团^[16]。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经济主要掌握在至关重要的几个财阀手中,他们有些与武士有直接联系,有些财阀本人即为大名或者前武士出身。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国家对商人阶层实行重商主义的动员,不如说是前武士阶层重新塑造了商人阶层的构成,用一种国家至上主义的原则取代了通行的市场经济原则,即便这种塑造可能是无意识或者是迫于生计的结果。他们将自身的信仰、优势与政府对他们的信任有效结合起来,忠实

① 1871年日本取消旧身份制度,将国民分为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等。华族主要包括原来的高级宫卿和武士中的大名;士族主要包括原来的中下级武士和宫廷中的中下级事务官。

② 数据来源:菅野和太郎,日本公司企业发生史的研究[M]东京:经济评论社,1966:668。

地执行政府富国强兵的政策。

(二)义务兵役和全民教育

明治前,农民阶级一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政治地位低下,农村也是相对自治的。作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农民阶级的整体性动员事关明治维新的成败。对农民动员的意义在于:首先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度,实行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货币地税制度,并且一律按地价的3%征收地税。这些措施使得农民缴纳的地税过度依附于市场粮食价格,无论是丰收还是歉收,农民手中都没有过多剩余的粮食。“自1883年至1890年因滞纳地税而受到公卖土地处分的农业生产者计有三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户。在这个数目中,因贫穷而不能缴纳地税的占77%”。^{[5]144}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并负债累累,他们流向城市成为工人无产者。其次,通过实施义务兵役制,中央政府建立了一支中央常备军一举解决了无兵可用的难题,也彻底瓦解了封建制存在的基础。新式军队在西南战争中体现了优越性,镇压了萨摩藩的暴乱,巩固了中央集权和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对农民的广泛动员实质是剥削农民以完成资本主义的积累,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也是完成国家建设、发展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需要。明治初年,农民起义数量众多,很多文献记载了1868年到1872年间发生的共计343起农民起义事件^①,但是据爱荷华大学的史蒂芬·弗拉斯特教授分析,绝大部分起义都来自于对地价丈量的质疑,而不是逃避税收本身,否则无法解释1870年后农民起义数量迅速减少的事实(与地价核准工作结束时间大致相当)。为什么针对农民的剥削没有威胁到新生政权?“没有发生革命的原因更多的应该归结为日本社会将没有财产的人和拥有财产的人联结在一起的一系列纽带,这些纽带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7]272}武士道伦理价值内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高度认同和对阶级本位的安守。只要合法性得到了确认,任何例外都可以得到解释。同时,明治政府承袭了幕府时期农村的管理机制,通过乡村首长(村长)管理制度和五人小组的“保”来管理农村。

武士阶层的分化与征兵制和义务教育制相结合,将中央政府的政策精神和共同价值观内化于农民心中。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武士作为主要知识阶层,能够将自身知识和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传达给社会,从而起到了社会动员的作用。1882年,日本中学教职员中的80%、初等学校中的40%是士

族^[17]。作为最主要的知识阶层,大量的武士转化为教师,夯实了国家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1899年陆军在职军官8704人,其中士族出生的有5060人^[18],占据58%的比例。武士阶层分化成社会精英,有效地向社会供给人力资源,源源不断的将知识和政治见解输送给社会,且作为享有政治地位的主要知识阶层,他们效忠于天皇,基于自身的伦理操守和天然的制度通道沟通政府和农民,植入多种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政治文化。天皇通过他们的动员社会,在精神和实践上有效保持一致。

四、近代中日两国现代化道路的分野

社会转型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很多关于制度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都可以纳入到社会转型中。之所以选择社会转型作为比较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因为清末中国的现代化尝试并非以社会转型为目标,而是以巩固现有社会为目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时间内终结了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制度,“从王政复古、戊辰战争、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以及随后进行的官制改革,讨幕派仅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19],并以西化为目标,不仅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甚至事无巨细涉及最普通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市民生活层面,例如“令军民等皆改从外国服色”^[20]、“仿西国令国人以面为食”^[21]、“土木建造者须以西国规矩建造”^[22]等。

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是社会自然“生长”的结果,既没有外在示范的压力,也没有内在国家强力的主导。后发国家往往不具备成熟社会的条件,又面临着现代化的示范压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然由国家承担,因而国家主导型往往成为与后发国家社会转型互通的主要模式。但国家主导型并不能完全概括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因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强力的推动,而政府所扮演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能带动社会面的互动继而形成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那么社会转型就无法短时间内完成,或者失去既定方向而以失败告终。许多后发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战略由于无法成功动员社会,反致政治失序、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员具备“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巨大的社会能量,从而迅速摆脱“路径依

① 数据来源:Aoki K.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Peasant Uprisings [M]. Tokyo: Shinseisha, 1967: 36.

赖”和利益集团的束缚实现社会转型。

因此,近代日本的发展逻辑可表述为:在现代化危机面前,明治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来完成社会转型。社会动员是19世纪末期中日两国现代化路径的关键分野;社会动员的成功与否暗含了中日两国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和条件。首先,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是社会动员的前提,否则政府不但无法组织起有效的社会动员,更需投入相当的政治资源来提升其合法性。其次,社会动员意味着利益共享或者价值趋同,被动员的公众能够分享社会转型的成果并内化为官方主导的价值。这一过程分化为正式制度的确立和遵守两大过程,并在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演化出“非正式的约束”。当人们面对转型的社会不是无法适从,而是基于“一系列嵌入其间的制度实存,才使我们不假思索地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时^[23],社会就在价值层面完成了最后的转型。再次,中央集权直接规定了社会动员贯通上下的制度通道。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央集权面对的威胁并非地方分权,更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治系统中的官僚集团。他们的利益交叉繁杂,时而作为利益整体威胁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时而被更高的政治存在拆分利用。但无论如何,官僚集团作为横梗在政治系统中间的一个节点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阻碍着社会动员。

中国传统社会明显不具有社会动员的能力,受制于政权合法性的缺失和官僚阶层利益固化的藩篱,无法演化出社会动员的机制。首先,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频繁,宣扬“天人合一”的政制模式,一直处于合法性的自证过程,无法回应被它推翻的、自居为天命所授的前任王朝的事实,也无法逃脱自身被推翻的命运。因而这种逻辑悖论阻碍了“天人合一”普遍价值模式的转化,合法性一直都是中国专制统治者无法自圆其说的政治盲点。其次,合法性居首要地位,政府无暇顾及民生方面的政治议题,即便进入了统治阶层的议事范围也以服务合法性建构为目标。公众和最高统治者无法实现利益的共享和价值的趋同,社会动员无从谈起。再次,官僚阶层为了自身利益阻隔统治阶层和公众,政治系统在这一节点是短路的,很多民生政策被无形消弭于这一政治链路中,从最高统治者直达底层民众的政治动员的链路断裂。“帝相之争”在古代中国统治阶层中一直存在,特别是明代以来官僚阶层和最高统治者的矛盾塑造出了更加鲜明的二者交叉缠绕的政治结构。王权不仅缺乏相应的意志和能力,更重要的是文官阶层的

支持是统治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鲜有统治者不受这一阶层的利益牵绊而强行推动改革,整体的社会动员更不可能。

清末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正是由于“君主政权中的官员和政治上强大的地主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相互缠绕关系”的原因^{[6]116}。清末统治者不仅无法摆脱传统“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困境,无法破除官僚阶层的利益掣肘,甚至为了巩固统治,慈禧太后刻意培养“清流派”以牵制“洋务派”,统治阶层内部分化严重。除此之外,清朝政府还面临着以下三项合法性挑战:第一,满清异族统治的身份危机。身份危机一直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内心芥蒂,成为了统治者阶段性紧张的根源,并由此掀起了几场大小不一的“文字狱”。政治紧张感甚至会促使统治者们抓住一个个莫须有的事件进行运动式治理,藉此维持其权威,也舒展了这种阶段性紧张。孔飞力教授的《叫魂》中描述的便是乾隆皇帝对不入流的民间巫术采取的“过分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执法。第二,异族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示范性压力。统治阶层并不理解西方国家通商要求,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便是外敌入侵和丧权辱国。在这种政治逻辑中,西方列强的侵入和船坚利炮等西方器物文明显然是对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巨大挑战。第三,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地方实力派日益坐大。在这种政治架构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平衡,中央到地方的政令难以保持畅通。清朝政府无法回应社会动员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现代化的失败和自身政权的灭亡是必然的。

五、结 语

本文将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分析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分析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逻辑,即明治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来完成社会转型,而武士阶层是成功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变量。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一定强度的社会动员。对近代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现代化道路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传统政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缺乏社会转型的需求和动员机制,不具备社会动员的能力;而日本的武士阶层和武士道价值体系则克服了政权的合法性困境和官僚阶层的体制性障碍两大政治弊端,成为日本社会动员成功的关键因素。

社会转型和社会动员对于当下的中国改革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新常态下,中国社会转型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如何有效动员社会各阶层,凝聚最广

大的社会共识,冲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让顶层设计对接社会落地生根。中国需以史为鉴,借鉴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社会动员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值得后续研究者进行理论探讨和深入分析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刘天纯. 日本现代化研究的由来与发展[J]. 日本学刊, 1993(2):97-117.
- [2] 马里乌斯·B. 詹森. 剑桥日本史(第五卷)[M]. 王翔, 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560.
- [3] 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田伟华, 译.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
- [4] 丸山真男. 日本的思想[M]. 宋益民, 吴晓林, 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20-27.
- [5] 诺曼·赫伯特. 日本维新史[M]. 姚曾虞,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102-103.
- [6] 西达·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M].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 2013.
- [7] 巴林顿·摩尔.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 王茁, 顾洁,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8] 明治天皇. 五条誓文[M]. 东京:明治政府, 1868.
- [9]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M]. 张俊彦,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100.
- [10] Trimberger E K. State power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Japanes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J]. Critical Sociology, 1977, 7(2):85-97.
- [11] 福地重孝. 土族和土族意识[M]. 东京:春秋社, 1956:333.
- [12] Bartholomew J R. The “feudalistic” legacy of Japanese science[J]. Science Communication, 1985, 6(4):350-376.
- [13] Beasley W G, Scalapino R A. 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J]. Pacific Affairs, 1953, 26(4):369.
- [14] 郭予庆. 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37.
- [15] 朱永德. 财阀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C]//. 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93:9.
- [16] 李文. 武士阶级与日本现代化[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307.
- [17] 石户谷哲夫. 日本教员史研究[M]. 东京:讲谈社, 1978:47.
- [18] 日本陆军省. 陆军省统计年报[M]. 东京:陆军省, 1969:52.
- [19] 伊文成, 马家骏. 明治维新史[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7:379.
- [20] 佚名. 东洋欲改服色[N]. 申报, 1872-05-16(3).
- [21] 佚名. 东洋禁食米饭[N]. 申报, 1873-04-09(4).
- [22] 佚名. 日本近事[N]. 申报, 1872-08-08(6).
- [23] 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 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08:30.

The role and inspiration of samurai class i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modern Japan

SHENG Yun¹, ZHOU Fei²

(1. Keyi College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hangyu 312369, China;
2. Jinpeng Holding Group Co., Ltd., Chuzhou 239001, China)

Abstract: The efficient social mobilization was the reason for the success of Japa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Regime legitimacy identity, social interest sharing and value assimilation were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approval of samurai value system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would enhance the order and efficiency which lack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The samurai class coordinated the public and the Mikado, and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interests and value assimil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 They broke through the barrier of fixation of bureaucratic group interest and overcome systematic obstacles of bureaucratic class.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amurai class provided in exhaustible human capit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for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became the media for mobilization. So the samurai class was the key variable factor for the successful social mobilization of Japanese society. However,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had the plight of congenital legitimacy and the systematic obstacles of bureaucratic class, and lacked the nee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So the history is taken as a mirror, social mobilization as technical government, is critical for countries which transforming into a modern society from a traditional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mobilization; samurai class; bureaucratic group

(责任编辑: 陈丽琼)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

朱光琪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禁令为一种专利侵权救济。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所有者占有垄断地位,寻求禁令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可能引发反垄断问题。因此,明确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关系,即通常应根据专利法标准判断是否赋予禁令,但当寻求禁令违反反垄断法时,应禁止禁令。此外,阐明禁令在反垄断法下的合法标准,即在符合一系列客观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寻求禁令且不违反反垄断法。

关键词: 禁令;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

中图分类号: D99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395-08

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SEP)是对实施标准的兼容性必要的专利。禁令是SEP持有者行使专利权的法定权利之一,但是因SEP持有者已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承诺,且SEP持有者在市场上可能具有垄断地位,导致损害自由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后果,引发了较大争议。

一、禁令救济之争议与问题

(一)FRAND承诺下禁令救济之争议

SEP持有者对标准制定组织(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作出的FRAND承诺是否排除禁令?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支持在FRAND承诺下禁令救济的主要理由如下:a)对FRAND承诺排除禁令的解释,可能减少双方的协商机会,无法满足专利持有者获得充分补偿的期待,减少创新激励。b)作出FRAND承诺不意味着放弃寻求禁令。^[1]大多数SSO知识产权规则未排除SEP持有者对侵权者行使禁令的权利。放弃行使禁令的权利须明确表述,或者至少基于现有情形不能作出SEP所有者同意弃权之外的不同解释,方可推定为弃权。c)增加

SEP实施者反向劫持(Anti hold-up)的可能性,弱化实施者参与善意协商的意愿。如果不允许使用禁令,可能造成SEP实施者未经许可先利用专利。d)禁令威胁下的许可费可能比缺乏禁令威胁的许可费高,但前者不一定违反FRAND承诺。即使在禁令威胁下,也应逐案评估许可费是否符合FRAND承诺。

反对在FRAND承诺下禁令救济的主要理由如下:a)许可费难以反映技术本身的经济价值。永久禁令的威胁大大加强了专利持有者的协商能力,导致许可费超过专利价值。b)寻求禁令会损害被许可方对实施标准进行投资的动力。c)寻求禁令可能致使许可费过高,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合理高价,阻碍重要的消费者产品的销售。

(二)中国禁令救济之反思

SEP的禁令救济与一般的专利禁令救济存在不同之处,因SEP可能导致其持有者的垄断地位,与在一般专利侵权情形下授予禁令救济相比,在垄断情形下授予禁令救济将对产业发展和竞争秩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仅用一般专利禁令的判断标准作出相关判定将不足以解决SEP的禁令救济问题。因SEP的特殊性,SEP的禁令救济须考虑其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基于该关系的考量才能制定合

理的禁令规则。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对禁令救济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且禁令救济的安全港规则(即在何种情况寻求禁令符合法律规定)不明确。现有相关判决可对禁令规则提供一定参考,但较为笼统。因此,需重新审视和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法律规定之反思

(1) 禁令与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法律对“禁令”的用语为“停止侵权”。禁令的形式包括以下:

第一、司法禁令。a) 诉前禁令。《专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诉前停止侵权,要点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申请人提供担保;法院通常在48小时内进行裁定,裁定立即执行;对裁定可申请复议,但不影响执行;如申请错误,申请人应赔偿相应损失。b) 诉中禁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要点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专利权和利害关系人作出请求;专利权人提供了担保。c) 诉后禁令。诉后禁令是法院认定专利侵权后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诉后禁令相当于永久禁令^[2]。

对于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专利禁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法院禁止颁布禁令的一般性条件包括:a) 专利权人在协商中故意违反FRAND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许可合同;b) 被诉侵权人无明显过错。此外,如果双方协商不一致,可请求法院确定许可条件,即如果双方按照法院确定的许可条件实施,法院通常不会颁布禁令。较之于一般的司法禁令,该条款对推荐性标准的司法禁令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第二、行政禁令。《专利法》第六十条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发现侵权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但是不涉及作出决定的具体标准。

《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禁止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2015年正式实施的《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经营者违反FRAND原则,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禁止性行为。

(2) 不足

上述法律规定的不足如下: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对推荐性标准的禁令规定不明确:a) 什么是“不故意违反FRAND承诺”? b) 什么是“不存在明显过错”? c) 规定的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能否全面适用现实中涉及禁令的情形? d) 未对标准实施者施加更为具体的规则是否不利于SEP专利权人?^[3]

第二、在作出FRAND承诺的情形下,SEP持有者寻求禁令的反垄断标准较为模糊。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规定》不明确:a) 涉及FRAND承诺的禁令反垄断规定的特殊性是什么? b) 禁令在何种情况下可用反垄断法规制规定? c) 行政禁令的相关规定未说明禁令适用的具体条件,且未涉及FRAND承诺下的禁令标准,参考性不强。

2. 典型案例之反思

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与索尼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涉及WAPI的SEP,终审判决维持了初审判决,因此初审判决具有参考价值。在该案中,原告承诺以合理无歧视的期限和条件进行专利许可,双方对许可条件协商未果,判决是否停止侵权需考虑双方在协商过程中的过错:在双方均无过错,或者专利权人有过错,实施人无过错的情况下,不支持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在专利权人无过错,实施人有过错的情况下,支持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在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则应基于专利权和实施人的过错大小平衡双方的利益,决定是否支持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该案在推广实施SEP和保护SEP中寻求平衡,停止侵权既不能造成许可方滥用SEP,也不能造成被许可方的“反向劫持”。^[4]

在该案中,值得反思的是:如何认定双方的过错?对双方在协商过程的行为是否应有一定限制性要求以表明其无过错?可否进一步明确双方在协商过程中许可方或被许可方的提议或者第三方认定许可条件对双方过错判定的影响?仍有待深入解答。

针对上述争议与不足,下文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将对上述不足提出完善方案。

二、禁令之反垄断法适用

禁令救济在美国和欧盟的法律下获得保障。针对SEP的禁令原属于专利法的范畴,但通过寻求禁令救济,违反FRAND承诺的SEP持有者可能存在违反竞争法或反垄断法的风险。

(一)美国

1. 禁令

美国专利法第283条规定了有管辖权的法院可授予禁令,根据衡平原则根据其认为合理的条件阻止专利权侵权。在禁令造成劫持的范围内,eBay案允许法院在未进行相关市场界定、市场力量或反竞争效果的调查时否定禁令。为了获得禁令,SEP持有者应证明: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金钱损害赔偿不足;考虑SEP持有者和被诉侵权者的困难平衡;不损害公共利益。^[6]SEP持有者寻求禁令适用eBay案确立的标准分析如下:a)法律救济充分,且缺少不可弥补的损害将阻止适用禁令。遵守FRAND承诺的SEP持有者很难证明存在不可弥补的损害。FRAND承诺通常意味着合理的许可费或相应的损害赔偿足以弥补SEP持有者的损害。b)考虑到SEP实施者需利用SEP将其产品市场化,且禁令将造成专利劫持的广泛风险,eBay案中的困难平衡和公共利益因素也会阻止法院颁布禁令。^[6]

在苹果诉摩托罗拉案中,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拒绝本身违法原则,适用eBay案的判决,基于案件事实,判决不授予摩托罗拉禁令。判决要点为:a)当考虑苹果是否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时,法院认为专利权人须证明其申明的专利特征是消费者对销售产品产生需求的原因,以证明不可弥补的损害,需认定产品的市场份额或销售份额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b)法院认为摩托罗拉愿意实施者支付FRAND许可费进行许可的承诺等于承认许可费的救济充足。c)除非苹果拒绝按照FRAND条款接受许可,否则苹果不能被禁用专利。d)法院认为禁令导致摩托罗拉享有因劫持苹果获得的更高价值。法院认定SEP持有者不能通过控制潜在被许可方使用专利而间接夸大SEP的价值,且法院强调了专利劫持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7]

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第337条禁止进口侵犯美国合法知识产权的外国产品的不正当竞争。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ITC)认定进口会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内产品,可发布排除令。基于消费者利益及其他公共利益,ITC可拒绝授予排除令。^[8]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ttee,FTC)认为在所述情形下不可寻求禁令:SEP持有者作了按FRAND条款自愿许可SEP的承诺;被诉

侵权者自愿按FRAND承诺订立合同。^[9]FTC进行了关于禁令的四步测试:第一、初次协商阶段(应不少于6个月);第二、许可方的首个协议要约(在初次协商的6个月后,或者6个月内根据潜在被许可方的要求);第三、被许可方的承诺或反要约(在60天内接受要约的协议,或者认为要约不符合FRAND承诺,应如何修改以符合FRAND承诺);第四、司法或仲裁程序(美国地区法院或仲裁庭将决定许可协议中双方合作的具体的FRAND条款)。在第一、二、三步中,许可方不能获取对潜在被许可方的禁令。此后,许可方有权获取禁令,但需询问潜在被许可方是否同意通过仲裁认定FRAND条款。如果被许可方接受了由仲裁认定许可协议的FRAND条款,许可方在仲裁中不能寻求禁令。^[10]

2. 反垄断规制

当违背FRAND承诺的SEP持有者寻求禁令,可能承担《谢尔曼法》第2条项下的法律责任。通过反垄断法主张权利的原告需证明被告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力量,且故意非法寻求、获取或维持该市场力量。反垄断法适用于禁令的分析为:a)基于SEP的特性和转换技术的成本,SEP持有者可能获得垄断力量;b)SEP持有者利用禁令威胁,获取专利劫持导致的高额许可费,但是美国反垄断法并未规制价格;c)拒绝以FRAND条款许可SEP。SEP持有者封锁了竞争对手和下游实施者对所需竞争资源的获取路径。该拒绝构成适用必要设施原则的基础。必要设施原则以SEP持有者在兼容产品标准技术市场的排他性权利为基础。当专利标准的外围设计或开发新标准过于昂贵且非理性,必要设施原则是适当的救济。

FTC可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规定的不公平竞争手段,或者欺诈行为或实践规制反垄断行为。在Robert Bosch GmbH案中,FTC也发布了同意令(Consent decree),限制SEP持有者寻求禁令。FTC认为禁令威胁将损害美国竞争和消费者创新,因为许可费将反映投资公司开发和实施标准的经济价值,而非技术本身的经济价值,损害开发符合标准的产品的动力,可能造成消费者以更高价格支付过高许可费。禁令威胁等同于FTC第5条项下的不公平竞争手段。FTC宣布SEP持有者对侵权寻求禁令救济,即使SEP持有者提供遵守FRAND承诺的保证书(Letter of assurance,LOA),也构成FTC第5条项下的不公平竞争手段。^[11]

(二) 欧盟

欧盟认为反垄断实施政策是制止 SEP 滥用的有效工具。^[12] 根据《欧盟运行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第 102 条, 专利权人不应通过武断拒绝许可或滥用许可条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为了证明违反 TFEU 第 102 条, 欧盟委员会需证明被调查的实体: a) 拥有垄断地位; b) 参与滥用行为。^[13] SEP 许可市场构成单独的相关市场, 而 SEP 持有者垄断了相关市场。欧盟委员会认为被许可方自愿接受许可, 承诺按 FRAND 条款许可的 SEP 持有者寻求禁令, 构成了滥用垄断地位。当 SEP 持有者在法院寻求禁令, 滥用其协商权以收取过高许可费, 不合理的价格违反第 102 条 (a) 款。综上, 在欧盟, 是否授予禁令与判定是否违反 TFEU 第 102 条紧密相关。欧盟委员会、欧盟法院对在何种情形下寻求禁令不违反 TFEU 第 102 条, 即在何种情况下可授予禁令均作了说明。

1.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的相关实践

(1) 欧盟委员会

在三星诉苹果案中, 欧盟委员会对三星滥用垄断地位进行了调查, 认定三星寻求对苹果使用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UMTS) 的 SEP 禁令与 TFEU 第 102 条不符。首先, 欧盟委员会认定三星在相关市场的垄断地位。其次, 欧盟委员会根据 UMTS 的标准制定程序以及三星对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 institute, ETSI) 作出的 FRAND 承诺认定三星的行为。欧盟委员会认为三星的行为从相关市场排除了苹果, 且相比于缺乏禁令威胁时的许可条件, 苹果接受的许可条件更为不利, 因此三星的行为存在反竞争效果。既然苹果愿意且能接受 FRAND 许可, 三星的滥用行为就缺乏正当化基础。欧盟委员会接受了三星 5 年内不在欧洲经济区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 中寻求禁令的承诺, 除非: a) 潜在被许可方对特定的 SEP 寻求禁令; b) 三星已同意受限于 SSO 互惠原则的双方的 SEP 的许可框架。^[14]

在摩托罗拉诉苹果案中, 欧盟委员会认为摩托罗拉在德国对苹果实施 SEP 的产品寻求和实施禁令, 违反了 FRAND 承诺, 滥用了其垄断地位, 考虑到标准化程序、FRAND 承诺以及苹果自愿订立 FRAND 许可, 摩托罗拉缺乏正当的合法性理由。苹果在双方对许可费存在争议时, 允许司法审查设

定许可费, 避免了反向劫持的风险。^[15]

欧盟委员会认为摩托罗拉案的判决为标准实施者提供了安全港, 即同意法院或双方一致认可的仲裁方对 FRAND 条款进行裁决且受制于该裁决。判决未对在安全港之外确认自愿被许可方提供指导, 因此应逐案认定自愿性。

(2) 欧盟法院

2015 年 7 月, 欧盟法院对华为诉中兴案作了初步判决。法院在维持自由竞争与保证 SEP 持有者知识产权及对其权利的有效司法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对于禁令的判决要点如下:

a) 在寻求禁令之前, SEP 持有者须警告侵权者侵权, 明确 SEP 以及 SEP 的侵权情形。该警告的合理性在于标准包含大量的 SEP, 被诉侵权者可能未意识到使用的技术是合法的 SEP, 因此在被诉侵权开始后也可进行警告。

b) 在被诉侵权者表达了其获得 FRAND 许可的意愿后, SEP 持有者须按 FRAND 条款发出书面要约, 包括但不限于许可费及其计算。基于 SEP 持有者对 SSO 承担的 FRAND 许可义务, 也因 FRAND 最大化符合了承诺的非歧视部分, 特别是同样的 SEP 如何被 SEP 持有者秘密许可, SEP 持有者应发出该要约。

c) 欧盟法院认为要提起 FRAND 禁令抗辩, SEP 实施者必须根据商业惯例尽职善意地进行反要约, 不使用拖延技巧。无论被诉侵权者是否接受要约, 仅在其特定的 FRAND 的书面反要约被立即送达 SEP 持有者时, 可认定禁令非法。此外, 如果被诉侵权者在许可合同被订立前已使用 SEP, 须在其反要约被拒绝之时起, 为其使用 SEP 建立账户, 并确保账户金额覆盖使用许可费, 根据产业惯例如提供银行担保或存款。如果要约和反要约均失败了, 双方可未经延迟地一致同意第三方认定 FRAND 条款。欧盟法院认为在 FRAND 要约和反要约失败后, 双方一致同意选择第三方认定 FRAND 条款, 可避免侵权。

d) 因专利的标准必要性未经 ETSI 的审查, 被诉侵权者在许可协商的同时, 在许可后保留质疑 SEP 的合法性、必要性的权利, 不能被认为是非自愿的。

e) 欧盟法院认为垄断的 SEP 持有者提起对 SEP 实施者要求设置账户或损害赔偿的权利, 不承担上述责任, 既然该行为不排除在市场上出现或保

留遵守标准的竞争产品。^[16]

2. 德国的相关实践

德国《专利法》第139条允许专利持有者包括SEP持有者申请禁令。法院在授予禁令上通常无自由裁量权,如果存在专利侵权风险,德国法院将授予禁令救济。^[17]在德国,专利侵权诉讼和专利无效程序是不同的法院程序。在专利法院决定专利有效性前,侵权救济可能获得禁令,这为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了优势。因为缺乏合法性认定,被告可用竞争法限制禁令。^[18]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 BGH)第一次在橘皮书标准案件中支持了竞争法抗辩。BGH判决即使缺乏正式的FRAND承诺,许可方对自愿被许可方寻求禁令构成滥用垄断地位。橘皮书标准要求抗辩须证明存在滥用。首先,应证明寻求禁令的专利权人通过将其专利标准化占有垄断地位,对自愿被许可方实施禁令可推定为滥用专利权。此外,抗辩还需符合以下两个条件:a)潜在被许可方须向许可方提供订立许可协议的无条件要约。许可方不得拒绝要约,但不得拒绝要约的标准很高。潜在被许可方可提出自认合理的许可费,但为安全起见,可提议订立由专利权人决定许可费的许可协议。潜在被许可方提出的要约不能基于发现了专利侵权。b)潜在被许可方须遵循其作为被许可方的义务,即支付合同约定的许可费或通过托管保证许可费的支付,且提供支付账单。^[19]橘皮书标准常被视为对专利所有者友好,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橘皮书标准抗辩不多。

3. BGH、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之间禁令抗辩的比较

a)FRAND要约。BGH判决被诉侵权者提出FRAND要约。欧盟委员会认定垄断的SEP持有者提出要约。欧盟法院判决垄断的SEP持有者提出要约。

b)许可费保证。BGH判决自要约后,被诉侵权者应遵守其作为被许可方的义务。欧盟委员会认定在SEP持有者的请求下被诉侵权者对许可费进行保证。欧盟法院判决自FRAND的反要约被拒绝后被诉侵权者对许可费进行保证。

c)第三方认定FRAND。BGH判决被诉侵权者要求法院审查SEP持有者的条件。欧盟委员会认定当协商失败后,在被诉侵权者的请求下由第三方认定FRAND条款。欧盟法院判决在双方未经延

迟的共同要求下由第三方认定FRAND条款。

d)专利的合法性、必要性或侵权的非质疑条款。BGH判决在被诉侵权者的要约中该类条款是强制性的。欧盟委员会认定禁止该类条款。欧盟法院要求在双方的一致同意下可包含该类条款。^[20]

(三)欧盟法院和美国法院之间禁令规则的比较

欧盟法院将禁令与TFEU第102条结合,即可直接基于违反第102条判决不授予禁令。但是美国禁令规则首先适用专利法的规则即eBay案的标准,其次才根据诉讼请求适用反垄断法。

第一、根据欧盟法院的判决,SEP持有者禁令救济须先警告被诉侵权者,指明侵权涉及的SEP及SEP如何被侵权。SEP持有者应提供FRAND条款的书面要约,明确许可费及其计算方式。SEP持有者需证明自身为自愿许可方。根据美国法院的判决,SEP持有者未经事先通知侵权方即可起诉禁令救济。对SEP持有者授予禁令须根据eBay案的标准。

第二、根据欧盟法院的判决,被诉侵权者应根据该领域承认的商业实践和善意,尽职回应SEP持有者的要约。被诉侵权者应立即书面提交符合FRAND条款的反要约,避免拖延战略。被诉侵权者需证明自身是非自愿许可方。根据美国法院的判决,只要被诉侵权者违反善意和公平交易的义务,无需作出具体的FRAND反要约,SEP持有者可寻求禁令。由SEP持有者证明被诉侵权者是非自愿许可方。

第三、必要性和合法性。根据欧盟法院的判决,经双方一致同意被诉侵权者可在将来保留质疑合法性和/或必要性的明示权利。在美国,被诉侵权者享有该权利。

第四、欧盟法院对专利持有者的许可费研究很少。许可费是基于竞争法提出的问题,而非合同法和禁令救济之间的交叉。欧盟法院更关注双方协商中的行为,而非实质的FRAND条款。美国法院已阐述了适用于许可费的FRAND的含义。SEP的许可提议(是否其遵守FRAND原则)将被作为申请禁令的部分进行审查。

第五、根据欧盟法院判决,如果双方协商失败,双方可未经迟延一致同意接受第三方裁决。根据美国法院的判决,如果被许可方要求仲裁裁决而非法院判决,应依据被许可方的意愿。^[21]

三、中国禁令制度之完善

针对中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规则的不足,结合专利法和反垄断的规则,设计合理的禁令判断标准。借鉴欧美的禁令规则,可颁布具体的禁令规则,内容可作参考如下:

(一)确定禁令授予的条件

禁令救济的关键在于许可方证明自身为自愿许可方,被许可方证明自身为自愿被许可方,即均证明善意的存在,具体如下:

第一、判断争议中是否涉及 SEP,SEP 是否落入 FRAND 承诺的范围以及 SSO 的知识产权规则是否禁止禁令。如果专利持有者对涉及的 SEP 作了 FRAND 承诺,且 SSO 的知识产权规则明确禁止禁令(尽管此种情形极少发生),不应授予专利所有者禁令。如果 SSO 的知识产权规则未禁止禁令,再结合其他要素进行分析。

第二、许可方应书面警告被许可方侵权涉及的 SEP 及被许可方的侵权行为。之后,许可方与被许可方之间应有 6 个月的协商期限。在此过程中,许可方应首先提出自认为符合 FRAND 承诺的许可要约。被许可方不能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商。如果被许可方不同意许可方的要约,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自认为符合 FRAND 原则的反要约。且如果被许可方已使用了 SEP,应自反要约被拒之日起,通过在银行账户中存入足够的保证金或支付许可费等方式证明其履行了被许可方的义务。双方在此过程中均不能拖延。许可方在协商过程中不能要求被许可方放弃对专利合法性、有效性和侵权的质疑。

第三、a)如果双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达成一致,但一致同意执行第三方的认定例如仲裁裁决或法院对许可费的判决,不应授予禁令。b)如果双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达成一致,许可方不同意遵守第三方认定,而被许可方愿意接受第三方认定,应由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判断许可方的提议是否符合 FRAND 承诺。如果许可方的提议符合 FRAND 承诺,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可授予禁令。如果许可方的提议不符合 FRAND,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不应授予禁令。c)如果双方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达成一致,被许可方不同意遵守第三方认定,而许可方愿意接受第三方认定,应由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判断被许可方的提议是否符合 FRAND。如果被许可方的提议符合 FRAND,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

部门不应授予禁令。如果被许可方的提议不符合 FRAND,此时法院或专利行政部门可授予禁令。

第四、应注意,即使在上述可授予禁令的情形下,最终是否授予禁令也应结合公共利益和双方的利益平衡综合进行评估和考量,考虑是否一定要采取禁令救济才能弥补许可方的利益损害,以及如果采用禁令救济可能对公共利益和双方造成的影响。禁令判决应适用于现有和将来的禁令,限于本国的专利许可。

第五、SEP 持有者遵循上述禁令规则寻求禁令救济不违反反垄断法,因为上述规则综合考量了禁令救济对公共利益和双方利益产生的影响,且设置了一系列前提条件证明双方当事人的善意,该禁令救济具备了正当性。

(二)明确反垄断法适用的条件

如果被许可方在诉讼过程针对许可方提出了违反反垄断法的反诉。法院的审查应根据反垄断法适用的一般条件,即从认定 SEP 持有者的市场垄断地位、滥用行为以及是否对自由竞争造成损害的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对于市场垄断地位的认定,因 SEP 的特殊性,我国法院倾向于认定单一的 SEP 构成相关市场,因此对 SEP 持有者市场垄断地位的认定较为容易,但此种认定也被认为过于简单,未必所有的 SEP 都符合此种情形。滥用行为应包括拒绝许可和不合理的许可条件包括不合理的许可费等。

第二、对自由竞争的影响即是否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即竞争对手和 SEP 实施者是否因滥用行为导致无法获取 SEP 许可,从而进入市场,消费者是否因为滥用行为导致产品多样性减少和产品价格不合理升高等。

总之,SEP 持有者寻求禁令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应进行个案分析。虽然与一般的专利所有者相比,SEP 持有者确实具有特殊性,具体体现为垄断地位的认定以及滥用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SEP 持有者的行为更易被认定为违反反垄断法,但是违反反垄断法认定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条件并不因此发生变更。

四、结 语

SEP 的禁令救济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在欧盟和美国的判例中较为清晰,但在我国相关规定较为模糊,首先缺乏 SEP 禁令救济的具体适用规则,其次

对反垄断法适用于禁令的规则也较为模糊。借鉴欧盟和美国的经验,禁令相关的规则须平衡 SEP 持有者的创新激励和 SEP 实施者进入相关市场从而促进竞争的目标。SEP 的禁令救济适用反垄断法须慎重,且进行个案审查,应在确定禁令救济排除或限制自由竞争的基础上,方可认定 SEP 持有者寻求禁令违法反垄断法。

参考文献:

- [1] Geradin D, Rato M. Can standard-setting lead to exploitative abuse? a dissonant view of patent hold-up, royalty stacking and the meaning of FRAND [J].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2007, 3(1):101-161.
- [2] 韩伟,徐美玲.标准必要专利禁令行为的反垄断规制探析[J]. *知识产权*, 2016(1):84-89.
- [3] 魏立舟.标准必要专利情形下禁令救济的反垄断法规制:从“橘皮书标准”到“华为诉中兴”[J]. *环球法律评论*, 2015(6):83-101.
- [4]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京知民初字第1194号(下)[EB/OL]. (2017-03-23) [2018-04-25]. <http://www.cnsymm.com/2017/0323/27811.html>.
- [5] US Supreme Court. *eBay Inc. v. MercExchange, L.L.C.*, 547 U. S. 388 (2006) [EB/OL]. (2006-05-15) [2018-04-25]. <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47/388/opinion.html>.
- [6] Cotter T F.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of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and FRAND royalties [J]. *Tex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 2013(22): 311-363.
- [7] US Supreme Court.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No. 12-1548 (Fed. Cir. 2014) [EB/OL]. (2014-04-25) [2018-04-25]. <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appellate-courts/cafc/12-1548/12-1548-2014-04-25.html>.
- [8] Ji H H. District courts versus the USITC: considering exclusionary relief for F/RAND-encumbered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J]. *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Law Review*, 2015(21):169-195.
- [9] Chaudhari 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n low-cost mobile phones in India: a case to strengthen competition regulation? [J] *Socio-legal Review*, 2015, 11(2): 41-66.
- [10]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otorola Mobility LLC, and Google Inc.* [EB/OL]. (2013-07-24) [2018-04-25].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210120/motorola-mobility-llc-google-inc-matter>.
- [1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Robert Bosch GmbH* [EB/OL]. (2013-04-24) [2018-04-25].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210081/bosch-robert-bosch-gmbh>.
- [12] López-Galdos M. Antitrust policy tools & IP rights: U. S., transatlantic & international effect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6(15): 441-475.
- [13] Petrovic U. Patent Hold-up and the Limits of Competition Law: A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EB/OL]. (2014-08-22) [2018-04-25].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2375532>.
- [14]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AT. 39939-Samsung-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EB/OL]. (2014-04-29) [2018-04-2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39/39939_1501_5.pdf.
- [15] European Commission. Case AT. 39985-Motorola-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EB/OL]. (2014-04-29) [2018-04-25].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85/39985_928_16.pdf.
- [16] ECL: EU: C: 2015: 477 [EB/OL]. (2015-07-16) [2018-04-25].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jsessionid=9ea7d2dc30d6e1f745ebbd534e94be0bb64229b0c1b3.e34KaxiLc3qMb40Rch0SaxyMchn0?text=&docid=165911&pageIndex=0&doclang=EN&mode=lst&dir=&occ=first&part=1&cid=231692>.
- [17] Jones Day.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and Injunctive Relief [EB/OL]. (2013-04) [2018-04-25]. <http://www.jonesday.com/files/Publication/77a53dff-786c-442d-8028-906e1297060b/Presentation/PublicationAttachment/270fc132-6369-4063-951b-294ca647c5ed/Standards-Essential%20Patents.pdf>.
- [18] Camesasca P, Langus G, Neven D, et al. Injunction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justice is not blind [J].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and Economics*, 2013, 9 (2): 285-311.
- [19] Petit N. Injunction for FRAND-pledged SEPs: The Quest for an Appropriate Test of Abuse under Article 102 TFEU [EB/OL]. (2013-12-23) [2018-04-25]. <http://ssrn.com/abstract=2371192>.
- [20] Galli D N. The FRAND defense up to Huawei/ZTE [J]. *Bocconi legal papers*, 2016(7): 155-202.
- [21] Wong K W.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EB/OL]. (2015-10-04) [2018-04-2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68602.

Antitrust laws of injunction relief for SEPs

ZHU Guangq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junction is on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reliefs. If an SEP holder holds monopoly position and seeks injunc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consequence of exclusion and competition restriction, it would probably cause antitrust issues.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junction and antitrust law shall be defined. In general, patent laws shall be applied to judge whether to grant injunction. However, if seeking injunction is in violation with antitrust laws, it shall be prohibited. The legal standards for injunction shall be expl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antitrust laws. If injunction satisfies with a serial of objective criteria, seeking injunction shall be allowed without violating antitrust laws.

Key words: injuncti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antitrust

(责任编辑: 陈丽琼)

论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策略调整

——以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为例

陈 雷

(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催生了新工科建设。新工科建设对高校工科类专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期待和新的要求,高校工科类人才培养策略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以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为例,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其人才培养的策略调整既应体现在目标定位、规格、路径选择等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也应体现在管理体制、招生体制、保障机制等配套措施方面。就前者而言,应突出人才的工程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保持人才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促成人才培养主体的多元化,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工程教育模式、实践教学方式、实践平台,等等。就后者而言,除了继续采取鼓励性措施之外,还应形成一种带有“融合”特征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并构建完善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

关键词: 新工科建设;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路径;策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 G4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403-06

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简称“三新”)^①对工程类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倒逼高校工科类专业加强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新工科建设的倡议和行动应运而生。自2017年2月起,教育部力推新工科建设,相继促成“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的问世,并且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教高司函〔2017〕6号)。对于新工科的内涵,有学者作了如是阐述:“以立德树人为引领,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1]。新工科建设的特点在于一个“新”字:工程教育理念之新——要求树

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科专业结构之新——要求构建新兴工科和传统工科相结合的学科专业“新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之新——要求探索并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教学质量之新——要求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教育“新质量”,分类发展体系之新——要求建立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新体系”,等等。^[2]对照新工科建设的要求,当下的工科建设面临着诸多“不适应”,即理念不适应、人才结构不适应、知识体系不适应、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等。^[1]

如何去除“不适应”,推进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的答案是“边研究、边实践、边丰富、边完善”^[2]。

收稿日期:2018-05-29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27

基金项目: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教高厅函〔2018〕17号);浙江理工大学教学改革重点课题(jgy1201508)

作者简介:陈 雷(1963-),男,江苏泗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校教学管理方面的研究。

①新科技革命是指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工程、核技术等出现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产业革命是指以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空天海洋、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标志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型经济,它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

②荣誉学院(Honors School):源自20世纪20年代西方高校的精英教育模式,是高校对优秀本科生实施个性化培养的专门教育机构,它通过定制多样化的课程,以满足优秀人才培养需求。21世纪初,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途径,我国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了荣誉学院。

理工类高校的荣誉学院^②,可以率先进行新工科建设的尝试,因为,现有荣誉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路径等,与新工科建设的要求多有契合之处,例如:二者均强调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等等。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工科建设要想改变上述的诸多“不适应”,首先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理工大学的荣誉学院——启新学院为例,着重探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人才培养的策略调整问题,主要涉及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路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配套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希望借助这种探讨,最终促进人才培养跨上一个新台阶。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积极应对与当然抉择

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学院创建于2007年6月,旨在“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途径”。作为拔尖人才培养的试验田和特区,启新学院秉持“重素质、扬个性、求创新”的育人理念,实施“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基础教育与“自主性、个性化、研究型”的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通过高考直接招生和校内二次选拔等方式,按大学科门类组建了五类本科生实验班:理工实验班、材料化学生物实验班、电子信息实验班、机械电子实验班、经济管理实验班。^[3]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些实验班大多拥有工程“基因”。

在发展过程中,启新学院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了现在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一大批基础宽厚、作风严谨、适应性强,具有一定国际视野、较强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创业型应用人才和创新型研究人才。”新工科建设为启新学院再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传统工科专业发展的基础上重构人才培养方案,是新工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修改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是启新学院所面临的当然的、也是重要的抉择。

人才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根本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三新”背景下的新工科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培养大批新兴工程科技人才”^[2]。当然,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下,不同高校由于优势、类型以及社会作用等方面的差异,人才培养目标应各有侧重,工科优势高校要在工程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中发挥主体作用,其使命应是大力培养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人才;综合

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应侧重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则应聚焦于培养大批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2]浙江理工大学是一所工科优势明显的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启新学院实验班的工科优势更为突出,这从每个实验班多样化的主修专业方向^①便可以看出。从学生的生涯规划来看,近些年来绝大多数学生都有继续深造的意愿。以2018届本科生为例,考研报考率已超过70%(达线率已接近40%),其它约30%的学生倾向于就业和创业。上述这些多方面因素,包括新工科建设的内在要求、浙江理工大学的学科优势以及学生的生涯规划等,是确立启新学院未来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面对新形势(“三新”)、新任务(新工科建设),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可以调整为:培养情操高尚、基础宽厚、视野开阔、具有工程思维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创新型研究人才、复合型应用人才和创业型应用人才。

启新学院这一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这些年来,启新学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培养经验,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育人成果,如考上211、985高校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发明专利、发表在核心期刊的科研论文均呈上升趋势,在全国“挑战杯”大赛上也斩获多个奖项。在2018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以启新学院学生为主的竞赛团队荣获了大赛最高奖——特等奖。

二、人才培养规格的优化: 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人才培养规格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细化。新工科建设旨在培养的新兴工程科技人才,具体要求体现在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三方面。本文无意于详尽讨论三大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着力强调,如果新工科建设仅仅注重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完善,而

① 启新学院五类实验班的专业方向:理工实验班可在全校范围内选择理工类主修专业;材料化学生物实验班有七个主修专业方向,分别为:应用化学、材料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轻化工程(染整)、轻化工程(造纸)、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实验班有六个主修专业方向,分别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机械电子实验班有五个主修专业方向,分别为:机械学、电子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经济管理实验班有十个主修专业方向,分别为: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金融学、经济统计学。

忽视人才素质结构的完善,势必导致未来的工程师们丧失利用价值理性进行思考的能力,最终成为工具理性思考的典型。

马克斯·韦伯曾把社会行动中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中,工具理性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价值理性则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和自觉信仰。^[4]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缺一不可,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支撑,价值理性则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然而,此种逻辑往往会遭到现实的顽强抵抗。受到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传统工科正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培养出来的工程师往往成为工具理性思考的典型。

传统的工程教育往往有意无意地鼓励学生通过“理性计算”实现资源利用、经济效益甚至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却日益弱化学生的情感诉求、价值关怀、道德规范的培养。^[5]譬如,工程伦理原本是工程类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然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前些年“桥脆脆”、“楼歪歪”、“豆渣路”等安全事故的频发就是忽视工程伦理的直接后果。这些看似是因为利益诱惑、监管薄弱或者技术缺陷所造成的问题,实则折射出工程伦理意识的严重缺失。^[6]而工程伦理意识的缺失又可进一步归因于工程伦理教育的缺失。要推动工程伦理的发展,务必要补上教育这块“短板”。早在1974年,美国职业发展工程理事会就颁布了伦理章程,美国排名前9位的工程类名校相继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负责美国工程专业课程认证的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7]而在国内,最近几年才开始对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开设这类课程,而对于工程类本科生来说,迄今仅有几所高校将其作为选修课开设。

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工具理性,也值得深入思考。在应试教育没有根本改观的大环境下,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样未能引起整个社会应有的关注。2005年,时年94岁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有令人警醒的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8]此建言后被称作“钱学森之问”。在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同时,学界也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我们的大学教育普遍重视知识的传授,轻视能力

的培养;重视学生的考试分数,忽视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的关注;而科学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9]上述“钱学森之问”及其破解,尽管谈论的是“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但同样有助于我们领悟培养工程类人才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复旦共识”等倡议和行动对人才的三大结构提出了“特殊要求”,有助于克服上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非均衡发展、非科学发展的局限。与上述培养目标的多样化态势相对应,在知识结构方面,工科优势高校的人才应具有跨专业、跨学科乃至跨行业的交叉融合性知识,综合性高校的人才务必科学基础厚重,地方高校的人才则应具有较强的行业背景知识;在能力结构方面,工科优势高校的人才应具有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综合性高校的人才应具有突出的沟通协商能力和工程领导力,地方高校的人才则应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在素质结构方面,除了一般的专业素质要求之外,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都应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法治意识、生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具有“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而对于工科优势高校来说,还应具有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和数字化思维等。

结合启新学院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对照上述“特殊要求”,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规格也应具有新的要求:其一,应具有扎实的跨专业、跨学科乃至跨行业的交叉融合性的知识;其二,应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及工程实践能力;其三,应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工程伦理意识以及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工程思维等。尽管启新学院在打破专业、学科壁垒方面已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在研究型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探索性的举措(诸如实行全程专业导师制等),但是在学生的思维训练、产业创新能力培养、工程伦理意识的涵养等方面亟待加强。因此,需要合理规划并采取有效的手段,尽快补齐短板。

三、人才培养路径的选择: 有机整合与动态调整

人才培养目标以及人才培养规格的达成,借助并取决于恰当的人才培养路径选择。“复旦共识”等倡议和行动对人才培养路径作出了富有指导性和建设性的说明。启新学院为达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现有的人才培养主体、课程体系、工程教育模式、实践教学方式、实践平台等方面,都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或优化。因此,需要做好做足

以下功课。

第一、促进人才培养责任主体的多元化。如前所述,启新学院实行的大类基础教育与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在专业之间、学科之间已经具有一定的融合度,而要实现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则离不开相关学科专业、行业产业乃至科研院所等多方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当然不同责任主体协同育人的作用也应各有侧重,相关学科专业应参与课程体系的构建并开设相关课程,主要涉及通识教育课程、跨专业课程、学科交叉课程以及实验实训教学环节等,并提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行业产业应参与专业实践创新教育教学体系的建立,积极开展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科研院所应参与专业前沿性课程、学科交叉课程的教学,提供先进的实验条件和研究设备,同时开展前沿性课程教学和交叉学科问题研究。^[10]

第二、促进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其设计应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规格的实现。目前,启新学院的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大类平台、学科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选修课分专业模块)四部分组成,其中的个性化分类修读形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导师指导、学生自学、研究讨论等方式,也可以跨学科、跨专业、跨学位、跨校际选课。这一课程体系大体上契合了启新学院“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基础教育与“自主性、个性化、研究型”的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的要求,但与新工科建设的要求相比,显然还有诸多不足和差距。譬如通识教育方面,缺少思维训练类、工程伦理类课程,总体上过于偏重自然科学类课程,人文社科类课程偏少;大类平台方面,体现学科专业交叉的课程明显不足;专业教育方面,选修课分专业模块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此,面向新工科的课程体系亟需改革并加以完善,从课程设置、课程类型和课程内容上体现“三新”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积极探索和构建特色课程,努力实现与方兴未艾的工程教育认证的接轨。

第三、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模式。历史上,麻省理工学院(MIT)曾因进行三次工程教育改革而举世瞩目^①。而在2017年8月,该校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工程教育改革:“从工程实践的回归到工程教育育人本质的回归”,其中隐含着MIT的觉醒:工程教育应当以育人为宗旨,而非以被动追随产业需求为本。此次改革旨在“通过更多的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与学习内容,培养学生的工程思

维、科学思维及人本思维,以成为能够引领未来工程产业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具的人本式工程人才。”^[11]其“人本式”工程育人的理念和育人实践,确实有警示意义和借鉴价值。现在根据“三新”的需求改进工程教育模式,更应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育人本质。启新学院现有的育人理念与育人实践极力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当前需要努力的是如何进一步拓宽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乃至跨校学习,增进师生的交流互动,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等等,从而早日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模式。

第四、创新工程实践教学方式。一是要充分利用校内外现有的虚拟仿真等技术创新工程实践教学方式;二是要注重实践教学方法的层次性和针对性。譬如,可根据实践教学体系的层级划分,对应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具体而言,基础实验能力训练宜采用可视化、信息化、规范化的教学方法;综合设计实验能力训练可采用个性化、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创新实践能力训练则可采用工程化、协同化的教学方法。^[12]鉴于工程实践的本质在于“设计”二字^[13],工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提升都要围绕“设计”来进行。

第五、广泛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在现有的全程专业导师制基础上,努力建立以项目为中心、以导师为引领的高低年级梯次搭配、人数合理的研究性学习团队;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网+”等竞赛;建设和利用好创业孵化基地和专业化创客空间等。

四、配套措施的跟进:优化机制与凸显峰值

重构人才培养方案是新工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一“重构”必然要求启新学院对现有的管理体制、招生体制、保障机制等配套措施进行相应的调整。

首先,学院现有的管理体制面临挑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启新学院虽然只有五类实验班,在校生总量也只有800人左右,但学生主修专业差不多

^① 第一个变革时期从1861年到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工程人才培养从经验范式向技术范式的转变。第二个变革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鉴于技术范式主导下的工程教育忽视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这一时期主张工程教育向强调基础科学知识的科学范式转变。第三次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此次变革主张工程教育由工程科学范式转向工程实践范式。

有30个,几乎覆盖了学校所有的理工类学院专业。而启新学院和专业学院在行政管理上只是平行的关系,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要实现新工科建设所要求的专业、学科之间的融合,困难重重。另外,随着人才培养责任主体的日趋多元化,以及校内外教育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也迫切需要相应的协同机制。从长远来看,启新学院需要一种带有“融合”特征的体制和机制。哈佛大学自2007年重建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以来,为应对学科交叉融合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从学校到学院,上下通力协作,构建了有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14]哈佛大学的相关做法对于启新学院具有启迪意义。在未来的发展中,启新学院有必要设立以学校主要领导为核心的发展规划委员会;教师聘用则可以采用双聘制;可以借助研究型团队的形式整合师资队伍,等等。

其次,现有的招生选拔机制有待改进。当新工科遇上新高考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问题。譬如,新高考设计的科目变窄可能导致生源科目(如物理等科目)基础薄弱^[15]。生源分数的扁平化、基础弱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启新学院凸显“峰值”的基础性因素。此外,启新学院需要进行探讨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实验班能否全部通过高考招生直接选拔?是否可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等做法进行二次选拔?如果进行二次选拔,除了关注学生的数学、外语水平以外,是否还应关注学生的人文情怀、工程思维、创新创业能力等因素?

最后,保障机制应全面跟进。这些年来,启新学院在培养拔尖人才的过程中,享受了学校给予的众多特殊政策。带有激励性的保障机制,较好地促进了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峰值”的提升。在新工科建设的过程中,优质师资和教育资源继续向启新学院的适当倾斜、小班化教学的落地生根、全员专业导师制的全面升级、个性化课程的真正开设、对工程类创新创业团队的必要资助、以学生为中心的工程教育模式率先试点等等,都是启新学院未来发展所必需的保障性因素或条件。

五、结 语

推进新工科建设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面对“三新”的时代机遇,我们必须积极谋划,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行积极研究与实践。总的来说,浙江理工大学荣誉学院——启新学院的人才培养策略的调整既具有必要

性,同时也具有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才培养策略的调整是基于现有的拔尖人才培养策略之上的一种调整,它是汲取而不是摒弃了以往有价值的理念和培养模式,而且更多地嵌入了新工科建设的特殊要求,是一种提升,更是一种完善,是一种能产生“叠加效应”的调整。新工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是一体化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进行制度设计,也需要具体举措;既要理念先行,也要行动跟进;既要关注其紧迫性,也要关注其复杂性。面对如此繁重而又复杂的任务,沉着冷静、大胆尝试、循序渐进是当然的行为选择。

参考文献:

- [1] 钟登华.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3):1-6.
- [2] 佚名. “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J]. 复旦教育论坛, 2017(2):27-28.
- [3] 徐颖云. 招办访谈:浙江理工大学实施优秀生培养计划[EB/OL]. (2011-06-20) [2018-06-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0f574d01017z2o.html.
- [4]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1卷)[M]. 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4.
- [5] 项聪. 培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备的工程师:兼论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7(6):51-56.
- [6] 王蕾,邓晖. 工程教育要补上伦理“短板”[N]. 光明日报, 2014-07-22(13).
- [7] 李世新. 国外工程伦理教育的模式和途径[J]. 自然辩证法, 2011(10):113-134.
- [8] 李斌. 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羨林、钱学森侧记[N]. 人民日报, 2005-07-31(1).
- [9] 林剑.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文化诠释[J]. 人文杂志, 2017(12):1-6.
- [10] 林健.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生工科专业建设[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1):32-35.
- [11] 肖凤翔,覃丽君. 麻省理工学院新工程教育改革的形成、内容及内在逻辑[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2):45-51.
- [12] 孙科学,郭宇锋,肖建,等. 面向新工科的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与探索[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8, 35(5):233-235.
- [13] 项聪. 设计范式:工程教育发展的应然选择[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6):12-19.
- [14] 原帅,贺飞. 哈佛大学工学院发展战略及其对新工科建设的启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2):67-89.
- [15] 吕文晶,陈劲. 当新工科遇上新高考:机遇、问题与应对[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8(1):78-83.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aking Qixin Honors Schoo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CHEN Lei

(Qixin Honors School,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new economy have brought about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ineering major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trategy for college engineering majors must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aking Qixin Honors Schoo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such as the target orientation, specification, and path sel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rrespondingly, it should also be reflected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enrollment system, and support mechanism. As far as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engineering thinking and practice ability of students,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subjects, and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engineering education mode,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platform, so on. As far as the latter is concerned,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implement encouraging measures, som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with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formed, and sound talent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alent training goal; talent training specification; talent training path; strategic adjustment

(责任编辑: 陈丽琼)

结合数码控制技术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 课程改革与实践

徐英莲

(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为培养满足现代纺织工业发展要求的专业人才,纺织工程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需要不断更新。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对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课程开展改革与实践,具体包括丰富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和创新教学环节。教改实践表明,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开展《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 《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技术;实验组织方式;创新教学环节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409-07

“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要求,为工科院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工科院校应根据专业发展的方向,培养适应并能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创新性专业技术人才。^[1]因此,高校教学改革应围绕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紧跟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步伐,进行相关专业的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纺织行业是传统制造业,该行业技术成熟,专业性较强。目前,高校对于纺织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普遍以纺织工艺技术为主。随着电子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纺织这一传统制造业无论在织造技术还是在工艺设计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发展,纺织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不能只是停留在纺织工艺技术,而是要结合自动化技术,使学生能熟练掌握织造工艺技术与自动化控制技术相结合的应用技能,为创新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2]本文以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课程建设为例,探索适应现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实验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教学改革主要包括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构建创新教学环节等多方面,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一、教学改革背景

针织毛衫是特色针织服装,“毛衫工艺设计”是针对纺织工程专业学生的实验课教学内容之一。^[3]随着现代装备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纺织业的转型升级急需大批既具有纺织专业知识又掌握数码控制技术的纺织专业人才,因此纺织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逐步充实 CAD 设计等新内容。《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课程的开设,正是为了提升纺织工程学生的数控技术应用技能。多年来,浙江理工大学纺织工程专业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课程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一)实验课程内容单一,与现代化综合性人才培养有一定的脱节

根据原来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教学大纲,该课程主要任务是:要求学生“学习‘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软件的操作;学习常规手工毛衫工艺在‘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中的实现;学习应用软件设计一些常规产品等”。由此可知,教学内容注重学生学习软件知识,实验内容相对单一。

培养适应现代纺织工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要求学生不仅掌握纺织基本工艺、计算机软件的操作,

还要学习现代化数码控制设备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方法,学习 CAD 软件设计参数在数码控制设备中的实现方法等跨专业的相关知识^[4]。知识面的拓展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计算机程序的设计方法,也有利于学生提高羊毛衫设计程序的可执行性和程序的优化设计能力。鉴于此,《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教学应将 CAD 设计技术、纺织织造技术与数码装备控制技术等知识点结合起来,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二)实验组织方法单一,与纺织生产实际脱节

长期以来,《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的组织方式是:学生根据统一的实验任务书,进行单人实验或多人分组实验,教师根据学生实验表现和实验结果评定实验成绩。实验组织方式比较单一,学生的设计成果与产品相脱离,学生实验结果的可执行性无法得到确认,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

“羊毛衫 CAD 设计”涉及的知识点众多,根据设计参数的性质不同,程序设计中将设计参数分为多个模块,且各模块参数之间的关系复杂。对于一个执行性优良的程序,需要结合设备性能,制定流畅、可行的设计方案,编辑切实可行的程序执行步骤。

仿照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的新产品开发流程,产品设计需要经过“设计方案探讨→程序设计→程序修改→上机试机→程序优化→上机编织产品→产品确认”等环节,并经过反复的修改和优化过程。因此,《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需要改革实验教学的组织方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提高设计程序的可执行性,进而将毛衫设计结合纺织企业生产实际过程。

二、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代工业生产朝着“计算机设计、数据传输、生产自动控制”的方向发展。在针织毛衫生产中,随着电子提花横机的自动化程度逐步提高,毛衫的设计范围更加广泛,款式更为丰富。^[5]

《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的教学改革目的是: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形式,提高实验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综合创新能力。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方面,结合传统编织技术和现代数码控制技术,充实教学内容,加强学生对多种专业知识的应用,将传统纺织工程教学和现代计算机设计与数码控制技术等教学内容相结合,实现学科交叉;另一方面,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一)结合现代针织和数控技术的发展,充实《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教学内容

与传统的《毛衫工艺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相比,改革后的《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结合电子提花横机的数码控制原理,从羊毛衫工艺设计、CAD 程序设计、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技术和成形衣片的编织技术等多方面丰富了实践教学内容。《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教学实践内容主要包括: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分析、计件衣片连续编织工艺设计(即罗纹分离组织设计)、针织花形组织的设计与实现、毛衫成形衣片设计与参数设计^[6-7]。课程改革前后的内容变化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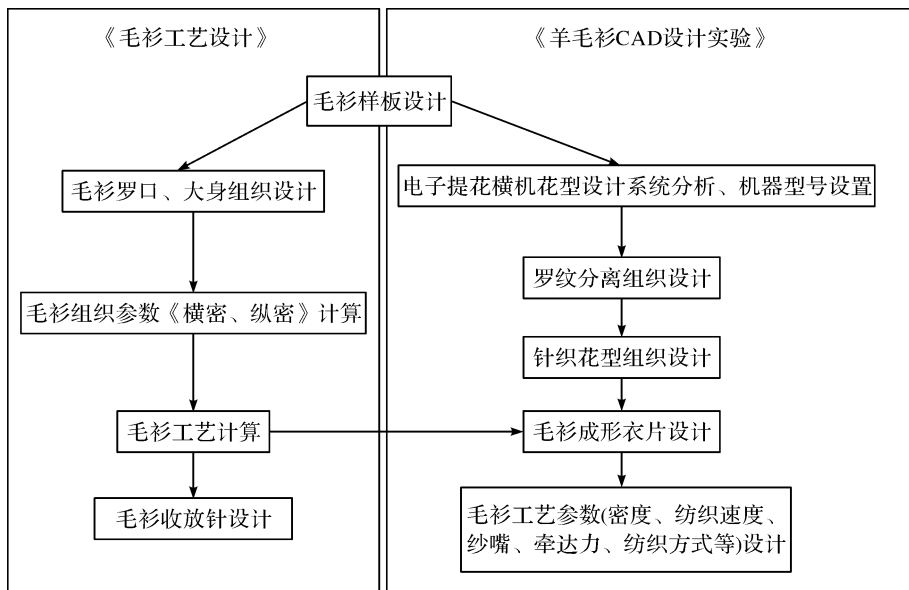


图1 《毛衫工艺设计》与《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课程内容对比

改革后的《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各部分教学内容都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a)“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分析”部分可系统分析电子提花横机各控制参数的数据结构和控制范围、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的组织方式和数据库内容等内容。

b)“机器型号设置”部分可以从技术层面系统分析电子提花横机的发展过程、现状和发展趋势。

c)“罗纹分离组织设计”部分包含羊毛衫罗纹织物组织类型、横机起口牵拉方式(有起底板、无起底板)、翻针移圈方式等多个知识点。

d)“针织花形组织”部分包含单/双面组织设计、二(多)色提花组织设计、集圈花色组织设计、各类移圈组织设计、波纹组织等设计织物花色组织结构方面的知识。

e)“毛衫成形衣片”部分包含毛衫收放针方式设计、领口编织方式设计、落布方式设计等成形衣片编织方面的众多知识点。

总之,结合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技术开展《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可以从纬编技术、数码控制技术和毛衫款式设计等多方面扩充实验教学内容,扩大学生知识面,实现学生的知识结构交叉。

(二)结合现代针织技术理论教学内涵,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

纺织工程(针织技术方向)教学体系中纬编部分的内容包括《针织纬编工艺学》、《针织成形工艺学》、《横机工艺与设备》、《针织机电一体化》等多方面的课程。将电子提花横机及其花形设计系统运用于《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即结合数码控制技术实施《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可以涵盖纺织工程纬编工艺知识体系中多方面的教学内容。具体而言,《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涉及以下多门专业课的教学内容:

a)包含《针织纬编工艺学》的重要教学内容。《针织纬编工艺学》主要包括针织物组织结构设计和编织工艺设计两部分内容。这两部分内容都将在《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织物组织设计”和“编织工艺参数设计”实验中得到充分的实践。

b)包含《针织成形工艺学》课程的部分教学内容。“针织成形工艺”包括全自动电子提花针织无缝圆机、袜机等编织的圆形成形产品的生产工艺,也包括横机编织成形衣片,通过缝合形成的成形产品生产工艺。《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包含针织成形衣片设计的实践内容,涉及针织成形衣片款式设计、织

物组织设计、毛衫工艺设计等众多教学内容。电子提花横机能够实现成圈、集圈、浮线、移圈、接圈等工艺设计,能够实现花形组织设计和成形衣片的收放针工艺设计,设计范围大,是实践针织成形设计开发的重要机型。^[5]

c)包含《横机工艺与设备》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针织横机包括常规手摇横机、机械提花的横机和电子提花横机,使用高性能的电子提花横机是行业发展趋势。其结构复杂、控制精准,操作方便,应用范围广^[5],是《横机工艺与设备》课程的主要内容。《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实践将“CAD设计”与“针织横机工艺”设计结合起来,加强学生对《横机工艺与设备》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d)包含《针织机电一体化》课程的部分教学内容。电子提花横机是数码控制技术在纬编编织技术方面应用的代表性机型^[5],《羊毛衫CAD设计实验》以纬编花形设计软件为设计工具,将“针织工艺技术”、“CAD设计技术”和“数码控制技术”结合起来,实践《针织机电一体化》课程的基本教学内容。

(三)实验教学方法与教学组织形式改进

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实验方法和课程组织方式等方面实施课程改革,改革后的《羊毛衫CAD设计实验》课程的实验流程和实验组织方式,如图2所示。

a)改进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动画教学手段,并逐步完善多媒体动画的演示水平。实验教学将重点讲解“电子提花横机控制机构”、“毛衫织物组织设计”、毛衫编织“工艺参数设计”和CAD设计系统的“程序的检验与编译”等知识点及这些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提升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认识水平。

b)改进实验方法。《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采用实践演示和单独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首先采用设计实例进行“羊毛衫CAD设计实践演示”,然后组织学生根据自己的设计目标开展“学生独立设计”的实验环节。

“学生独立设计”是指学生根据《实验任务书》的要求,结合自己的爱好,自主选择设计内容,独立设计、自主训练。“学生独立设计”环节要求学生从毛衫组织结构、服装款式特点和工艺要求出发,系统学习织物组织设计、毛衫工艺设计、横机编织工艺参数设计的方法,探讨不同种类毛衫的设计方法。在设计教学实践中,注重毛衫产品的设计要求与横机数码控制技术之间的关系,提高设计结果的可执行性和编织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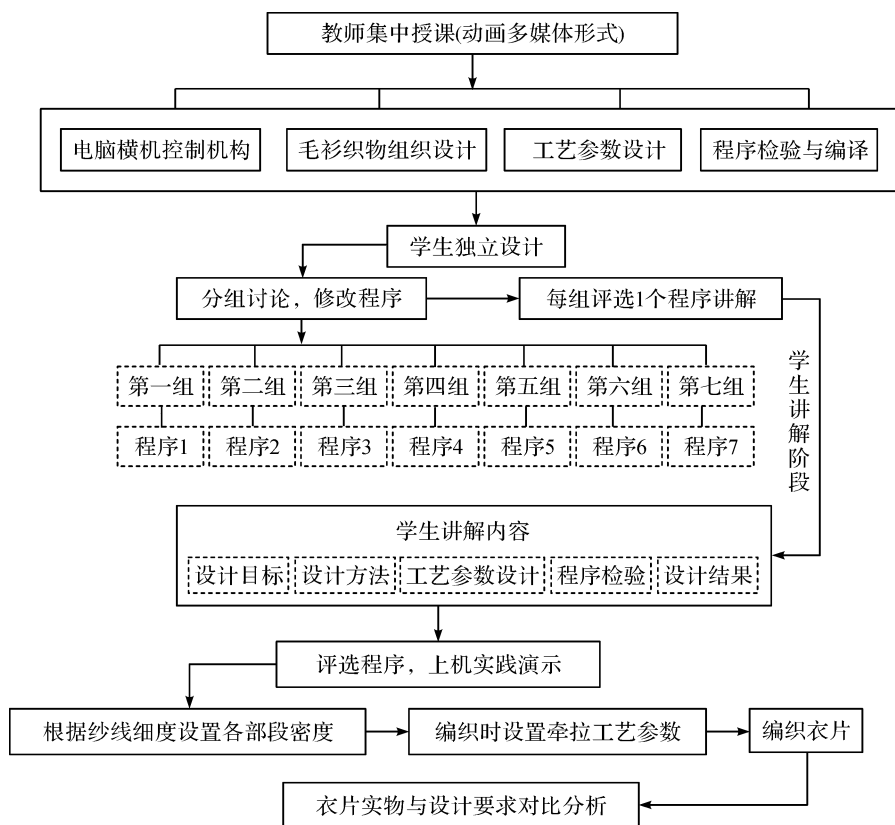


图2 《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实验流程和实验组织方式

“学生独立设计”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设计中出现的问题,采用单独指导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遇到的共同问题,集中讲解演示。“学生独立设计”的结果是评判学生的设计成绩的依据之一。在“学生独立设计”实践训练中,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c)改进课程组织方式。采用以“学生独立设计”为主,结合“小组分析讨论”优化设计,并以“上机演示”为最终检验方式等不同形式的实验教学方式,全面提升实验教学效果。

根据学生学号,将参与实验的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5~6人)。“学生独立设计”完成后,进行“分组讨论,修改程序”。小组每一成员讲解自己的设计思路、设计方法和设计结果,其他小组成员对其进行评议,根据其“设计目标”,分析其“设计方法”的合理性,“工艺参数设计”的正确性,讨论其“设计结果”在编织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最后根据“程序检验”结果,评判程序设计的效率。学生根据小组评议结果进一步修改和优化设计程序。

“分组讨论,修改程序”结束后,每个小组“选择一个程序”在全班范围内“讲解”,然后全班同学对其进行“评议”,学生修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程序,并通过程序编译,传输程序数据,然后“上机实践演示”。

“上机实践演示”要求设计者在编织前根据纱线的细度设置织物各部段的密度,然后穿好主纱和废纱,开机编织。在编织时设置织物的牵拉张力等参数,“编织衣片”完成后,需要对衣片实物与设计要求的对比分析,分析编织织物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然后进一步修改程序,重新编织织物^[8],最终实现衣片产品设计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上机实践演示”能够使学生在实践中分析问题,并逐步改进、修正和完善设计;通过实践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实验设计参数与横机数码控制机构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创新教学环节

为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优化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的教学内涵,可通过构建创新教学环节,组织学生开展专业知识研讨。在实验课时有限的情况下,组织学生成立“课外兴趣研讨小组”,通过教师引导激发学生兴趣,师生采用“一对一”指导的方式开展研讨活动。

创新教学环节围绕电子提花横机的数码控制技术、纬编专业技术和成形服装设计技术等知识点,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各有侧重。对于纺织工程专业的学生,创新教学环节的教学内容可以从复杂织物组

织设计与编织、复杂成型衣片设计与编织、特种纱线编织等多方面着手。对于纺织机械专业的学生,可以从研究复杂织物编织时各个控制参数类型、设计精度、控制范围等方面着手。对于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可以从花色织物组织设计、衣片款式设计等方面着手。下面以电子提花横机的应用为例,探讨创新教学环节的主要内容。

(一)复杂织物组织的设计

复杂组织可以是提花组织、集圈组织、移圈组织、波纹组织和添纱组织等^[9],也可以是几种组织的组合。

a)提花组织类型多,其技术的关键是背面组织结构设计和纱嘴设计,为提高设计效率,横机花形设计系统开发了专门的模块^[9]。

b)集圈组织设计的技术关键是必须合理设计集圈线圈的密度和编织的牵拉力。

c)移圈组织品种多,控制精准度要求高,为方便设计,系统建立了各种移圈针法的“针法数据库”。移圈组织设计的技术关键是一个横列中移圈方向的一致性和前后针床持圈状态的合理分布,另外移圈线圈密度和织物的牵拉力需要合理设置。

d)波纹组织是横机特有的组织结构,织物编织与后针床移动配合完成,每一横列独立设计,线圈密度与针床横移数相协调。

e)添纱组织需要设置宽纱嘴,编织时需要调试宽纱嘴的位置,防止纱嘴间相碰撞。

复杂织物组织的编织过程复杂,设计编织要求高,开展复杂织物组织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复杂形状的成形织片设计

电子提花横机能够实现后针床精准横移、前后针床之间线圈转移和局部线圈编织,为实现成形衣片编织提供了保证。成形衣片编织的主要有移圈收针和持圈不编织两种工艺。移圈收针是实现平面成形衣片编织的主要手段;持圈不编织可以实现立体全成形织物的设计。所以系统地研究、分析和实践成形织物的设计,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设计水平。

(三)特种纱线织物的工艺参数设计

随着纺织新原料的大量应用,横机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增加。影响横机编织的主要因素有纱线的线密度、弹性、强力和柔软性等。对于特种纱线织物编织,横机织片工艺参数设计必须根据纱线的性能,合理设计编织工艺参数,才能保证编织顺利进行。

总之,纬编织物组织丰富,以复杂织物组织的设

计与编织、复杂款式的设计与编织、特殊要求织物的设计与编织等教学内容为基础,构建创新教学环节,让学生开发出不同特色的毛衫产品,能够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操作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四、教学改革成效

结合电子提花横机的数码控制技术,通过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手段和完善教学组织方式开展《羊毛衫CAD设计实验》课程教学改革,能够全面提升纺织工程专业的学生学习纬编编织工艺、编织工艺参数设计与成形件衣片的设计等针织工程专业技术,同时能够跨专业学习运用织造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织造技术与服装设计技术等交叉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以组织学生课外兴趣研讨小组的方式,根据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构建创新教学环节,开展综合性、开发性的创新实验,更加全面地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在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方面成效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全面掌握纬编工艺技术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是利用“电子提花横机花形设计系统”进行成形织片编织工艺程序的设计。通过该课程教学改革,学生全面掌握纬编工艺技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通过改进教学方式,教师采用多媒体动画教学手段重点演示CAD设计参数与电子提花横机编织工艺之间的关系,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数码控制技术、电子提花横机成圈机件配置技术与复杂组织编织技术之间协调配合的关系,从而加深对纬编编织工艺各项技术原理的理解。

b)学生在“独立设计”过程中了解“织物设计程序”与“编织工艺”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对设计结果进行“分组讨论,修改程序”、“上机实践演示”,结合纬编工艺技术对设计程序逐一修改完善,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设计内容”与“纬编编织工艺”之间的联系,加深对纬编工艺技术(包括常规成圈技术、电子选针技术、移圈编织技术等)的理解和掌握。

c)学生通过“上机实践演示”分析对比不同的组织结构织物,了解不同织物组织的结构特点和织物组织风格。

(二)学生掌握织造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

各种纬编工艺技术的实现,需要通过工艺参数的设计来完成数码控制。电子提花横机是一种间隙

编织设备,机头结构复杂。^[10]横机的控制参数众多,主要包括状态控制和位置控制两类。状态控制类工艺参数在CAD设计时完成,位置控制类工艺参数在CAD设计时完成分类设置后,学生根据纱线性能和编织状况,上机编织时在机器上直接设置各参数。

在《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教学演示环节,学生能了解“纬编工艺参数”与电子提花横机结合控制方式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独立设计”环节,掌握状态控制类工艺参数和位置控制类工艺参数的内涵、设计方法和注意事项;通过“分组讨论,修改程序”学习掌握优化工艺设计的方法;学生在“上机实践演示”中,学习位置控制类工艺参数上机设置方法和设计范围,进而掌握工艺参数设计与数码控制方式之间的关系。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实践过程是学生对现代针织工艺技术知识从理解到掌握的逐渐提升过程,随着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入,学生不仅可以全面掌握现代纬编技术,而且能够较系统地学习数码控制技术的方法,实现织造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的交叉融合。

(三)学生掌握毛衫成形衣片的设计技术

针织成形服装是纬编针织工艺的应用领域之一,也是毛衫外衣化、时装化的基础。针织成形服装一般通过针织成形衣片缝合而成,电子提花横机通过数码控制技术能够完成针织成形衣片的编织。

就针织服装设计而言,针织成形衣片的设计包括成形衣片的“板型设计”(整体结构特征)、成形衣片的“尺寸结构设计”(各部段的尺寸要求)、“织物花形组织设计”和“衣片缝合的技术要求”(缝合针数、对位符合)等,知识点多、技术要求高。从针织工艺技术而言,针织成形衣片编织技术涉及衣片的“起口编织技术”、“分离组织编织技术”、“局部编织技术”、“收、放针技术”和“花形编织技术”等。通过《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学生能够全面掌握针织服装设计方法和成形编织技术,学习通过“成形编织技术”完美实现“针织服装设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针织成形衣片”计件式衣片编织通过电子提花横机的“起口编织技术”和“分离组织编织技术”实现。

b)“针织成形衣片”的“板型设计”通过电子提花横机的“局部编织技术”(包括“分别编织技术”和“引塔夏编织技术”)实现。

c)成形衣片的“尺寸结构设计”通过电子提花横机的“收、放针技术”实现。横机的“收、放针技术”内涵丰富:一般利用“毛衫的工艺设计”满足成形衣片的尺寸工艺要求;通过横机的收针方式设计(包括“收针边”、“收针针数”和“偷吃”等)满足衣片收放针的外观结构完美。

d)成形衣片的“织物花形组织设计”通过电子提花横机的“花形编织技术”实现。成形衣片的花形编织不同于织物的花形编织,在满足花形组织编织的基础上,成形衣片的花形编织还要设计花形在成形衣片上的位置和布局,即需要设计成形衣片的“边缘”和花形在衣片中的“中心位置”。另外,花色组织成形衣片设计时还要全面考虑横机的“收、放针”设计。

e)成形衣片的“衣片缝合的技术要求”通过电子提花横机的“收、放针技术”和“花形编织技术”实现,主要包括“收针边”、“收针针数”和对位符号的“组织设计”等。

总之,通过《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运用“成形编织技术”掌握“针织服装设计”的技术要点,实现织造技术与服装设计的知识交叉融合,提升设计水平。

(四)加强学科交叉,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羊毛衫CAD设计实验》可以让学生通过不同毛衫的款式设计、毛衫工艺设计、编织工艺方法设计和编织工艺参数设计,完成电子提花横机数码控制程序设计任务和实践编织任务。由于毛衫织物组织丰富、款式多样,CAD设计方法多样,学生在课程中的实践范围广泛,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学习目标制定实验方案,有重点地开展实验,从而提高了学生实践技能。

从《羊毛衫CAD设计实验》的整个实验过程来看,羊毛衫CAD设计的要求非常高。首先要保证羊毛衫CAD设计程序的可执行性,各个执行部件的配合一致,避免冲突;其次要提高电子提花横机的编织效率,实现程序的优化设计;最后应保证编织织物的外观性能与品质与设计要求一致,即设计的成果具有应用价值。为保证羊毛衫CAD设计成果的完整,《羊毛衫CAD设计实验》教学改革中强调学科交叉,注重针织工艺技术与数码控制技术的知识贯通、服装设计与成形编织技术的知识贯通,学生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培养实践创新能力。

五、结 语

为培养满足现代工业发展要求的人才,《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利用现代数码控制技术充实实验教学内容,改进实验教学组织方式,探讨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的方向。教改实践表明:

a)结合数码控制技术的发展开展《羊毛衫 CAD 设计实验》教学,将传统工程专业实验教学和现代计算机设计与数码控制技术等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极大地丰富实验教学内容,提升实验教学水平。

b)通过改进实验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结合数码控制原理进行实验教学,根据设计要求开展实验分析,为学生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良好空间,加深学生对现代针织技术的理解,熟悉现代毛衫的设计思路,有助于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c)通过实验组织方法的改革,采用个人独立设计与小组分析、讨论与评议相结合、不同设计方案对比分析、小组间设计方案相互交流以及上机演示的方式,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想象力,使有特色的设计能够脱颖而出,有缺陷的设计得以完整,同时提高了学生团结协作精神。

d)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验基础,构建综合性的创新教学环节,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综合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 [1] 李立国. 工业 4.0 时代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1): 6-15.
- [2] 王瑞, 张淑洁, 赵立环, 等. 适应现代纺织产业需求的“大纺织”工程能力培养与实践[J]. 纺织服装教育, 2014, 29(2): 121-124.
- [3] 陈建勇. 高校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 浙江理工大学的改革与实践[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188-191.
- [4] 沈雷, 陈国强. 针织毛衫设计的发展[J]. 纺织导报, 2010(12): 75-77.
- [5] 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 国产电脑针织横机技术发展趋势及市场展望[J]. 纺织机械, 2012(2): 2-6.
- [6] 孟金凤, 孟家光. 全成形系列针织服装设计与制作[J]. 纺织科技进展, 2015(1): 30-33.
- [7] 龙海如. 纬编针织机械发展动态[J]. 纺织导报, 2010(9): 50-54.
- [8] 朱文俊, 孙平范. 电脑横机机械与控制技术[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 10.
- [9] 朱文俊. 电脑横机编织技术[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1: 94-96.
- [10] 宋广礼. 电脑横机实用手册[M]. 2 版.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 61-63.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AD Design Experiment of Woolen Sweater* based on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XU Yinglian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Textil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professionals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xtile industry,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extile engineering need to be constantly updated.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AD Design Experiment of Woolen Sweater* of textile engineering major i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were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modern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including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ation, teaching method reform and teaching link innovation.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shows that the *CAD Design Experiment of Woolen Sweater* combined with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master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but als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Key words: *CAD Design Experiment of Woolen Sweater*; computerized knitting machine;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experiment organization mode; innovative teaching link

(责任编辑: 陈丽琼)

改革开放以来《法兰西内战》研究述评

莫岳云,王晓真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1)

摘 要:《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著作研究的热度逐渐升温。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人民民主思想、社会公仆思想和廉价政府思想五个方面揭示了这一光辉篇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但是,相关研究还存在着内容研究的不均衡、同质化趋势严重和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当着眼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拓宽研究内容,扩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人民民主;社会公仆;廉价政府

中图分类号: A8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416-08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于1871年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基础上写就的重要著作,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它叙述了普法战争给法国政局带来的变化,分析了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条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本质与丑恶行径,总结了巴黎公社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经验,深刻阐述了巴黎公社作为新型国家雏形的基本特征,展现了巴黎公社政治体制的组织原则和公社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采取的措施,高度赞扬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阐明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就这篇著作的历史价值而言,学界大都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即《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这一著作很快被译成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十余种语言文字,在欧洲各国和美国传播开来。在中国,自陈独秀于1922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对《法兰西内战》部分内容进行引译,到1938年11月由吴黎平和刘云(即张闻天)合译出版《法兰西内战》,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版,这一著作已在中国传播了数十年,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

业的胜利行进,它依旧散发着真理的光芒。

国内学者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超过10篇,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加温,已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改革开放前,研究成果集中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改革开放后,这一著作中的人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社会公仆思想、权力配置思想等方面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的内容也与时代紧密契合。具体说来,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几个方面: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的研究等。本文拟从上述五方面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系统分析国内对《法兰西内战》研究的状况,展示已取得的成果,揭示存在的不足,并为进一步深化这一著作的研究提供明晰的思路。

一、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战争中惨遭失败。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发动

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梯也尔政府与普鲁士军队相互勾结,对公社成员进行大肆屠杀,最终导致巴黎公社的失败。虽然巴黎公社仅仅存在72天,但是它所进行的伟大尝试,为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工人的“冲天创举”予以高度评价,并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和梳理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必须建立起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内部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秦正为^[1]认为,巴黎公社在构建自己的制度体系过程中没有建立起稳固有力的领导核心,过于重视民主,每个代表都自作主张,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而且巴黎公社内部始终没有统一,存在严重的派系内争。陈明凡^[2]引用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对公社委员会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批评,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尤其是缺乏一个坚强的、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二是必须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争取农民的支持。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只有充分地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斗争,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反动势力,扩大革命形势。文采^[3]认为公社没有采取果敢的有力措施,也没有足够时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壮大革命队伍,增强革命力量,致使当凡尔赛反革命势力发动军队武装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攻时,公社陷于孤立无援,势单力薄,遭致失败的厄运。赵小飞^[4]指出,忽视成立革命同盟军是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由于公社领导者缺乏对农民问题的相对了解,再加上军队各方面的镇压、阻挠和外界对广大农民阶级进行的虚假宣传,造成工人阶级不能果敢地联合农民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而是靠工人阶级自己单薄的力量与梯也尔反动政府和普鲁士的联合军队进行抗争,势必导致失败。

三是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把革命进行到底,并坚持革命中军事至上和军事策略性原则。吴盼等^[5]认为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武装是取得革命胜利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巴黎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推翻梯也尔政府等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拥有并掌握了一支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关勋夏^[6]认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法

兰西内战中取得重要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犯下了严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一方面,中央委员会没有在战争结束后乘胜追击,而是停止进攻,观望等待,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并把权力交给了公社,严重违背了内战中革命军事至上和军事策略性原则,致使革命失去了宝贵的时机。

四是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斩断资产阶级的经济来源,把所有的经济资源收归无产阶级所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吴红英^[7]认为,巴黎公社成功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存在很大失误,即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银行,没有试图掌握敌人的经济命脉。而梯也尔政府正是借助从法兰西银行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才得以恢复元气,重新对革命势力进行绞杀和反扑。恩格斯在1891年版《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写到:“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8]^[12]。刘丹^[9]、王宏吉等^[10]则对巴黎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五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发展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邸乘光^[11]认为巴黎公社对敌人过于仁慈,没有实行坚决和有效的专政,是公社失败的最大教训;正是由于专政方面的失误,民主的成就和一切革命成果都化为乌有。韩云川^[12]指出,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使它从阶级压迫的工具变成解放人的工具。一方面是废除旧政府权力中纯粹压迫人民的机关,另一方面是将旧政府权力中的合理职能交给对社会负责的人民公仆。李姐^[13]指出,公社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解存在严重误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敌人力量的强大,也不了解如何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来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必须建立长期执政的制度理念^[14]、建立起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15]、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始终保持人民性^[16]等,也是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教训。除了揭示巴黎公社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部分学者还对巴黎公社产生的根源、巴黎公社的性质、原则和巴黎公社中的军事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高放^[17]认为巴黎公社是法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刘昀献^[18]认为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是带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林棵等^[19]从资本压迫社会的制度工

具、自治推动民主的实践逻辑以及自治政府的民主超越性三方面论述了巴黎公社自治政府内在的制度优越性。刘暖颜等^[20]则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巴黎公社的军事哲学理论思想即进攻与防御、革命与团结、专政与军队等进行了分析。还有学者^[4]认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忽视了客观历史条件,缺少相对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并认为革命一定要重视对客观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环境现状的分析。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结合,是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现代学者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西内战》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巴黎公社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议题和其中蕴含的工农联盟思想两方面展开。

部分学者认为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张汉清^[21]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并提出了如何运用革命暴力巩固自己统治和如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性质两方面的重要任务。王小龙^[22]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舍弃资产阶级专政的帝国及其制度,超越资产阶级专政的局限,充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职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把形式民主发展为实质民主。王春良^[23]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发了关于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原理,其中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夺取胜利后,必须建立起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权利,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也有部分学者质疑“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巴黎公社建立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关勋夏^[24]不认同学界提出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他认为《法兰西内战》中“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

级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其他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巴黎自治。杨偲励^[25]认为,按马克思的意思,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使国家的公共权力回归到社会之中,其论述国家的重点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对政权的争夺和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而并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也并不认为巴黎公社就是一次非常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工农联盟思想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部分学者对《法兰西内战》著作中蕴含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宫玉涛^[26]针对当时法国农民阶级的地位、巴黎公社为结成工农联盟采取的措施、以及公社为什么没有结成工农联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单提平^[27]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只有通过至少一个有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够实现,而且这一阶级联盟必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除从以上两个角度对《法兰西内战》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进行解读之外,部分学者还分别从《法兰西内战》中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形象^[28]、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29]及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本质^[30]的反向对比、无产阶级政权要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31]、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32]等多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优势。

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33]。人民民主思想是《法兰西内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既包括对民主观的认识,也包括对人民思想的阐释。

首先是对于《法兰西内战》中民主观思想的研究。尤存^[34]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民主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对民主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否定,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国家制度向社会、向人民的回归。陈仕伟^[35]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对《法兰西内战》的民主思想进行了分析,从国体来看,国体的民主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的是人民的主体、主导地位和对非人民的专政,是实现对人民的直

接民主和完全民主;从政体来看,政体的民主是运用无产阶级的自治组织——公社——对有产者阶级实现专政,是行政上、管理上和一般事务上的民主。张国军^[36]从阶级差别、虚假的代议制和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批判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认为普选产生国家公职人员、实行议行合一的管理体制等奠定了公社真正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

普选制是《法兰西内战》民主观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巴黎公社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规定由工人、农民等通过普选选出代表,组成公职人员,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并可以随时罢免。张爱军等^[37]认为巴黎公社革命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即公社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举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代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决定是否予以罢免。方雷^[38]从参加选举的选民、当选人员、选举的方法和范围、对被选举出公职人员的监督和罢免四方面阐释了巴黎公社真实的普选制与资本主义名义上的普选制本质的异同。

其次,对于《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思想的阐释,既包括对什么是人民、人民内涵的界定,也涉及对人民主体思想的认识。

一是对人民内涵的界定。高健等^[39]认为在《法兰西内战》中,工人阶级、农民、中等资产阶级是巴黎公社时期“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高级僧侣、大地主、富有的资本家则排除在人民之外。范正廷^{[40]103-104}也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代表公社人民群众,是公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中等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是人民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公社无产者拯救和维护的对象,是人民主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刘真金等^{[41]104-105}则把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时期的人民除了工人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农民之外,还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外国工人。

二是人民主体思想。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深刻揭示。刘真金等^{[41]106-108}认为人民是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监督的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并从实行以人民为主体的各方面措施以及防止官僚腐败问题等方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主体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正廷^{[40]104-106}认为人民是公社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体,工人阶级政权源于人民而又服务于人民,提出了基于人民主体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四方面国家治理措施,并认为国家治理应以人

民为主体,人民主体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人民自治是以人民为主体治理国家的根本实现路径。

此外,还有学者对《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政治参与思想、人民普遍利益思想,以及据此分析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斌^[42]认为人民政治参与思想的产生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他从人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实践模型、基本特征和价值诉求等方面解读了人民政治参与思想。张伟伟^[43]认为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普遍利益的真正实现,公社从经济上满足了人民经济平等的利益,政治上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文化上实行义务教育给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持,法律上给人民普遍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上述两位研究者分别论述了人民政治参与思想、人民普遍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意义。李惠斌^[44]则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民主问题上权利缺失的致命缺陷、中国的大变革与民主政治的压力、直接民主与议会民主的民主问题的局限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

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则。为了避免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8]15}。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社会公仆思想和如何践行社会公仆精神两方面来展开。

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内涵。陈明凡^[45]认为社会公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理念,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剥削阶级国家生成和演进的内在逻辑。作为社会公仆的政府必然是为人民谋福祉、办实事的服务型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型政府;是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廉价型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型政府。陈容^[46]认为《法兰西内战》中的社会公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际运用,涵盖社会公仆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接受人民监督和人民群众有权罢免公仆三方面内容,并认为这一思想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实践。殷一榕等^[47]认为,政府扮演的

角色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不应该是人民的主人;公仆政府应始终由工人组成,只有劳动者才能代表公仆政府。黄东阳^[48]认为该著作中蕴含的马克思政府公仆本位思想涉及为全体公民负责的劳动型责任公仆、用少钱办大事的廉价公仆、公仆政府的非人格化和具有公仆身份流动性的专业公仆、有限职能和权力的政府有限公仆四方面。

如何践行社会公仆精神?首先,有的学者强调,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赵修义^[49]认为不能把社会公仆简单理解为领导干部个人的道德品格问题,而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高度去理解。崔云鹏^[50]则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赋予人民充分自由的选举权、人民享有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和取消公职人员特权等方面阐释了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措施。

其次,部分学者认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黄晓辉^[51]认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建构生产者的自治机关,这个自治机关的特点一是主权在民;二是横向分权,纵向自治;三是杜绝特权。而权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与自身相矛盾的对立力量,造成了权力的异化。于建东^[52]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暗含了权力异化的观点,从价值指向、职责功能、隶属关系和防范措施四方面展开了对权力异化的论述,并指出权力异化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权力观,确保权力正当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还有学者认为,践行社会公仆精神要深刻认识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建设责任型政府。朱艳菊等^[53]认为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逐步形成的,《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以人民为政府价值主体、以维护人民为政府价值取向的基本思想。实现政府价值,目标是建立责任政府。张继良^[54]认为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的实质是阶级属性和权能规制的统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一切公职人员均是社会公仆,他们不享有任何超越履行公共职责范围之外的特权;建设责任政府,要坚守工人阶级责任政府的价值原则,继承和创新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

五、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的研究

廉价政府思想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其核心要义有两

个:一是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二是拥有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廉价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是廉价政府和如何构建廉价政府两方面。

对于廉价政府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表述。谭苑苑^[55]认为《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廉价政府表现为较低的政府成本投入与较高的政府监管效率,以期构建精简节约、无官僚特权无腐败、民主为民的服务型政府。高晓霞等^[56]认为廉价政府实质上就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能够精简行政职能、缩减政府规模并降低运营成本,进而实现公共服务最优化且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陈明凡^[57]认为廉价政府是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它是以低投入创造出高效率,尽最大努力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如何构建廉价政府,国内学界从两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要以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为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在建立廉价政府过程中取消了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将人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取代了常备军,将国家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等国家官吏换成公社的机构和人员。胡帆等^[58]认为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消费存在内部化、部门化、职务化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以廉价政府思想指导我国构建节约型政府势在必行。二是要构建精干、高效、廉洁且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田旭明^[59]结合政治伦理的价值理念、制度伦理、主体伦理和生活伦理四个逻辑层次,提出以“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理念为目标指向,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民主反腐”的制度伦理诉求为契机,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以“敬畏责任”的政治主体伦理自觉为尺度,加快责任型政府建设;以“勤俭节约”的政治生活伦理的应然为准则,推动廉洁型政府建设。谭苑苑^[60]依据《法兰西内战》中的反腐思想,分析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和特点,提出现阶段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反腐败监督机制和公务员制度,构建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全覆盖的立体预防腐败体系推进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工作。董世明^[61]还对《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廉政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分析得出腐败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及其官僚制度的根源,并认为《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建立廉价政府、加强监督工作和实行政务公开的反腐倡廉思想。

除了从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之外,还有学者对《法兰西内战》的翻译、写作以及在中国的出版传播进行了探究。李慧斌^[62]对这一著作的写

作和在西方国家的早期传播,以及传入中国近百年来出版传播状况进行了解读。郑谦^[63]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进行了研究,着重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叶惠珍^[64]则对中英文版本的《法兰西内战》修辞格对照进行了阐释。此外,王刚^[65]还从发展形势分析与内在联系,论及了《法兰西内战》这一著作的结构编排所反映的研究方法等问题。曾异^[66]从文化批判视域,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进行对比,结合巴黎公社的历史逻辑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逻辑论证共产主义新文化的本真意义,表达以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何绍芬^[67]通过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指出,《法兰西内战》对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为国家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六、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深化《法兰西内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现有研究成果涵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人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以及社会公仆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为创新政权结构与行政体制奠定了理论依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解读了巴黎公社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巴黎公社推行的普选制,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思考;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对政府部门改变观念,构建服务型政府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研究成果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也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但是,从深化对该经典著作的研究和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有:一是研究成果的时代性体现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新时代条件下党的建设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等;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法兰西内战》的内容有很大相关性,但目前的研究对这些内容涉及较少,时代性体现不足。二是研究

成果的不均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巴黎公社、人民民主思想和社会公仆思想等方面,对于《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研究尤为不足。学术界多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单一角度对这一思想泛泛而谈,而没有对著作中蕴含的其他统一战线思想进行解读。三是研究成果呈现同质化趋势,相关研究涵盖的内容和观点大同小异,缺乏创新性的论断,而且对于很多问题的研究多停留于表面内容的论述,较少从深层次挖掘其体现的价值意义。四是缺乏对比研究,研究领域狭窄。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中既缺乏将《法兰西内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著作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又缺少从横向上对国外学者研究该著作的成果进行总结梳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不仅需要拓宽视野,丰富研究视角,还需要着眼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拓宽《法兰西内战》内容的研究,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著作内容研究的时代性。将《法兰西内战》研究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与研究的背景下,结合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深化对著作中人民民主思想、社会公仆思想、反腐败思想的研究,揭示其思想的时代性及其对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二是要深化对《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研究。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内部团结统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等统一战线思想,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充分认识该著作在马克思统一战线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三要丰富研究视角,使研究成果多元化。在侧重从政治学角度对《法兰西内战》主要思想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从多学科角度,如从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乃至经济学等学科,加大对该著作的研究力度,拓展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四要开展比较研究。既要从纵向比较《法兰西内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研究成果的异同,又要从横向上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海外《法兰西内战》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两者的异同,进一步拓宽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 [1] 秦正为. 制度体系视阈下的巴黎公社及其经验教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6, 32(3): 74-79.
- [2] 陈明凡.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读《法兰西内战》[J]. 高校理论战线, 2008(7): 8-14.
- [3] 文彩. 巴黎公社经验长新: 读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等名著[J]. 广西社会科学, 1991(2): 119-122.
- [4] 赵小飞.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巴黎公社”的新新生, 新突破: 浅析《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运动[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3, 19(2): 136-138.
- [5] 吴盼, 刘建明. 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面历史明镜: 读《法兰西内战》[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3(4): 44-45.
- [6] 关勋夏. 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法兰西内战中的历史功绩和错误[J]. 军事历史研究, 1998(1): 152-162.
- [7] 吴红英. 巴黎公社未占领法兰西银行的原因及其后果[J].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4): 109-112.
- [8] 马克思.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9] 刘丹. 巴黎公社未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原因分析[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1): 74-77.
- [10] 王宏吉, 高秉坤. 关于巴黎公社为什么不敢触犯法兰西银行的探讨[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1(3): 52-60.
- [11] 邸乘光. 巴黎公社经验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6(3): 67-73.
- [12] 韩云川. 巴黎公社原则再认识[N]. 学习时报, 2011-10-10(3).
- [13] 李姐. 巴黎公社的民主试验及其当代意义[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2: 60-61.
- [14] 刘玉芝. 试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制度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J]. 科学社会主义, 2014(4): 62-66.
- [15] 刘昀献. 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新思考[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 89-93.
- [16] 李嘉莉. 群众观点制度化: 巴黎公社政治遗产的现实启示[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4): 166-169.
- [17] 高放. 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崭新创举[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4, 7(3): 82-107.
- [18] 刘昀献. 试论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J]. 史学月刊, 1985(3): 97-102.
- [19] 林棵, 王建华. 抗争与超越: 《法兰西内战》中的巴黎公社[J]. 宁夏党校学报, 2017, 19(6): 34-37.
- [20] 刘暖颜, 关勋夏. 法兰西内战与马克思的军事哲学[J]. 军事历史研究, 2008(2): 45-55.
- [21] 张汉清. 捍卫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不朽文献: 纪念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发表 100 周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2): 1-6.
- [22] 王小龙. 论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扬弃: 重读《法兰西内战》[J].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4, 12(4): 2-6.
- [23] 王春良. 《法兰西内战》与无产阶级专政[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1(2): 21-27.
- [24] 关勋夏. 对阐述《法兰西内战》几个问题的看法质疑[J]. 军事历史研究, 2000(1): 24-32.
- [25] 杨恩勋.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困境: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解读[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7(1): 71-88.
- [26] 宫玉涛. 《法兰西内战》系列著作中的工农联盟思想探析[J]. 北京教育(德育), 2016(s1): 12-15.
- [27] 单提平. 市民社会的拯救与发展: 《法兰西内战》的新解读[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17(4): 61-66.
- [28] 刘中心.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形象理论初探: 读《法兰西内战》[J]. 现代交际, 2012(2): 105-107.
- [29] 卞敏. 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学习《法兰西内战》[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75(2): 45-48.
- [30] 刘根甫. 认清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本质: 读《法兰西内战》的一点体会[J]. 国际政治研究, 1992, 29(2): 82-83.
- [31] 张龙亮.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学习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点体会[J]. 学术交流, 1991(2): 20-23.
- [32] 巩献田. 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 纪念巴黎公社 120 周年[J]. 中外法学, 1991, 3(2): 7-9.
- [33]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8-05-04) [2018-06-1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04/c_1122783997.html.
- [34] 尤存. 百年前的思索: 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解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5): 13-19.
- [35] 陈仕伟.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民主思想初探: 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J].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0(11): 23-25.
- [36] 张国军. 《法兰西内战》的民主观及其启示[J]. 延边党校学报, 2010(6): 25-27.
- [37] 张爱军, 孙贵勇. 重新审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6(3): 67-75.
- [38] 方雷. 论巴黎公社民主制的两个基本特点[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1): 106-111.
- [39] 高健, 秦龙.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3(5): 11-16.
- [40] 范正廷. 《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主体与国家治理思想[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7(3): 103-106.
- [41] 刘真金, 肖铁肩. 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5): 103-109.
- [42] 王斌. 《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政治参与思想研究[D].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6: 9-49.

- [43] 张伟伟.《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普遍利益思想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68-72.
- [44] 李惠斌.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看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6):35-44.
- [45] 陈明凡.马克思社会公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读《法兰西内战》之体会[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18-25.
- [46] 陈容.《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的基本思想及其启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0-92.
- [47] 殷一榕,刘华.论公仆思想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从《法兰西内战》中探究公仆思想的现实意义[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1):62-66.
- [48] 黄东阳.转型期我国政府公仆身份的塑造:从《法兰西内战》探服务型政府建构之一隅[J].闽江学院学报,2010,31(3):7-10.
- [49] 赵修义.关于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考:重读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1):34-40.
- [50] 崔云鹏.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17-23.
- [51] 黄晓辉.《法兰西内战》中的国家权力配置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17(6).
- [52] 于建东.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权力异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伦理学研究,2015(1):28-31.
- [53] 朱艳菊,吴远.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J].学术论坛,2015,38(4):47-50.
- [54] 张继良.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重读《法兰西内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46-51.
- [55] 谭苑苑.《法兰西内战》与我国廉价政府建设[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5(3):53-56.
- [56] 高晓霞,钱再见.廉价政府及其公共权力逻辑:基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文本分析[J].学习论坛,2016(6):44-48.
- [57] 陈明凡.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基石:重读《法兰西内战》[J].高校理论统战,2012(8):12-16.
- [58] 胡帆,陈宇宙.节约型政府: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读《法兰西内战》有感[J].学术探索,2008(5):49-53.
- [59] 田旭明.马克思廉政思想的政治伦理向度:重读《法兰西内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29(2):37-42.
- [60] 谭苑苑.现阶段我国反腐路径探讨:《法兰西内战》反腐思想之启示[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4(6):41-45.
- [61] 董世明.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廉政建设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128-131.
- [62] 李慧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27-41.
- [63] 郑谦.“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J].中共党史研究,2010(2):5-16.
- [64] 叶惠珍.中英版本《法兰西内战》的修辞格对照研究[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1):33-37.
- [65] 王刚.发展形式分析和内在联系探寻:论《法兰西内战》的研究方法[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4):68-73.
- [66] 曾异.文化批判视域中的《法兰西内战》[D].南宁:广西大学,2017:10-18.
- [67] 何绍芬.《法兰西内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J].大理大学学报,2018,3(3):52-57.

Research review o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 Yueyun, WANG Xiaozhe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s one of Marx's classical work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on it has been heated up rapid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revealed the main content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is brilliant chapter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 lessons of Paris Commune, the thought of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people's democracy, social servant thought and cheap govern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research results, serious homogeneity and narro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the domestic scholars need to driv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bility modernization,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den the content of research, exp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Paris Commune; people's democracy; social servants; cheap government
(责任编辑:陈丽琼)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吴 苗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西方中心论”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典型表述。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世界体系视角来看,“西方中心论”有其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发展现实,也会限制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建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引入,使文化和话语也成为分析世界发展和国家关系的新的认识论基础。在对“西方中心论”思维范式的质疑中,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则得到更多肯定。中国发展话语既反映了一般发展规律,又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建立在发展实践基础上的中国发展话语既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消解,同时体现了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性。

关键词:“西方中心论”;中国发展话语;世界多元发展话语;建构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8)08-0424-07

“西方中心论”^①认定的发展一直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作为参照,尤其在关于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发展方面带有强大的优越感。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利于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上曾出现过一种论断,即“主权过时论”,认为国家对其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是否还要坚持自己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唐士其^[1]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跨国资本

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压力,加之它们自身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更不能片面理解各种关于超越主权的理论,相反必须在某些方面坚持甚至强化自己的国家主权,否则只能加深自己在国际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平等,而且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灾难。”在这种争论中,一国的道路及发展话语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实质上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全球分配正义论者也认为其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②。中国发展话语既要应对“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同时在推动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其个性与共性,并发挥建构性作用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收稿日期:2018-05-20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ZH185)

作者简介:吴 苗(1976—),女,陕西延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发展、发展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

①“西方中心论”最早来源于现代化发展理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后,认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走相同的发展道路,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复制。在这种理论惯性与思维的主导下,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存在自主性,只是对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模仿和复制。这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简称“西方中心论”。

②也有学者讨论了发展中的全球正义问题,如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机构的设置、全球共同安全、全球分配正义等问题。如查尔斯·琼斯的《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1999)、科克肖·谭的《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2004)、戴维·米勒的《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2007)、吉莉安·布洛克的《全球正义:世界主义的视角》(2009)等著作。全球正义的讨论中,世界主义关注国家基本权利和全球分配正义,而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共同体立场则认为,应该给同胞更多的偏爱与关切。这两派的对立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分配正义的理解分歧:西方的殖民主义破坏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如何补偿的问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存在不公正性,还要不要维持。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角度看这些问题的认识都不相同。笔者认为,一元化的理解肯定是不全面的。

一、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危害

西方普世价值概念中的西方,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西方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是西方强国话语霸权的一项重要攻略。西方普世价值被包装成世界各国价值体系的标准模式,客观上促成了世界话语体系的一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追求自己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是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发展话语树立起一个标杆,成为大家学习之榜样,压制了不同的声音,实质是强国话语霸权的表现。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说过,美国价值观驾驭世界贸易组织会产生不良结果。他认为:“美国力图通过国际组织‘按自己的构想’建立世界秩序,而这又是建立在大棒政策基础上的。‘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本身就隐含着美国政府可能会随意破坏贸易协定。当美国巨型公司掌握世界通讯业、金融业和食品业时,大家自然相安无事,而一旦贸易协定和国际法触犯了这些强人的利益时,那就另当别论了——历史教训就会重现。”^[2]他对美国价值观胜利操纵世贸组织所产生的预期结果总结为: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为美国大公司接管别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提供了便利;使商业和富人获益;使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为对付民主所产生的威胁提供了新式的和潜力强大的武器。世界近年来的发展态势,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征,已经很好地印证了他的看法。

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政治发展道路也是由本国的发展实际情况决定的,也具有本国的独特性。可是,现在却将这种个体经验推广成为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则,将特殊性认定为普遍性。这种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尤其是在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就逐渐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原则。就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来看,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对世界上其他与其政体不同的国家的发展,颇多非议。美国也凭借其一国的话语霸权,占据话语制高点,提出对本国有利的国际交往原则;或借机打击一些发展中国家,迫使其国内与国际的相关政策作出对美国有利的改变。

根据国际上国家间交往正常的原则,国家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利的,相互磋商,共同处理一些相关事务。但是,在“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化发展话语控制下,弱小的国家不存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条件,强

国话语成为普世价值,必须遵守。在这种情况下,弱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逐步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其影响世界的能力进一步削弱,最终沦为霸权强国的从属国,丧失话语权。弱小国家关于本国的发展道路被霸权强国认为不是合理的,在国际上也不被认可。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主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本国发展理论并不能持有自信的态度,引发的后果就是对本国发展道路的不自信。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经历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时世界的发展话语体现为美国和苏联所持话语的二元对立。两个超级大国在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时,也出现了美、苏的二元化话语的激烈交锋。反映在国家关系上,美、苏由于话语意识形态的不同,各自拥有本国的一批卫星国。这些卫星国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是在霸权大国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缺乏自主探索。苏联解体后,苏联影响下的东欧一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顷刻瓦解,就是这个原因。“在美国方面看来,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价值观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3]449}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展话语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西方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价值准则,不断作为西方的文化攻略在全球推广开来。这个过程,使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从属地位进一步加强,西方国家以武力与资本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则继续得到强化。世界的发展话语从美苏的二元对立进一步转向“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化。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导致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不同国家的多样化发展道路被霸权国家的单一发展道路所代替。这种移植的道路不符合每个国家和民族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结果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探索的其他发展道路,因不符合西方特定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否定的标签,还被霸权国家非议甚至干涉。不管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和探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世界认同的缺乏。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的条件下,世界认同的缺乏直接导致这些国家自我认同的缺失,对本国的发展道路和努力会出现自我否定。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然,苏共的垮台有自身的原因,但西方对苏联的解体和社会制度的转变起了直接的推动和干涉作用。在西方强大

的宣传攻势下,苏联国内出现了对本国发展道路的自我否定,最终根据西方的意图转变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大国苏联尚且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自我发展的认同更易受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的影响。

从本质上来说,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并不是真理的输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同的实践检验出不同的真理。没有绝对性的真理,真理都是有相对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都要根据革命实践的变化来修正他们的理论,使之更为科学,更适应新的实践。所以,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并不科学,它其实来源于霸权强国的价值观输出,并且背后经常伴随有物质诉求。西方价值也只是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一种概括,可能更为适合其本国的发展。这种价值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它是西方国家人民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如果适合了美国的发展,那么美国的发达及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就是证明。但是,如果美国向其他国家强行进行价值输出,就不具备真理性了。真理是有时空条件限制的,此时此地的真理用于彼时彼地完全有可能是谬误,甚至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今天的伊拉克就可以提供最有力的例证。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也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4]258}说:“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人类文明因多样而存在,因交流而发展,因互相学习而进步。美国的发展经验是美国人民在本国国情条件下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没有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复制,照单全收,他们都对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经验学习交流。这些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性也非常大,在本国发展道路的演变中,也反映出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的认识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就带有明显的优越感,认为科学的发展话语非他们莫属;其他不合乎其价值标准的发展经验都应该作出自我批评,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发展经验。所以,“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也是对人类文明认识态度的不正常的退步。

二、中国发展话语对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建构的影响

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看,世界体系是

具有流动性的,即中心国家可能下降为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也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国家。^[5]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世界体系中存在一定的自主发展空间。“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处于其中的国家要参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各个国家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中心”国家主导了世界经济政治体系,在其中具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受到压迫和剥削,边缘国家所受的剥削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沃勒斯坦的学术贡献在于不仅仅开创了一种审视人类历史的新视野,最重要的是他基于这个解释框架,对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抱有足够的警惕和批判。”^[6]现代性发展主义话语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延续了西方殖民主义关系的意图,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缺陷。

“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其实就是一种带有西方殖民主义思维的话语表达。从表面上看,这种发展话语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为模板,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是对这个道路的模仿、学习和复制。但是,从思维逻辑来看,这种发展话语的缺陷在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唯发展论,以及僵化的道路模仿复制说。发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什么是正当的发展?现代化能够涵盖所有的“发展”内涵吗?答案并不唯一和绝对。在目前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有差异。发展的普遍性与人类需要的多元性存在矛盾,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存在差异性,由此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对于不同的人群和地区来说,立场不同,答案甚至可能绝对相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的出现,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收缩战略、石油危机的出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等,使国际关系仅凭理性主义和对权力的核心关注都不能解释。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被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所批判。反思主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强调国际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建构、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性。”^{[7]序}在吸收了反思主义的话语分析后,温特试图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他吸收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又决定从反思主义的本体论进行国际关系的分析,从而引起了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一大进步。温特等人对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发展,从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出了现实的国际关系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建构。

建构主义原本主要用于描述一种认识论立场,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它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审视客观世界,所以得名“建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兴起,并在90年代以后发展为国际关系领域强劲的理论学派。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文化的作用,如共有知识、共有认识或共有信念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不可避免的影响等。温特举例谈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人和苏联人就有了共有的信念: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7]233}这种文化的自我再造趋势,使国家之间的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能很好地解释现实当中国际关系的一些变化。它从本质上对国际关系现实领域的反思,也使得“西方中心论”的一元发展话语面临思维范式的质疑。

国际体系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得“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身处尴尬境地。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温特运用建构主义的视角,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国际体系文化类型,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特点是敌意、暴力事件和国家的高死亡率。但是,近几百年来,一些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低死亡率也说明国际政治发生了质的结构变化,“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逻辑已经被洛克无政府社会的生存和允许生存逻辑所替代。”^{[7]350}同时,也有多元安全共同体格局的国际关系文化显现出来,那就是康德文化。^[8]在这种文化中,非暴力和团队行动已经成为规范,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国家与国家如果出现冲突,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来解决。^{[7]370-373}所以,对于国际体系中文化的理解,可能是如今思考国际关系问题绕不开的认识基础。实践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反思主义本体论的结合,在国际关系领域引起了思考方式的发展和进步。

当今的世界发展话语一元化仍是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最大障碍。20世纪的后20年,拉丁美洲国家因其在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而并未充分享受到世界发展的成果,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很大比例的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这种畸形的发展,其实当地的学者已基本作出解释,如多斯桑托

斯^[9]所言,在这种全球格局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处在一种依附的和从属的地位上。”“尽管做出了努力,但当这个地区还无法控制自己的经济、不能实行一种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政策,以克服结构性的依附状态、铲除本地区统治阶级的寡头势力存在及其他的反民族、反人民的从属地位、克服收益和财富的严重集中、克服对劳动力的高度剥削的时候,很明显,这种努力就不能期待得到重大成果。”所以,不管是从“依附论”还是从世界体系理论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心位置是事实,“西方中心论”只不过是强化其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优越地位,是从话语认同的高度对其发展的肯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中国发展话语^①应该对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有所作为。我国一直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在国际社会仍旧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我国的发展话语还不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质疑,在世界上的认同度也不是很高。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本来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非常弱,在寻找本国发展道路时又时刻面临外部霸权国家的非难和内部国家民众的误读。所以,本国的发展经验得不到世界的普遍认可,还频频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西方中心论”实质是认为霸权国家的发展经验是真理,别的发展经验都不是真理。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大国来考虑,中国发展话语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意义非同寻常。“反思或批判理论造就的知识的可用之处是改造世界,而不是在现有世界范畴内进行运作。”^{[7]475}建构主义的出现使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产生动力,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同样使世界发展话语的研究充满了对自身的批判色彩。不可否认地说,如果失去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思主义的本体论,任何的绝对化的观点或主导理论最终只能导致自身的活力缺乏或者理论退步。所以,世界发展话语多元化的客观性,对于世界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话语整体上处于劣势,很难说在世

① 中国发展话语是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话语表达,体现了中国式的发展在国际上和国内影响的话语功能。这种发展以现代化为重要内容,但又不局限于现代化,还包括科学发展、绿色发展、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发展的时代课题和内容。

界发展话语中产生影响力。中国发展话语的出现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一种声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建构负有责任。同时,中国的发展话语也是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一元,对于世界多元发展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建构。从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的多样化来看,世界出现多元发展话语是正常现象。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看,研究思维范式的转换也反映了话语在国家关系和世界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国的存在和发展要用自己的发展话语来解读和传播。没有话语权,就没有生存权,也就丧失了发展权。新中国成立后确实曾经模仿苏联模式,但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自主探索本国道路的步伐。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0]中就开始独立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与苏联关系交恶后,进一步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拓展中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毛泽东尝试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尼克松得以访华。改革开放后,中国打开了与美国的建交大门,随之全面开放的中国进入了广阔的国际交往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3]397-403}认为“设立经济特区是相当大胆的举措。它也表现出中国愿意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从而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经济自给自足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基辛格作为美国的政府官员,他又感慨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实现它的历史宿命,还是在精神信仰上作出妥协?它应该向西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学习什么?”用这样的西方发展话语解读中国,容易出现误读,显然不利于我国发展话语的国际表达。

三、中国发展话语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外在表现。关于发展的言语理论表达方式,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与社会权力关系相关,发展话语是一国关于发展的自我认识和国际认可度的反映。发展话语的普遍性在于其是一种存在的表达,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表述,是让世界和其他国家了解本国发展的言语表达,如前所述,发展话语具有话语建构功能。中国的发展话语也是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表述,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话语一样,具有存在的普遍性和一般特征。同时,这种表达本身又是一种多样化的体现和集合,发展话语的建构功能和普遍性又是通过其独特性和个性特征体现

出来的。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11]一书认为,中国有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等。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各个国家的发展话语都有其独特性,世界上国家的发展话语最后会体现为多样化的集合。

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的根本对立到现在仍然存在。从我国的本土环境来说,社会主义的文化领导权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话语支持;从全球视野来看,西方社会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冷战之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强国更是强化了其“新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利用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影响和渗透边缘国家和地区。在处理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①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我国学者周兴杰^[12]认为:“必须从全球性视角来看待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迫切性。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随着当代传媒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我们必须将文化领导权问题与中国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定位联系起来。”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有竞争、有合作,在对立中协商,在竞争中合作。从全球语境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反而具有“反霸权”的性质。

各个国家发展话语的特殊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用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话语的特殊性去解读别的国家,都不会适用。“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话语,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我国在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自身合理的地位和权益。中国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一直在努力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成为中国的执政党,继续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就是党领导人

^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文化、意识形态与政党权力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前必须行使领导权,革命胜利后,也必须继续保持“领导”。他还认为:在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国家暴力机构,但其统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宣传,使群众支持并接受其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在这个一致的形成过程中,各社会集团和政党形成妥协,实现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社会经济和政治从而有了一致的目标。

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成功摸索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大“三步走”又细化为小“三步走”,经历调整和不断完善,指导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华民族一直热爱和平。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虽然一直落后,但最终清醒把握了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自身发展目标有了明确认知。中国道路承载的发展理念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学者张维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分析了中国成功背后的理念,概括为:“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13]该文章发表时,编辑特地加了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当然,中国的发展理念还在不断丰富,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中国也在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表达出自己的发展话语,习近平在国外演讲时就说,“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4]273}他号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中国发展话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当前中国发展话语的最新概括,符合中国发展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对中国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于中国开创一个全新战略机遇期具有旗帜的功能,是中国面对新世纪战略机遇期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外国媒体直接把当前中国发展话语概括为“Four Comprehensives”,使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推动中国的发展提出不同的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特定历史阶段发展话语的核心表达,对于推动中国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也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窗口。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4]259}时说,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因而才有交流互鉴。“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

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所以,对于别的国家发展经验,交流互鉴是科学的学习态度,傲慢与偏见经常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其关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一直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指导中国新的发展实践。新的时代和发展实践对于党和国家工作也会产生新的要求,因而,中共领导人坚持适合本国的发展理念,根据本国实践的要求创新发展理念,对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也在不断总结、丰富和完善。从当前的中国发展来看,“四个全面”战略正在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决定性举措,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科学发展理论能否实现的决定性条件。这也是保证中国的发展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元政策的话语表达,具体各个方面的政策执行和措施推进都是以此为方向和标准的。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较为长远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对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务必要“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

四、结 语

也有西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论”并不认同,反而更为注重中西方发展经验的互相学习。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在他看来,“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说中国能从国外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其他国家同样也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很多东西。”^[14]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国情都不一样,并不先天存在一种成型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一元论”的发展思维,如“西方中心论”,正是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从思维方式来看,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与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

世界的一员,国家主动参与其中,要比被动卷入更能占据发展的有利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又是话语建构的关键内容。由话语建构进而实现话语的国内认同和世界认同,进而实现发展的合理性,是发展话语的关键功能。发展话语是关于一国发展的阐释与表达,对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影响以及进一步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属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话语的阐释受到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的影响,但国家在其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又非常必要。所以,中国的发展可以总结和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了一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适合当前中国发展特点的发展话语的最新概括,一直努力在世界发展话语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用自己的发展实践使自身的发展话语在世界上得以传播,有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科学地认知中国的发展话语。中国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与其他国家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公正合理发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实质上就是对世界多元发展话语的补充和建构。

参考文献:

[1] 唐士其. 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社

会的关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40-341.

- [2] 诺姆·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 徐海铭, 季海宏,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4-57.
- [3] 亨利·基辛格. 论中国[M]. 胡利平, 林华, 杨韵琴, 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M]. 孙立田, 庞卓恒, 张永胜, 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6] 姚国宏. 话语、权力与实践:后现代视野中的底层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47.
- [7]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8] 康德. 永久和平论[M]. 何兆武,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9]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世界经济新趋势与拉丁美洲一体化[C]//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 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 白凤森, 徐文渊, 苏振兴, 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81.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9.
- [11] 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 中国大趋势[M]. 魏平, 译.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 [12] 周兴杰. 批判的位移: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转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78.
- [13] 张维为. 中国震撼[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6.
- [14]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 陈剑, 余江, 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中文版自序.

“West-centered”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WU Miao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West-centered” theory is a typical expression for un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 i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st dialectic and world system, “west-centered” theory is limited in terms of cognition method, so it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will restrict worl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he introd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analysis method makes culture and discourse become the new epistemology basis to analyze world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querying the thinking paradigm of “west-centered” theory,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of the world is affirmed.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reflects general development law, adapts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embodies unific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based on development practice dispels “west-centered” theory and embo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West-centered” theory; development discourse of China;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discourses of the world;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王艳娟)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第九届编委会成员

主 任 裘松良 常务副主任 陈文兴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王兆青	刘朝马	杜时贵	李加林
杨云芳	邹奉元	汪亚明	沈满洪	陈文华
陈文兴	陈改玲	陈建勇	郑旭明	赵辅昆
胡旭东	胡觉亮	胡剑锋	姚菊明	徐定华
渠长根	喻擎苍	傅雅琴	蒙兴灿	裘松良

秘 书 长 郑今欢

主 编 陈文兴

副 主 编 唐志荣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ZHEJIANG LIGONG DAXUE XUEBAO

月 刊(Monthly)

逢双月 社会科学版

第40卷 第4期 2018年8月

Aug. 2018, Vol. 40 No.4

(1979年9月创刊)

(Started Publication in Sept.1979)

主管单位: 浙江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浙江理工大学

出 版: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

社 长: 郑今欢

编 辑: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

电话: (0571) 86843739 (兼传真) 86843152

电子信箱: Journal@zstu.edu.cn

网址: <http://xuebao.zstu.edu.cn/>

地址: 杭州下沙高教园区

浙江理工大学(310018)

主 编: 陈文兴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杭州莫干山路勾庄)

订购发行: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18年8月10日

Authority in Charg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Sponsor: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Periodicals Agency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dited by: J.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Editorial Dept.

Address: Xiasha Higher Education Zone, Hangzhou 310018, China

Tel: (0571)86843739 86843152

E-mail: Journal@zstu.edu.cn

Website: <http://xuebao.zstu.edu.cn/>

Editor in Chief: Chen Wenxing

Printed by: Hangzhou Yuhang People's Printing Co., Ltd.

(Gouzhuang, Moganshan Road, Hangzhou)

Issue Date: Aug. 10, 2018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3-3851
CN 33-1338/TS

定价: 10.00元

ISSN 1673-3851

